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劉心華副教授

契訶夫短篇小說中的異化主題



碩士班研究生：劉盈汐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摘要

「異化」(alienation) 問題是西方文學常探討的主題，也在俄國文學界造成影響，契訶夫創作年代正逢俄國社會從封建形式轉型成資本主義社會之時，其接近生活的寫實風格反映當時俄國的「異化」現象與「異化」現象對人心的影響，本論文將採用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和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兩人的「異化」理論，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分析契訶夫短篇小說中的「異化」主題。

論文主文分作四大章進行論述。第一章說明馬克思與韋伯兩人的「異化」理論，並從歷史、思想界與文壇角度架構俄國當時社會背景；第二章闡述契訶夫的生平與創作歷程，梳理「異化」現象的脈絡，分析契訶夫前期作品的「異化」成因；第三章和第四章著重於後期作品的研究，筆者將「異化」現象所造成的影響分成內在反映和外在表現兩部份，藉由「異化」理論剖析作品。

關鍵詞：契訶夫、異化、馬克思、韋伯、祛魅、官僚、疏離、異常

題獻

獻給我的父親溫鎮賢。

不僅是這本論文，你支持了我的人生。

願你平安健康，事事順心。



誌謝頁

一直秉持及時行樂心態的我，即使比大部分同學都慢，但總算完成了碩士論文。研究所四年對我人生的影響，大大超越過去二十多年的總和，直到現在，才理解陳之藩先生所謂的「得之於人者太多，出自於己者太少」的真正意涵，因為意識到自己的幸福，除了滿滿的感謝，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回報。

謝謝我的外婆、爸爸、媽媽和兩個哥哥，你們在我不用心的生活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沒有你們的支持和鼓勵，論文無法完成。

謝謝我的指導教授劉心華老師，不論是論文或生活都受到老師的諸多照顧，在我迷途、怠惰的時候，老師總不吝伸手拉我一把，帶我回到正軌。論文的好多章節都一寫再寫、再三塗改，謝謝心華老師不厭其煩地修正，在最忙碌的時間仍抽空和我討論。

謝謝兩位審查委員李細梅老師和鄢定嘉老師，感謝你們撥出時間閱讀我的論文，寬容我的粗枝大葉，並在審查過程中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你們的肯定讓我覺得一切付出都有了回報。

謝謝美莊學姊和茵茵學姊各方面的協助，讓我在論文之路雖然跌跌撞撞，但還是走到終點。

謝謝賽亞人西瀉裕貴，遇到你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謝謝你一路的體諒、包容和照顧，讓我在最脆弱的時候，知道何處可去。

謝謝在這四年間陪伴過我的每一個朋友，謝謝你們願意包容滿是缺點的我，陪伴我度過難關，沒有你們我大概什麼也寫不出來。

目錄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7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8
壹、研究途徑	8
貳、研究方法	11
第四節 研究限制	12
第五節 文獻回顧	12
第六節 章節配置	16
第一章 「異化」概述	19
第一節 「異化」定義	19
壹、馬克思視角下的「異化」	19
貳、韋伯視角下的「異化」	25
第二節 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的「異化」現象	29
壹、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的歷史背景	29
貳、十九世紀後期文論中的俄國社會	33
第三節 小結	42
第二章 契訶夫前期短篇小說作品中的「異化」脈絡	44
第一節 契訶夫生平	44
壹、人生經歷	44
貳、風格轉變	50
第二節 契訶夫前期短篇小說作品中的「異化」成因	54
壹、經濟	55
貳、身份	63
參、權力	71
第三節 小結	81

第三章 「異化」主題的內在反映	85
第一節 價值觀的扭曲	86
壹、生活目的庸俗化	88
貳、道德標準低落	96
第二節 自我的喪失	103
壹、生活意義的缺乏	104
貳、個人意識的消散	113
第四章 「異化」主題的外在表現	125
第一節 個人行為的異常	126
壹、恐懼	127
貳、庸俗	134
參、對死亡的嚮往	142
第二節 人際關係的疏離	150
壹、僵化	151
貳、冷漠	157
參、憎恨	166
結論	175
參考書目	183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9 世紀下半葉，俄羅斯開始走向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道路，導致封建地主經濟和農奴制的生產方式改變，產生極其尖銳的矛盾。¹1861 年農奴制廢除，俄國正式踏入資本主義。從盧卡奇的觀點來看：經過資產階級革命，封建等級和教會特權被消滅了，但新的階級和特權又產生了。社會發展的結果，就是人從一種「異化」(alienation) 現象中解放，進而跳入另一種新型的「異化」當中。²以俄羅斯人民為例，他們從農奴制解放，卻又陷入資本主義生產的桎梏。

「異化」問題歷史悠久，是西方文學中常探討的主題之一。在猶太—基督教傳統中，「異化」表示人類與上帝日益疏遠；於近代政治學理論內，「異化」為人類逐漸疏遠其所生活世界的過程；在個體與社會關係的語境中，「異化」則是社會做為一個整體對社會每個成員的個性和獨特性的冷漠。³換句話說，「異化」是隨著人類在社會發展中產生的一種狀態，而狀

¹ T.C.格奧爾吉耶娃著，焦東建、董茉莉譯，《俄羅斯文化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381。

² 孫伯鏘，《盧卡奇與馬克思》，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18-320。

³ 汪民安編，《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 431-433。

態反過來控制人類，這股陌生的力量逐步掌握著人類的舉動，最終人不得
不受其支配。現實生活中的「異化」問題，特別是社會關係的異化，是馬
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創立唯物史觀之初就予以重視的問題，
其早期著作《1844年經濟暨哲學手稿》（*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在1932年發表後，便在學術圈內掀起了「異化」理
論的熱潮，此後每隔一段時期「異化」理論就會重整旗鼓，以不同的面貌
出現各個領域，而現今社會所展現的拜物與疏離更映證了「異化」理論，
並為其研究增添了許多材料。

契訶夫生長在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俄國，目睹了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
激烈衝突下的社會亂象，在前後期作品中採用不同手法，忠實地呈現當代
俄國社會中的「異化」現象。初期，契訶夫以短篇故事幽默詼諧地表現生
活當中的「異化」現象；到了中後期，作品風格漸趨嚴肅，篇幅也較前期
作品長，反映的層面從日常生活的「異化」擴及到政治、思想等更深層的
意識形態的「異化」。

在以長篇小說見長的俄國文學界中，契訶夫以短篇小說脫穎而出，公
認為當代俄國生活的最佳寫照，帶給俄國以及世界文壇的影響甚鉅。契訶
夫的創作主題與生活密不可分，他尤其偏愛處於中下階級的小人物，喜歡
在平淡無奇的日常中攝取題材，從生活瑣事尋找悲劇，也從中挖掘人的靈
魂的美。此外，「他的短篇小說簡潔精煉，短小的故事由於經過了很好的錘

鍊而顯得非常緊張生動，他調詞遣字得心應手，駕馭材料如高屋建瓴」(楊宗建，1987：142)。⁴契訶夫的作品當中充滿日常生活元素，也大量描繪因「異化」產生的各種行徑，日常生活與社會的「異化」現象相互作用，就內化成個人自身獨有的「異化」問題。契訶夫著重描寫當代社會的中下階層人物，他們在各個層面的弱勢造成生活當中不同的「異化」現象。

在本論文中，筆者擬從唯物主義角度出發探討「異化」現象，此理論以德國哲學家馬克思為代表。馬克思肯定物質生產存在的意義，認為：「異化」是一種社會生活的歷史現象，物質生產為「異化」提供了物質基礎以及發展平台，同時也提供了消滅「異化」的條件，能藉由分析歷史事實、客觀推論批判整個社會，修正社會發展的路徑。馬克思批判的重點不是物質生產，而是物質生產後所產生的兩種「異化」現象，第一種是指社會關係的異化；第二種則是社會權力的異化。⁵

由於馬克思的理論著重於客觀事實，較少「異化」現象對人心影響的分析，因此筆者將採用深受馬克思影響的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Lukács György，1885–1971）的論點，做為補充，他與馬克思的理論同樣認為「異化」是一種人類社會生活的歷史現象，是必然發生的結果；不同的是，盧卡其認為物質的存在和社會的規律都和人相異化，人身處其中都勢必感到

⁴ 楊宗建著，徐祖武主編，〈試論契訶夫短篇小說的語言〉，《契訶夫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7，頁142。

⁵ 同註2，頁7-9。

壓迫，而這樣的觀點忽略了具體物質在社會的客觀存在，僅著重於哲學問題，將對社會現象的實際批判昇華成對人類價值觀的抽象剖析。馬克思與盧卡奇兩人觀點相似，但著眼點不同，批判的「異化」現象也有所差異：馬克思的批判重點指向現實生活中的奴役、壓迫和經濟上的榨取，盧卡奇批判的重點則是精神層面上人的獨立主體地位和自由意志的喪失。⁶

相較於馬克斯與盧卡奇以哲學角度探討「異化」，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將「異化」議題拉回現實層面。韋伯認為，在現代化之前宗教為個體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廣大的意義，宗教撫慰個人，幫助個人找到自身的價值與位置，隨著世界發展，知識和科學取代了原本宗教的地位，一切皆有理可循，生活成爲了純粹經驗性的事情，許多人因此失去重心，認爲生活空虛而沒有目的，韋伯稱呼這一系列的演變過程爲「祛魅（disenchantment）」。⁷「祛魅」的結果就是社會對個體的漠視，而個體則逐漸失去對所處社會的歸屬感，兩者疏離，「異化」現象便因此產生。而除了「祛魅」之外，韋伯認爲導致「異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來自「官僚制」（bureaucracy）。「官僚制」是具有合法支配權力的管理組織，具有層級式機構，權責大小由上往下遞減。由於法條規章的存在，「官僚制」十分堅固，命令的施行也相當強勢，下層的個體幾乎無法表達自己的主見，只能服從上面傳達的指令，在這種狀況下，個體被壓縮，最終失去了個人

⁶ 同註 2，頁 5-11。

⁷ 同註 3，頁 433-434。

意識與存在價值，只能麻木地聽從上層命令、遵守法令規章以及執行被指派的任務。

契訶夫所在時代，經濟足以影響個人價值的現象已然出現，加上農奴制的遺毒，因此雖然資本主義在俄國剛起步，工業化也不如西歐發達，但剝削勞工、重視金錢的現象卻與西歐並駕齊驅，中下階層所受的壓迫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異化」問題在這樣的社會狀況下儼然成型。《萬卡》（*Ванька*）當中年幼的主人公萬卡（*Ванька*），在鞋店中當學徒，飽受虐待，期望祖父能帶他逃離壞心的鞋匠，只寫著祖父的名字和父名就把信寄出；《暈》（*Спать хочется*）中未成年的女孩瓦爾卡（*Варька*），為避免主人夫婦的打罵，只能沒日沒夜拚命工作，最後終於失去理智掐死所照顧的嬰兒；又或者是《牡蠣》（*Устрицы*, 1884）當中貧困的父親對餓昏的孩子束手無策，欲乞討卻又開不了口，在尊嚴和現實中苦苦掙扎。在這幾篇小說中契訶夫反映了冷酷的現實，彷彿金錢就能代表人的價值，沒有資產的人只有被壓榨的命運，映證馬克思的「異化」理論。

馬克思批判的是物質層面的壓迫，而盧卡奇批判的「異化」現象則是個人自由意志的喪失或已被歪曲的價值觀。除了在現實生活中飽受壓迫的人之外，契訶夫筆下也有許多麻木度日的人物，《帶小狗的女人》（*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1899）中的銀行職員古羅夫（*Гуров*），為了現實生活拋棄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在上流社會茫然度日，發現真愛後，才發現過去生活可憎且

無味。然而，不是每個人都像古羅夫一樣能從逃出生活的迷霧，《醋栗》（*Крыжовник*, 1898）中的稅務員尼古拉·伊凡內奇（*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以及《脖子上的安娜》（*Анна на шее*, 1895）的阿尼雅（*Аня*）都是在社會中迷失自我價值的範例。前者竭盡所能當上地主，爲了追求代表他的夢想——自由生活的莊園和醋栗，拋棄所有生活的美好，連人性也逐漸消失，他卻沾沾自喜，這樣對生活毫無警覺的態度，令人痛心；後者出身貧寒，爲了酗酒的父親以及年幼的弟弟，嫁給文官，起初她十分懼怕丈夫，但在她意識到美貌帶來的益處後，便不再把丈夫放在眼裡，縱情欲樂，連父親和幼弟的貧困都拋諸腦後。

韋伯將「異化」歸咎於壓抑個人意志的「官僚制」。「官僚制」在俄國已行之有年，十九世紀尼古拉一世、亞歷山大二世在位時，相繼採用保守主義，政治氣氛沉悶、社會風氣保守，亞歷山大二世所採用的政策搖擺不定，時而自由時而保守，他推動了俄國的工業化，帶領俄國走向現代；同時卻又破壞地方自治，改爲地方首長制，讓專制的氣氛蔓延，「官僚制」在此時更變本加厲，彷彿只有階級才是人的價值所在，就像〈小官員之死〉（*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 1883）中膽小怕事的下級文官，只因不小心將唾沫噴到將軍，就提心吊膽，最後被嚇死；〈在釘子上〉（*На гвозде*, 1883）中呼朋引伴想要慶祝命名日的官員，回家後看見釘子上掛著長官的帽子，連家都不敢回，只能在外苦等；〈胖子與瘦子〉（*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 1883）中原爲兒時玩伴的兩人，在釐清彼此的官階後，疏離感油然而生；〈合二爲

一) (*Двое в одном*, 1883) 的主人翁則在長官面前唯唯諾諾、毫無自尊，一到尋常老百姓面前就意氣風發。契訶夫筆下的小文官多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他們懦弱怕事，因為官階低而全然否定自己存在的價值。韋伯認為「異化」主要關係到無意義性和疏遠感，在官僚機構裡，個人對於群體微不足道，只能屈服於各種規則，⁸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韋伯的理論中官僚制會是「異化」的主要源頭了。

本論文將自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中取材，進行分析。然而，異化現象本身極為複雜，反映在小說中更是需要從多方著手，因此作品並不能僅由分析個人的特別案例著手，必須同時從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加以綜合研究，才能理解契訶夫作品當中的異化現象。馬克思認為：人類的本質不是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繫起來的無聲的共同性，而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⁹因此筆者主要擬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切入文本，從實際的社會氛圍中探索異化現象對人類的影響，佐以盧卡奇的觀點補充說明未盡之處，再藉由韋伯的理論分析「異化」的源頭——「官僚制」，研究當代俄國社會的狀況，以求能以更寬廣的視野分析契訶夫短篇小說作品中的「異化」現象。

第二節 研究目的

⁸ 同註 3，頁 433。

⁹ 同註 2，頁 334。

- 一. 梳理馬克思以及韋伯的「異化」理論，並置入俄國的時空背景做分析。
- 二. 以契訶夫短篇小說為例，置入上述理論，分析「異化」主題的生成背景。
- 三. 藉由契訶夫短篇小說揭露俄國的「異化」現象。
- 四. 整理契訶夫短篇小說作品中的「異化」主題，理解俄國當代社會亂象的始末。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

採用「異化」概念的研究可從兩個方向出發：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與韋伯的異化理論。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中主要採用馬克思的觀點，再從盧卡奇的視角出發進行補充說明。接著，採用韋伯的「異化」理論，分析為害俄國社會甚鉅的「官僚制」，同時探討社會與個體疏離的過程。本論文將同時從這兩方不同的異化理論著手，分析契訶夫作品中的「異化」現象，避免使用單一理論造成的偏見及誤讀。

一. 馬克思的「異化」理論

在馬克思理論中：人類的物質生產為社會提供了物質基礎，原始社會條件發展充足後，「異化」產生是必然的結果，「異化」包括「對象化」（外化）、「異己化」、和「統治性」等內容。¹⁰「對象化」屬於「物化」的一種，指人不再代表個人，沒有自身價值，僅僅被視為其勞動產生的經濟價值；「異己化」指人類毫無理性地屈從外在社會的規律，接受所有支配和操縱，無法出於自我本性作出選擇；「統治性」代表權力超越人類本身的意志，在人的潛意識中支配人的決定。欲採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探討文本，必須先架構出當時俄國的背景，再藉由客觀蒐集而來的證據分析文本中所反映的問題。

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未說明之處，筆者將採用盧卡奇的論點補充。盧卡奇認為：當物質的存在與規律超出人類掌控，便限制了人類的自由，¹¹人類和物質共同生存在社會中，容易迷失自我。盧卡奇的「異化」理論多在批評人類的意識受到階級力量牽制，而階級又受控於社會意識，不但個人獨立的主體地位不復見，同時還可能喪失自由意志，所作所為皆非出自本心。以盧卡奇唯心主義的論點補充分析作品時，必須將重點放在相對較抽象的階級意識、個人自由意志以及伴隨而來的脫序行爲。

¹⁰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109-111。

¹¹ 同上註，頁7-9。

二. 韋伯的「異化」理論

探討韋伯的「異化」理論之前，必須先整理韋伯對「支配」(domination)的看法，他將「支配」定義為一種引起服從的命令結構，並將「支配」分成以下三種類型：傳統型 (traditional)、奇魅型 (charismatic) 以及法制型 (legal)，這三種支配類型是在不同的基礎上建立對服從的要求。傳統型支配源自「歷代相傳」的規矩，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封建制度以及世襲制度；奇魅型支配的存在則出自領導者對未來的願景以及其提出的改革，重點取決於領導者的個人魅力，例如希特勒的崛起；法制型支配是根據法律條文行事的統治模式，具有合法性，典型的法律型支配則是「官僚制」。¹²

韋伯的「異化」理論將「異化」的源頭歸類於「官僚制」，理想中的官僚必須具備責任心和愛國意識，以國家利益為優先，但現實中官僚面對個人利益和社會大眾利益的衝突時，常常只考量個人利益，而官僚制層層遞減的結構更強化了上層官員的力量，他們合法地逼迫下屬服從不一定符合公正、公義的命令，過程中讓個體失去為自身思想發聲的機會。官僚制一旦充分實行，就成為最難摧毀的障礙，無法推翻的合法性會讓官僚制擴大影響範圍，使個體逐漸變得麻木不仁，進而與社會疏離。¹³本論文將重點擺在「官僚制」影響人心的結果以及個體被社會逐漸疏遠的過程，分析文

¹² 馬克思·韋伯著，黃丘隆譯，《馬克思·韋伯》，台北：結構出版群，1989，頁 98-101。

¹³ 韓水法，《韋伯》，台北：東大，1998，頁 143-147。

本中所反映的「異化」現象。

貳、 研究方法

本論文擬採用以下的研究方法：

- 一、 傳記研究法：在第二章「異化」概述中，筆者將採用契訶夫當代的文論，以架構出當代文學中的俄國社會全貌。
- 二、 文本分析法：本論文擬選取大量的短篇小說文本，從中取材，分析故事主題、敘事手法以及人物塑造，探討契訶夫所見的各種「異化」現象。
- 三、 演繹分析法：綜合各項觀點，包含論文中使用的馬克思「異化」理論，隨之衍生而出的盧卡奇「異化」理論，以及韋伯的「異化」理論分析作品中的「異化」現象，演繹出「異化」現象產生的原因。
- 四、 歸納分析法：將契訶夫的作品分類，由其故事內容歸納出「異化」現象所造成的各種後果，並深入探討。

第四節 研究限制

契訶夫的作品幾乎涵蓋了俄國生活的各個面向，筆者雖將採用大量的文本分析其中「異化」的概念，但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作品眾多，筆者僅一人之力，難保不會有所缺漏，為本論文的限制之一。此外，因為性別而產生的「異化」現象，涉及了如父權主義、女性主義等其他文學批評面向，筆者將著重當中「異化」現象，略過性別議題，研究方向被窄化，這也是研究限制之一。

本論文將同時採用馬克思與韋伯的「異化」理論為主，盧卡奇的為輔，分析契訶夫作品當中的「異化」現象，但「異化」理論複雜性高，涵蓋範圍甚廣，在研究文本時未必能完全引用，礙於篇幅限制，作者將從經濟、階級和權力三個層面描繪「異化」現象造成的後果，自行排除與研究內容較不相關的觀點，例如在各方觀點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宗教「異化」理論。

契訶夫小說中所展現的異化現象繁多，筆者將作品區分為外在行為與內在心理，從兩方面探討分析，契訶夫作品中的異化現象大多環環相扣，筆者僅從當中取出最符合篇章題目的段落探討，若有疏漏，請多包涵。

第五節 文獻回顧

本論文以「異化」理論為基礎，探討契訶夫作品中的「異化」現象。在文獻回顧方面，首要關注的就是文本的挑選，筆者將從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作品中挑選出適當文本，並自行分類。

關於契訶夫生平，筆者擬採用瑪麗雅·契訶娃（Мария Чехова）的《遙遠的過去：我的哥哥契訶夫》（*Distant Past*），瑪麗雅是家中唯一女兒，和契訶夫的關係相當密切，甚至為了契訶夫終身未嫁，她以半傳記式地描述他們的家境、成長背景、童年以及影響契訶夫一生的大事，包含了庫頁島之旅、莫斯科劇院以及契訶夫的婚事，由於本書作者與契訶夫長期共同生活，當中有許多珍貴史料值得研究。另一重要的參考文獻為俄羅斯莊園系列的《契訶夫與梅里霍沃莊園》（*А.П.Чехов и усадьба Мелихово*），契訶夫在梅里霍沃莊園度過了他的前半輩子，梅里霍沃莊園聚集了契訶夫的親朋好友，筆者將梅里霍沃莊園視為契訶夫的部分投射，藉由研究梅里霍沃莊園來理解契訶夫的待人接物，此書不僅僅展示了契訶夫的親朋好友與生活環境，還包含了在梅里霍沃莊園發生的大小事，提供了筆者不同角度研究契訶夫。

契訶夫生活的時代背景，筆者擬先採用李邁先的《俄國史》、布羅茨基主編的《俄國文學史》（中卷）與歐茵西的《俄羅斯文學風貌》理解契訶夫生活年代的歷史背景、文壇風氣；透過 T.C.格奧爾吉耶娃的《俄羅斯文

化史》與洛特曼（Лотман）的《俄國文化漫談》（*Беседы о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筆者對當代俄國文化有通盤性的了解；再藉由米羅諾夫的《俄國社會史——個性、民主家庭、公民社會及法治國家的形成（帝俄時期：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弗列羅夫斯基（Флеровский Н）《俄羅斯勞工階級的處境》（*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России*）分析當代社會，這兩本書詳實記錄俄國社會的發展歷程，是筆者對當代社會的重要資訊來源。此外，筆者將利用白曉紅《俄國斯拉夫主義》、伊列里茲基《別林斯基的歷史觀點》、赫爾岑《赫爾岑論文學》重現當代社會的整體思想與氣氛，對比契訶夫作品，從中找尋當代思想的縮影，架構出當代社會的原貌。

關於作品，中外研究契訶夫的書籍眾多。由徐祖武主編的《契訶夫研究》，雖然年代久遠，但當中集合許多教授研究契訶夫的論文，當中不乏從作品主題或是敘事風格等不同方向探討作品的文章，是研究契訶夫的重要材料；劉皇杏教授關於契訶夫的研究甚多，其國科會研究成果《「契訶夫的書信：窺視作家的秘密」》更是筆者研究契訶夫觀點的重要材料；俄國研究契訶夫的大家則是 Катаев，他的著作有《契訶夫散文：說明的問題》（*Проза Чехова: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簡潔中的複雜.契訶夫的短篇小說與劇本》（*Сложность простоты. Рассказы и пьесы Чехова*）、《契訶夫與更多》（*Чехов плюс*）等，當中對契訶夫文本內容所作的精闢分析，讓筆者在探討文本時有更多參考觀點。

「異化」理論部分，為求深入理解「異化」理論哲學思想，得知理論的源頭，筆者從郎咸平、楊瑞輝《郎咸平帶你重讀經典資本論與國富論》著手，先對馬克思的理論基礎做通盤性的了解，接著藉由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理解其理論的源頭。孫中興《馬克思〔異化勞動〕的異話》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說明「異化」出現的前因後果；段忠橋《重釋歷史唯物主義》闡述馬克思理論的物質基礎；湯姆·洛克曼《馬克思主義之後的馬克思—卡爾·馬克思的哲學》藉由馬克思學者的研究重新審視了馬克思哲學；馮景源的《馬克思異化理論研究》是研究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專書，藉由上述書籍，筆者更能深入理解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立論基礎與其批判重點。

盧卡奇討論「異化」理論的代表作為其早年出版的《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本書為盧卡奇的論文集，當中盧卡奇討論了馬克思哲學、唯物主義、階級意識等重要議題，2009年的新譯版本還收錄了盧卡奇晚年再次回顧本書所撰寫的序言，自己點名了在當中出現的盲點，透過此書筆者可理解盧卡奇對馬克思哲學的理念；研究盧卡奇理論的專書還有宮敬才的《盧卡奇的哲學思想》，探討從《歷史與階級意識》到《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Social Existenceontology*)當中的變化，幾乎涵蓋了盧卡奇一生的哲學思想。孫伯鏞的《盧卡奇與馬克思》對盧卡奇與馬克思的哲學思想都有所著墨，從兩人思想的淵源開始論述，涵蓋範圍甚廣，是比較馬克思與盧卡奇珍貴的

資料。

韋伯一生著作橫跨政治學、經濟學，以及社會學等領域，研究韋伯的專書甚多，切入角度也有所不同。筆者先從馬克思·韋伯本人對自己的評傳《馬克思·韋伯》入門，再由朱元發《韋伯思想概論》著手，對韋伯的理論有通盤性的了解；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韋伯學術思想評傳》、本迪克斯（Reinrad Bendix）《韋伯：思想與學說》，以及韋伯本人的《支配的類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學術與政治》都闡明韋伯對於「祛魅」以及「官僚制」的看法，以及它們造成「異化」的過程。Ken Morrison《古典社會學巨擘－馬克思、涂爾幹、韋伯》比較了三大社會學家的理論，在分析馬克思與韋伯兩人的異化理論時，極有幫助。由於韋伯的思想涵蓋範圍甚廣，「異化」理論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必須大量閱讀韋伯本人的著作以及研究韋伯的專書，才能通徹地了解「異化」概念，因此除了以上所提專書之外，筆者也將採用研究韋伯思想的期刊論文輔助研究。

第六節 章節配置

緒論包括介紹論文寫作的動機與研究目的，簡單說明「異化」最原始的概念，並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以及馬克斯·韋伯的視角解釋當代的「異化」概念，介紹十九世紀俄國社會所面臨的變化，以及選取契訶夫文本作為分

析對象的原因，同時指出希望藉由本論文達到的研究目的；之後闡明研究途徑、方法，以及可能遭遇的限制；並回顧文獻統整及分類論文所需資料與書籍；最後確立論文架構，並進一步說明章節安排的原因。

第一章將說明本論文的理論背景——「異化」理論，同時深入研究當代俄國的社會狀況。第一節先從馬克思的視角說明「異化」概念，以深受馬克思影響的盧卡奇視角補充；接著從韋伯的角度說明「異化」現象的源頭與後果。第二節說明當代俄國的歷史背景，包含政經狀況、遭逢的變革以及社會風氣等，並對比當代文論，經由整理後理解當代俄國的完整面貌，以對作品有概括性的理解；第三節小結整理以上背景說明。

第二章從馬克思·韋伯視角著手探討與分析文本。第一節說明作者契訶夫的生平背景，並從故事主題、敘事手法與人物塑造等方面分析作品特色，找出「異化」現象對契訶夫作品的影響。第二節從文本中找出「異化」發生的成因，主要分成三個：身份弱勢、權力弱勢以及經濟弱勢，從三方面剖析前因後果，研究社會氛圍。第三節做出以上分析的小結。

第三章、第四章進入筆者對文本的深入分析。筆者在閱讀文本後，將作品中已知的「異化」現象所造成的影響分成內在和外在兩部份，第三章探討「異化」現象的內在反映，從價值觀的扭曲和自我的喪失出發，延伸討論生活目的庸俗化、道德標準降低、生活意義的缺乏、自我意識的消亡

四個問題，筆者將說明「異化」現象引發的問題，並採用文本論證自己的觀點。

第四章剖析「異化」主題的外在表現，從個人行為的異常和人際關係的疏離兩方面著手，觀察個人面對恐懼、庸俗、死亡的反應與人際間僵化、冷漠，甚至相互憎恨這些生活矛盾的來源，透過分析文本的輔助，可以理解當代俄國人民面對生活的複雜情緒。而將此章節「異化」主題的外在表現對照前一章節「異化」現象的內在反映，就能架構「異化」主題的全貌。

筆者擬用馬克思與韋伯兩人的異化理論對作品進行交叉分析來總結本論文，馬克思將重點擺在現實生活中經濟的弱勢；韋伯則關注在「官僚制」中個體的相對弱勢，兩者的理論觸及異化現象的主要因素：經濟、身分與權力等各方面的弱勢。異化現象在社會的猖狂，影響了人類的內在心理與外在行為。兩相對照之下，更能理解內在與外在環環相扣，加深了異化的威力，最後異化甚至腐蝕了人類的靈魂。

第一章 「異化」概述

第一節 「異化」定義

壹、 馬克思視角下的「異化」

馬克思的「異化」(alienation)理論與黑格爾(Georg Hegel, 1770-1831)息息相關，他早年受黑格爾啟發，從人道主義(гуманизм)出發的價值批判曾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占有一席之地，當時馬克思已經看出隨著私有制發展，人類步步將自己關進牢籠。馬克思認為，從原始以物易物的社會進步到以金錢為媒介的商品交換體系時，商品的價值對人類有了神祕的力量，這股力量彰顯在錯誤的追求物質生活、對金錢和商品過度迷戀上，然而，馬克思指出其中關鍵：物品具備的力量源自於人類主動和它產生的連結，而這個連結則是由資本主義猖獗的社會關係所型塑，對物質過度的信仰導致人們相處時容易將彼此視為商品的所有者，在人際間感受到威脅、爭奪，喪失了個體間的單純關係。¹⁴初期，馬克思的理論中充滿悲天憫人的情懷，到了後期，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形成，態度轉趨理性。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就是從那時起，開始了有別於

¹⁴ Ken Morrison 著，王佩妏、李旭騏、吳佳綺譯，《古典社會學巨擘——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台北：韋伯文化國際，2012，頁 118-122。

黑格爾式唯心主義的「異化」理論發展，他逐漸揚棄缺乏證據的價值批判，對歷史事實的科學分析取而代之成為唯物理論的基礎。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並非將價值批判棄如敝屣，只是對他而言，價值批判的出發點與尺度都必須經由歷史事實和客觀邏輯來評斷，不能與科學脫節，基於這樣的原則，他開始深入考察市民社會的經濟生活，將所觀察到的事物納入理論，在實踐精神下開創自己的「異化」理論道路。

不同於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常將「物化」和「異化」混為一談，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遵循了黑格爾對「異化」的看法，已觀察出「物化」(made material)和「異化」(alienation)的區別。馬克思將「物化」區分為兩種：一種是「對象化」(objectification)，另一種則是「異化」。「對象化」的定義為：勞動的產品(product)做為不依賴於生產者的力量(power independent)，與勞動相對立，勞動生產出的產品就是勞動者的對象化，¹⁵換句話說，產品就是勞動者的現實化，人做為生產者，將自己投射到產品的實際價值中，以產品的模式存在。而此處所指稱的勞動，則同時包含了體力勞動以及腦力勞動兩種勞動的廣義定義。對象化是指人類勞動在經濟關係中自然產生的物化，是人類勞動生產出價值的證明，對於「對象化」，馬克思並無非議，甚至認為這是對人能生產具體價值的一種肯定，馬克思真正批評的是第二種物化——「異化」。「異化」定義為：人做為勞動者，通過對象化的物化成為勞動產品後，就喪失了勞動產品的

¹⁵ 孫中興，《馬克思〔異化勞動〕的異話》，台北：群學，2010，頁23-24。

所有權，受限於勞動過程，並在產品完成後反過來遭受勞動產品奴役。¹⁶

青年時期，馬克思深受黑格爾影響，並繼承了黑格爾唯心主義色彩極重的「異化」思想，馬克思「異化」勞動的觀點出發自抽象的人的類本質，他曾說：一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徵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動物的生命活動就是動物本身，並不區別意識與生活；人則不同，人的生命活動就是本身意識和意志的對象，自由、有意識的活動就是人的類本質。「異化」勞動卻使得這種關係本末倒置，以致人正是因為有意識，才必須將本質變成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異化」勞動從人類手中奪取了人類的生活對象，也就從毀壞了人類的類本質。¹⁷

奠基於「異化」對人類的影響，馬克思將「異化」簡單區分成四種型式。首先是工人與其勞動產品的「異化」，產品在生產過程結束後就成為了獨立的存在，和生產者毫無關連；在意識上也違背了生產者的自我發展，因為生產者僅能獲取微薄的薪資，沒有對產品的掌控權，這時異化帶給工人的影響包含了生命活動的消耗、勞動產品被剝奪，以及關係的本末倒置——人身為生產者，為了謀生卻必須依賴產品。第二，馬克思認為，工人與自身的生產活動是相脫離的，工人無法在生產活動中發展任何屬於自己的能力，只有在諸如吃、喝和生殖等「動物本能」中能夠自由主動，¹⁸在這

¹⁶ 同註 15，頁 27-29。

¹⁷ 段忠橋，《重釋歷史唯物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389。

¹⁸ 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844 年經濟學哲

樣的情況下，生產者受限於僅能維持肉體生存的動物水平，無法讓自己有進一步的發展。從以上兩種型式的「異化」，馬克思推斷出第三種類型，即在現代社會中工人與人類生活相脫離，爲了滿足生活的各種需求，現代人多被禁錮在生產者的角色，丟失了生活其他的可能性，馬克思進一步地指出：工人與自己的身體、本性、精神生活甚至一般的人類生活中都有隔閡，無法自在活動。基於前面三種「異化」的論述，馬克思定義了第四種「異化」，也就是最後一種型式：個人不僅與自己相分離，而且與其他人相分離，這是由於在生產過程中個體間的聯繫都是建立在某種利益流通之中，不是真正的人際關係，過成中參與者也不具備自己的意識，人與人的關係存在著難以跨越的疏遠感。¹⁹

隨著馬克思理論的發展，馬克思的歷史觀轉向以科學做基礎的唯物史觀，在「異化」的思想也是如此，他的「異化」概念出發點轉變成現實的人，以對歷史事實的科學分析爲基礎進行價值批判。馬克思將滿足日常生活所需的生產活動視爲人們爲了生存而開始的第一個歷史活動，爲了能夠生活，人們每天固定完成工作。這樣實際的物質生產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須，只有科學地研究了人類物質生產發展的歷史過程，才能揭示「異化」現象的來龍去脈。

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 51-55。

¹⁹ 湯姆·洛克曼著，楊學功、徐素華譯，《馬克思主義之後的馬克思—卡爾·馬克思的哲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頁 101-102。

馬克思分析了「物化」和「異化」的差異後，將「異化」現象同現代工業化社會結合，他認為「異化」是一種社會生活的歷史現象，是隨著社會發展必然產生的結果，物質生產為「異化」提供了物質基礎以及發展平台，能藉由分析歷史事實、客觀推論，進而開始批判整個社會發展。馬克思將社會中「異化」的存在區分成以下兩種大情況來探討：第一種是隨著長時間的歷史演進，社會關係從原本單純的人與人的關係轉變成物與物的關係，接著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開始支配人的意識，進一步控制人的行為，成為一股不可抵抗的社會力量，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商品拜物教的出現；第二種是社會權力與人相異化，社會財富、權力聚集在少數人手中，被少數人支配，用來控制、奴役社會上的大多數勞動者，其突出的表現就是資本與制度的異化。²⁰

盧卡奇（Lukács György，1885–1971）以馬克思的觀點為基礎，發展出自己特有的論點。盧卡奇與馬克思一樣，認為「異化」是一種人類社會生活的歷史現象，是必然發生的結果；不同的是，盧卡奇只有區分「對象化」與「異化」。在盧卡奇看來「物化」就是「異化」的最初階段，他認為：單純的以生產使用價值為目的的「對象化」勞動不會導致「異化」，例如為了生產食物而捕魚、農耕都是此種單純的「對象化」勞動類型，但隨著勞動融入社會、物質生產與社會發展，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等經濟關係出現，

²⁰ 孫伯鏘，同註 2，頁 7-10。

人們開始無意識的衡量產品價值，「物化」就因而產生。²¹盧卡奇指出：資本社會中物質的存在與規律已經超出人類掌控，限制人類的自由，替所有物品訂定價值的「物化」行為隨著經濟關係發展轉變成「異化」，開始掌控人類，帶給人類無形的壓迫。

盧卡奇直接採用「異化」的概念，以純粹的價值批評來評論社會發生的「異化」現象。他認為，「異化」現象造成了一個存在於人之外的第二自然。第一自然就是自然界，人們只能藉由知識來了解它，無法用規律將其控管；第二自然是指和自然界相對應的另一個世界，它從人類的社會活動中衍生而出，隨著社會活動發展取得了類似第一自然的自然規律，反過來主宰著社會的一切，²²人在當中生活，只能被動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生活方式，真正的自由卻毫無保障。在異化的社會當中，物品的價值提升，人的價值卻降低了，這種氛圍反映個人意識和自由的喪失，預言了異化的世界中人類的命運。盧卡奇從經濟層面著手，對異化進行價值批判的同時，也看到了韋伯的憂慮，他認同韋伯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和官僚制兩者同樣藉由分工，將人類的生活和本質切割成無數個碎塊，迫使人只能如同機械般麻木地過活，為了抵抗這種悲劇，盧卡奇提出了充滿人道主義思想的訴求：跳脫階級，尋回人類真正的存在。²³

²¹ 孫伯鏘，同註 2，頁 338-341。

²² 徐祖武主編，同註 4，頁 1-2。

²³ 張西平，《歷史哲學的重建——盧卡奇與當代西方社會思潮》，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 147-150、152-157。

馬克思與盧卡奇兩人基本上有相似的觀點，也就是：異化不論就整體或部分而言，都存在於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從人類和日常生活的相互關係中產生而出，²⁴但兩人批判「異化」的視角有所差異：馬克思的批判重點指向現實生活中的奴役、壓迫和經濟上的榨取，盧卡奇批判的重點則是精神層面上人的獨立主體地位和自由意志的喪失。²⁵

貳、 韋伯視角下的「異化」

韋伯（Max Weber，1864－1920）認為「異化」源自於「祛魅」（Disenchantment）。「祛魅」為西方國家由宗教社會轉變為理性社會一系列的過程，是韋伯歷史哲學和宗教哲學的核心概念，也可譯為「除魅」、「去魅」、「去神祕化」等，是指「祛除作為達到拯救手法的魔魅之力（magic），使世界理性化的過程或行為」，過程中人們把宗教生活中一切帶有巫術性質或宗教實踐要素，例如通過宗教冥思、聖禮儀式以求自我救贖等活動，視為迷信與罪惡而加以祛除，日益從巫魅中解放出來，獲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體性地位。²⁶「祛魅」後，人類從原本受宗教主導的地位，躍昇為掌控世界的一方，世界從神聖化轉變為世俗化。

²⁴ 盧卡奇著，白錫堃、張西平、李秋零等譯，《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下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頁 680。

²⁵ 孫中興，同註 15，頁 7。

²⁶ 王澤應，〈祛魅的意義與危機〉，《湖南社會科學》，2009，第 4 期，頁 1-2。

「祛魅」的過程就是西方文明的發展史，綜合韋伯的思想，可以將「祛魅」分成以下幾層意思：祛除宗教中的巫術、魔法和神秘性；祛除領導人「魅力」(charismatic)的神祕光環，由魅力型支配向法制型的轉變；祛除傳統、情感，是價值理性而向工具理性發展的過程。第一點，在宗教上「祛魅」，西方國家藉由基督教新教倫理，幾乎排除所有具備神秘色彩的傳統宗教活動，例如：聖禮、懺悔、教會儀式，也否定經由在修道院苦修進而贖罪的可能，認為教徒們僅能靠在生時的世俗成就來確認上帝的恩寵，證明上帝的存在。第二點，在政治管理內「祛魅」，人們拋棄對領導人盲目的崇拜，以理性的眼光審視領導人的作為，使領導人不再具有神聖的光環，相對理性的法律規章崛起。第三點，在社會生活中「祛魅」，過去人們相信世界是一個有意義的體系，世界上各種事件的安排都有其內在的根據和理由，每個人只要能與這種神聖的秩序連繫起來，就可以獲得生活的目的和意義，個體生命也可以在這種有意義的體系裡獲得安頓。「祛魅」後，過去在生活上個人意識中的神聖性被崩解，人們成為自己精神的主宰，只能從世俗化的社會中尋找生命的意義。²⁷綜合以上三點，可以看出韋伯的「祛魅」擴及的層面不僅限於宗教，還包含了政治、社會生活。

韋伯將社會中的理性行動區分為兩種：價值理性行動 (value rational action) 與工具理性行動 (instrumental rational action)，前者是一種完全接

²⁷ 韓水法，同註 13，頁 1-4。

受絕對價值規範的導向的行動，行動者將一個特定的價值規範應用到行動中，並試圖實現那種價值所要求的目標，不論其中所需的代價為何，因為在這個行動中，最主要的是獨一無二的價值理想的實現；後者則是在行動時將手段、目的、結果，以及可能產生的次要結果都理性考量後，所做出的行動，追求的是「成功的極大化」與對全面狀況的掌控。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差別顯而易見，前者的目標確定，追求價值的實現不計代價；後者目標多元，運用計算權衡手段、目的，以追求最大效益。²⁸「祛魅」代表的是隨著社會發展，工具理性逐漸凌駕於價值理性，利益超越價值成為行動主宰的過程。

宗教改革、啓蒙運動，以及緊接而來的工業革命將「祛魅」活動推向高潮，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掀起波瀾，人們相信通過理性與計算可以分析一切，「意義」、「價值」等概念被「理性」驅逐，世界失去提供給人們客觀意義和價值秩序的功能，無法給個人任何的方向和目標。「祛魅」之前，宗教為個體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廣大的意義，宗教撫慰個人，幫助個人在生活中找到自身的價值與位置，這時，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同等重要，甚至工具理性是為了價值理性當中的信仰、理想而行動，但「祛魅」後，理性、知識，以及科學取代了原本宗教、道德的傳統地位，過程中工具理性逐漸凌駕於價值理性之上，一切都有理可循、有利可圖，成為了純粹經驗性的事情，但人類所追求的目標眾多，且相互衝突、難以共存，而人類內

²⁸ Ken Morrison，同註 14，頁 442-444。

心又缺乏一個共通的衡量尺度，分辨輕重緩急成了難題，許多人因此生活在價值與目標的抉擇之中，失去重心，生活空虛而沒有目的。²⁹個體在「祛魅」中逐漸失去對社會的歸屬感，而社會對個體則越來越漠視，兩者日益疏遠，「異化」便因此產生。簡而言之，「祛魅」帶領人們走向進步的世界，但也帶來「異化」現象，讓人對自己的生活產生諸多迷惘，不知何去何從。

韋伯認為，「祛魅」促成理性化的法治型支配（legal）——「官僚制」（bureaucracy）崛起。他將「支配」（domination）定義為一種引起服從的命令結構，³⁰分成以下三種類型：傳統型（traditional）、魅力型（charismatic）以及法治型，這三種統治類型是在不同的基礎上建立對服從的要求。傳統型支配確信淵源悠久的傳統的神聖性，正當性源自於過去的慣例，顯著的例子有封建制度以及世襲制度。魅力型支配出自對領導者個人魅力的傾服，賦予領導人對未來的願景以及提出的改革神聖性，正當性源自於對領導人的特殊情感，例如希特勒的崛起。法治型支配則是根據法律條文行事的統治模式，確信法令、規章合於法律，承認支配者在法律下有發號施令的權力，典型的法治型支配則是「官僚制」。³¹「祛魅」後，傳統型統治和魅力型統治失去其正當性，法治型支配成爲主流。

²⁹ 汪民安編，同註 3，頁 434。

³⁰ 馬克思·韋伯著，黃丘隆譯，《馬克思·韋伯》，台北：結構出版群，1989，頁 98。

³¹ 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等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台北：遠流出版社，1996，頁 7-8。

「官僚制」具有層級式機構，是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權責大小由上往下遞減，而每個層級的權責都有明顯的限制，在大規模的組織中，人類幾乎都無法避免官僚系統的控制。³²由於法條規章的存在，「官僚制」相當堅固，不容易被摧毀，在命令的施行下也顯得相當強勢，下層的個體幾乎無法表達自己的主見，只能服從上面傳達的指令，層層遞減的權力結構讓個體失去了為本身思想發聲的機會，無法推翻的合法性則讓個體逐漸變得麻木不仁，進而與社會逐漸疏離。在這種狀況下，個體被壓縮得越來越小，最終失去了個人意識與存在價值，只能麻木地聽從上層命令、遵守法令規章以及執行被指派的任務。

綜合韋伯的理論，「祛魅」為「異化」現象起了開端，隨著資本主義的興盛、官僚制的日益穩固，理性化的「官僚制」與資本主義相輔相成，官僚系統壓抑了層級不高的小官員，資本主義則抹殺了社會底層人物的意識，強化了「異化」現象，讓人類陷入「異化」牢籠。

第二節 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的「異化」現象

壹、 十九世紀末俄國社會的歷史背景

³² 同註 31，頁 25。

十九世紀上半葉，俄國思想界中除了東正教的教條之外，缺乏自身固有的傳統，因此當西方思潮湧入之初，俄國人無從比較，只能囫圇吞棗地接受，自此原本純粹接受東正教教義薰陶的俄國社會，開始「理性化」的過程，實際的觀察和分析逐漸占有一席之地，動搖原本穩固的俄國社會。十九世紀四〇年代起，俄國思想界整合消化西歐思潮後，分成兩派：「西化主義派」(западник)以及「斯拉夫主義派」(славянофил)。兩派都熱愛俄國、重視農民、抨擊沙皇政府以及反對西歐的資本主義社會，但在實際的作為上兩派各自有自己的主張，「親西化主義派」主張應該向歐洲取經，採用西方制度，促進科學發展，提倡個人權利，拋棄不切實際的宗教信仰；「親斯拉夫主義派」提倡維護東正教義，堅信俄國故有文化傳統可以帶領俄國走向康莊大道，認為西方的制度皆有害，過分重視現實，破壞了精神和心靈的純潔，讓一切都不復單純。雖然兩派都被保守的尼古拉政府以「製造動亂不安」的理由先後打壓，但思想開始流傳，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影響著俄國社會。³³

俄國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的失利，是自伊凡雷帝以來，歷經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凱薩琳二世、亞歷山大一世等沙皇以來對外戰爭中的首次戰敗，全國上下一致認為俄國應該盡快進行改革，否則將無法抵擋世界洪流，亞歷山大二世(1855-1881)甫接任就必須面臨改革的壓力。解放農奴成爲各界共同要求的焦點，人道主義者、自由派、激進派、經濟學家、

³³ 李邁先，《俄國史》，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9，頁231-232、243。

軍事家，甚至地主、保守官僚都贊同農奴的解放，1861年農奴制廢除，俄國正式踏入資本主義。俄國的農奴解放由上而下，並非農奴自主發起的變革，因此農民只獲得表面解放，僅少數農民成功翻身，成為握有土地的富農，多數被解放的農民生活困境未見改善，仍處於赤貧。留在鄉村的農民身分仍然是農奴，只是服務對象由地主，轉變成了國家、貴族，經濟負擔並未減輕，甚至需繳交的稅金還加重，貧無立錐之地的困境益發嚴重。部分在農村中無法維生的農民，被迫前往都市工廠工作，成為無產勞工階級，然而即使從農村前進到城市，被壓迫、奴役的現象絲毫未減。³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是個篤信專主專制的保守主義者，雖然在位期間俄國雖出現許多內政、財政、教育、司法、軍事等實務上的變革，但這些改革並非出自沙皇本身的意願，往往是由於客觀環境所逼，才迫使亞歷山大二世就範，因此雖然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期間被稱為大改革時代，但專制政府的精神壓力、現實生活的困境卻逼得人民喘不過氣，社會風氣極其壓抑沉悶，反動的情緒暗中漸長。

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在激進份子的恐怖行動中被暗殺身亡，大改革時代在風聲鶴唳中結束，亞歷山大三世（1881-1894）接任沙皇，採用的政策搖擺不定，增添社會恐懼不安的氣氛。政治上他承續亞歷山大二世的保守主義，變本加厲地禁錮社會思想，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間破壞地方自治、限制大學自治權，藉由官僚系統持續對人民的高壓統治，最令人詬病的是：

³⁴ 孫伯鏞，同註 2，頁 254、319。

他聯合貴族，以及資產階級對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讓專制氣氛的陰影籠罩俄國。另一方面而言，他是俄國工業化的推手，帶領俄國從農村社會走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段時期的工業建設帶領俄國往資本主義社會邁進。在專制卻又進步的矛盾氣氛下，大多數人們生活得陰鬱、毫無目的，恐懼、欲望時刻纏繞著他們，彷彿已經沒有任何事物具備正面意義，他們與社會疏離，而社會也將他們遺忘。

農奴解放前的俄國勞工是工業奴隸，政府無視其意願，強制調派農民前往工廠工作，他們目不識丁，沒有移動的自由，人在工廠，卻時時想回到農村；農奴解放後，這樣的狀況發生變化，開始有部分農民爲了生活自願前往城市的工廠，由於教育普及的結果，他們的知識程度提高，更有學習能力，勞工與土地的關係日漸冷淡，不再眷戀鄉村生活，一心仰賴工廠的雇用與報酬生活。十九世紀後期，城市發展影響原本的市民以及進城打工的農民，他們接觸到了非宗教、世俗化的價值觀念和行爲方式，資本主義影響了他們的物質生活，進而動搖他們的思維方式，這樣的變化又透過打工者，入侵了農民的精神文化，一系列理性化的活動，衝擊了人民心中的神聖性觀念，將他們內心崇高的信念逐一打破，面對生活時，理性、實用，以及個人主義因素增加。³⁵

³⁵ 米羅諾夫著，張廣翔等譯，《俄國社會史 個性、民主家庭、公民社會及法治國家的形成(帝俄時期：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頁 349-350。

俄國社會風氣在農奴解放後有明顯的改變，獨立性、個人意識與利己主義漸長，資本主義帶來的束縛浮上檯面，具體表現在人們的行為上，道德墮落、目無尊長、拋棄信仰、追求奢華等負面行為日益增加，人對物質的追求成為生活的桎梏，³⁶資本主義從十九世紀初起，緩慢而穩固地將俄國人民變成物質的奴隸。

貳、 十九世紀後期文論中的俄國社會

十九世紀初，自「十二月黨人事件」(восстан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以來，俄國籠罩在專斷的恐怖統治下，這段備受壓抑的時期卻是俄國文壇思想萌發的黃金時期，俄國文壇中以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 為首，已有許多作家開始由人道主義出發，藉由創作來批評腐朽的專制社會，並藉由描繪小人物無奈悲苦的生活表達他們的憐憫與同情。俄國文學中的小人物專指那些：

與上層沙皇統治集團相對立的人們，例如在官僚社會中品位較低的小官吏、文職員、破產的中小貴族以及貧民出身的知識份子、小市民等，卑微的社會地位迫使他們必須在強者面前卑躬屈膝，專制森嚴的等級制造成他們唯唯諾諾、逆來順受、仰人鼻息，以致完全喪失了人的自尊、自愛，成為畸形的人(扈娟著，1987：44)。³⁷

在文學作品中描寫小人物的角度隨著時代有所變化，普希金以貴族身

³⁶ 同註 35，頁 342、344、349-350。

³⁷ 扈娟著，〈契訶夫筆下的小人物〉，同註 4，頁 44。

分由上而下地觀察小人物，將他們視為無力反抗的弱勢族群，對其抱持悲憫的態度，而到了果戈里（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 1809-1852）筆下，小人物卻成為被調侃的對象，作家充分運用想像力，藉由小人物辛辣地諷刺俄國當時的亂象。³⁸小人物在各個方面的弱勢讓他們首當其衝遭到「異化」的毒手，成為反映社會險惡面貌的最佳題材，藉由作品評論社會的批判現實主義（кри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因而崛起成為文壇潮流。批判現實主義在俄國的發展獨特且深刻，知識份子覺醒後，開始藉由各種手段誠實地揭露俄國社會所遭遇的危機，通過評論、作品中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展現種種亂象：昏庸腐敗的官僚制度，貴族階層的空虛軟弱、地主的墮落頹廢、底層人民的落後受迫、資本主義的弊端與壓榨等，³⁹本節將介紹影響十九世紀後半葉俄國甚鉅的幾位思想家與作家，描繪出其時俄國社會的整體氛圍。

一. 思想界

自十八世紀下半葉以來，法國思想中的「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натурализм）隨著俄國上層社會與法國的頻繁接觸傳入俄國，俄國思想界深受法國影響，俄國宮廷與貴族家庭中聘用的西方教師日益增加，他們扮演文化交流的要角。經歷了 1812 年衛國戰爭與隨之而來對法戰爭的勝

³⁸ Nobokov, V. *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1, p.54-56.

³⁹ Т.С.格奧爾吉耶娃著，焦東建、董茉莉譯，《俄羅斯文化史》，2006，頁 405。

利，俄國軍隊志得意滿，凱旋而歸，但回國後，他們看見農奴制剝削俄國人民、君主專制壓抑民眾思想，祖國仍備受奴役，「人道主義」想法興起，革命之心油然而生，⁴⁰由青年貴族軍官領軍的「十二月黨人事件」就在這樣衝突的歷史背景下爆發，可說是啓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十二月黨人（Декабристы）堅決反對君主專制與農奴制，認為這兩樣制度違背人性，應該加以消滅，他們看準亞歷山大一世逝世後，繼位人選懸而未決的時機，發動叛亂，可惜除了少數領袖外，一般民眾對此次革命一無所知，尼古拉一世察覺到危機發生，便迅速鎮壓，處死為首五人，相關人等流放至西伯利亞苦寒之地，⁴¹在腥風血雨中登基，同時建立起君王威信。尼古拉一世確立俄國專制治國的三位一體原則：東正教、專制制度、國民性，認為俄國人民必須虔誠信仰東正教，服從專制制度，並在人民精神中找出俄國特有的民族性。為了避免「十二月黨人事件」重演，尼古拉一世設置了新的警察特務機構，負責偵查政治事件、滲透文學及戲劇等文藝活動、監視秘密組織與小組聚會、追蹤境內外國人士、研究農民狀況與暴動原因，主旨正是防範任何與政權對立的活動，對尼古拉政府而言，任何帶有革命性質或提倡自由的思想皆為異端，需予剔除。接著，他更大動作地設立了書報檢察制度，將白色恐怖的陰影嚴密地覆蓋在俄國知識份子之上。⁴²「十二月黨人事件」的爆發是俄國思想界的一顆震撼彈，活動迅速被鎮壓則標誌了俄國專制制度的高峰，事件過後，貴族階級開始沒落，平民知識份子

⁴⁰ 白曉紅，《俄國斯拉夫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31。

⁴¹ 孫伯鏘，同註2，頁222-223。

⁴² 同註39，頁32-33。

崛起，他們更貼近俄國民眾，領導了新一波的改革運動。

平民知識份子以別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為首，他思想上繼承十二月黨人的傳統，堅決反對農奴制，曾表示：「若是沙皇政府不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這個影響問題將會以對貴族而言更慘烈百倍的方式『自行解決』」。（Белинский，1847：438）⁴³基於對祖國的熱愛與對壓抑人民的痛恨，別林斯基自大學起，就著手撰寫反專制等反動色彩濃厚的文章為民喉舌，⁴⁴甚至因此被莫斯科大學退學。但別林斯基的文學活動並未因此中止，他先後在莫斯科的《望遠鏡》（Телескоп）、其副刊《雜談》（Молва）、《祖國記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等期刊雜誌發表文學評論，最後在《現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落腳。對別林斯基而言，文學與藝術都有獨特的使命與任務，文學評論家的責任便是讓群眾理解其中價值，因此他的文學評論結合文本詮釋與時事針砭，將讀者對作品的理解提升到更高層次。訓練讀者閱讀能力的同時，他更藉由評論呼籲俄國人民應起身對抗不公義的社會與制度，政府與當局御用文人不無諷刺地稱他為「文學暴徒」。⁴⁵ 別林

⁴³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омах. Т.12.*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26, с.438.

原文：если цар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е освободит крестьян от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этот вопрос "решится сам собою, другим образом, в 1 000 раз более неприятным для русского дворянства" 此處為筆者自譯。

⁴⁴ 伊列里茲基著，譚善余、丁文安譯，《別林斯基的歷史觀點》，北京：三聯書店，1956，頁 1-3。

⁴⁵ 布羅茨基主編，蔣路、孫瑋譯，《俄國文學史》（中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頁 602-606。

斯基後期最廣為人知的文學活動便是與果戈里的一番筆戰。果戈里創作後期，遁入「神祕主義」(мистицизм)，從展現社會不公的現實主義大將轉變為臣服於社會黑暗的宗教家，作品中充滿出世的宗教思想，1847年出版的《與友人書信選》(*Выбранные места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 друзьями*) 激怒了向來對果戈里作品讚譽有加的別林斯基，別林斯基認為果戈里以臣服於農奴制度，對社會不公妥協，⁴⁶徹底否定《與友人書信選》的價值，雖在病榻之間，仍大力抨擊：「當有人打著宗教的旗幟、藉著鞭子的掩護，將謊言與不道德當作真理和美德來宣揚時，是無法沉默的」。⁴⁷與果戈里的這番論戰是別林斯基的遺作，當中可以看見別林斯基的目標——從沙皇專制與農奴制解放人民，他的訴求影響整個俄國思想界，進而催生了日益激烈的革命理論。

革命理論道路的先行者為赫爾岑(А. И. Герцен)，他與別林斯基一樣深受「十二月黨人事件」影響，自年少時便立志繼承十二月黨人們的遺願——解放俄國人民，「這些人從絞架的高處驚醒了新的一代人的靈魂」(赫爾岑著，辛艾未譯，1962：59)，⁴⁸反動的思想使赫爾岑自大學起就被當局盯上，之後更被數度流放。過程中他更理解了沙皇專制與農奴制下的社會黑暗，深深同情無力反抗的人民，對政府的厭惡有增無減。自流放歸來後，

⁴⁶ 劉文飛，〈別林斯基與果戈里的書信論戰〉，《外國文學評論》，2006，第一期，頁14-16。

⁴⁷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3.*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8, с.707.

⁴⁸ 赫爾岑著，辛艾未譯，《赫爾岑論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頁59。

赫爾岑常隨著別林斯基一同參與文藝活動，引領先進的知識份子，同時也花了許多時間進修，在哲學、歷史、自然科學等各方面都頗有成就。⁴⁹赫爾岑的立場傾向左翼西歐派，參加提倡自由的社會活動，在其中注入革命思想，他所創作的小說也多與革命思想環環相扣。在沙皇政府的高壓監控下，赫爾岑以妻子患病為由前往歐洲，在此次的旅行中他對未來感到徹底的絕望，歐洲養尊處優的資產階級們與政府沆瀣一氣，殘酷地奴役、壓榨工人，他曾嚮往的改革夢碎，赫爾岑深陷悲觀情緒之中。⁵⁰當時俄國思想界中有兩股勢力在拉扯，一是提倡由上往下漸進改革的貴族自由主義，一則是鼓吹人們挺身而出推翻上層的革命民主主義，原本仍在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間晃蕩的赫爾岑，在 1861 農奴制廢除時看清貴族階級的偽善、沙皇政府的腐敗，終於投身至民主主義，雖人在海外，但赫爾岑持續運用文學活動灌輸俄國民眾革命思想，直至生命的尾聲。

閱讀別林斯基與赫爾岑長大的車爾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和杜勃羅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自始自終都站在革命民主主義的陣營，決心捍衛俄國人民。車爾尼雪夫斯基與杜勃羅留波夫年齡只差八歲，思想相近，皆認為唯有革命推翻專制政權才能為民眾謀得幸福，前者在《現代人》從事編輯工作，後者負責主持專欄寫作，兩人的工作相輔相成。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主張除了解放農奴之外，也發現了資本主義將帶給社會的危

⁴⁹ 同註 45，頁 631-635。

⁵⁰ 曹靖華主編，《俄國文學史（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155-158。

害，他認為：西方資產階級所謂的自由建立在壓迫與奴役的謊言之上，真正的自由應該藉由革命消滅這些不公義的現象，「一切真正美好的東西都是從鬥爭和犧牲中獲得的，而美好的將來也要以同樣的方式去獲取」(留里科夫著，韓凌譯，1956：58)。⁵¹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思想上領導眾人，杜勃羅留波夫則藉由文學評論重現藝術的價值。杜勃羅留波夫認為文學作品與一般民眾隔閡極深，雖然文學流派數量不少，但若沒有人解釋，文學作品永遠無法親近民眾，而民眾也不能理解文學作品，⁵²因此他自詡為別林斯基的繼承者，有責任利用文學評論幫助讀者理解作品的社會價值與藝術美感，一生致力於啓蒙人民。車爾尼雪夫斯基人生最後的光陰都被沙皇政府囚禁在西伯利亞苦寒之地，身心備受折磨；杜勃羅留波夫在出版社的繁忙業務與當局壓力下，英年早逝。兩人的現實生活都充滿苦難，但革命的意志從未被摧毀，兩人散發的星星之火，最終在半個世紀後大火燎原，摧毀沙皇政府。

二. 文壇

十九世紀七〇到九〇年代是俄國逐漸資本主義化，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時期。1861年農奴制的廢除，接著資產階級的崛起，資本主義在俄國落

⁵¹ 留里科夫著，韓凌譯，《車爾尼雪夫斯基》，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頁58。

⁵² 杜勃羅留波夫著，辛未艾譯，《杜勃羅留波夫選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頁385-386。

地生根，新事件接連發生讓批判社會的聲浪更爲高漲，反對沙皇專制、去除農奴制、與資本主義抗爭等議題持續發酵，除了上述的思想家之外，影響人民最劇烈的就是作家了。這段時期文壇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爲杜思妥也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托爾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以及契訶夫。

杜思妥也夫斯基目睹農奴經濟崩潰，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生活中充斥錯綜複雜的矛盾，這些情緒被杜思妥也夫斯基吸收並深化，納入他複雜的藝術創作中。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處女作《窮人》（*Бедные люди*），以彼得堡的小公務員傑夫什金（*Девушкин*）爲主角，他克勤克儉地生活卻僅夠維持溫飽，他膽小怯弱，缺乏獨立意志，性格中卻有著真正的人性：對現實不公的憤慨，著名評論家別林斯基對這個角色的註解爲：「他告訴我們，在一個最淺薄的人類天性裡面有著多麼美麗、高貴和神聖的東西」（別林斯基著，滿濤譯，1952：196）。⁵³杜思妥也夫斯基承續了自普希金、果戈里以降的「小人物」形象，並進一步詮釋小人物的複雜心理，展現他們在各方面弱勢下的無能爲力，⁵⁴作品中飽受折磨的角色們引起俄國社會的共鳴。他的天份在歷經生死關頭，流放西伯利亞後，更散發出光芒，後期作品《罪與罰》（*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白癡》（*Идиот*）、《群魔》（*Бесы*），以及《卡拉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當中充斥著神性和惡魔、善良與邪惡、聖人和罪人等矛盾，展現了杜思妥也夫斯基思想中宗教與哲

⁵³ 別林斯基著，滿濤譯，《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上海：時代出版社，1952，頁196。

⁵⁴ 同註50，頁306-309。

學的深度。杜思妥也夫斯基思慣用由內而外的描寫手法，讓讀者從角色的痛苦、磨難中看見另一個世界，而作家提出的：「相信善，相信上帝，相信自己」，⁵⁵為在異化中迷失的俄國人指引了一條明路。

托爾斯泰是俄國文壇中寫實主義的巨匠，最著名的作品為《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 與《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不論風格或內容都是俄國小說發展的里程碑。1861年農奴解放，托爾斯泰開始農村教育的工作，對農民及社會問題都相當關注。托爾斯泰發現新興的平民知識份子興起，遠離人民的貴族階級正慢慢退出社會舞台，這種變化催生了《戰爭與和平》，作家透過歷史的考察思考群眾與貴族的關係，並在其中尋求社會問題的答案。完成以歷史為背景的《戰爭與和平》後，托爾斯泰仍為各式社會問題所困，著眼於俄國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的動盪，作家創作了《安娜·卡列尼娜》，藉由當中主要的兩條故事線反映俄國城鄉變化，並反思虛偽、僵化、道德低落、貧富差距等種種社會問題，⁵⁶進一步探討倫理與道德，迫切地找尋人生的意義。這兩部作品是托爾斯泰創作成熟的里程碑，也是精神折磨的開端，他發現資本主義迅速的發展根本無益於廣大農民的苦難，但對這樣的趨勢一籌莫展，只能潛入宗教、求著上帝，動筆寫了一系列宗教故事，討論問題的同時積極宣揚自己的信仰。⁵⁷七0年代，托爾斯泰的信仰體系已發展健全，他確信農民的生活公平而道德，反對官僚、

⁵⁵ 李卓璋，〈「接受美學」觀照下的杜思妥也夫斯基—以《罪與罰》與《卡拉瑪佐夫兄弟》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頁33-38。

⁵⁶ 李明濱，《俄羅斯文化史》，台北：亞太圖書，2000，頁172-178。

⁵⁷ 歐茵西，《俄羅斯文學風貌》，台北：書林出版社，2007，頁145-148。

地主等寄生的生活模式，《復活》一書更直接辛辣地揭穿貴族及資產階級的假面具，戳破他們奠基於苦難人民的奢華生活，抨擊以沙皇政府為首的官吏、警察、法庭都是壓榨人民的強盜。⁵⁸托爾斯泰清晰的思路與寫實的文法影響文壇甚鉅，嚴厲而真實地敘述、指責他最愛的祖國正被不事生產的既得利益者侵蝕，描繪當代「異化」現象不遺餘力。

第三節 小結

結合十九世紀中葉起的俄國歷史背景與文壇發展趨勢，可以觀察到作家們共同批判的敵人，也就是以下數種「異化」現象：君主專制的「異化」、官僚體系的「異化」、農奴制的「異化」，以及最後進入俄國，但擴張迅速的資本主義的「異化」與科學的「異化」。

君主專制的「異化」導致沙皇的高壓統治，使得社會人心惶惶，而勇於反抗的公眾人物卻常常被政府視為叛亂份子，處以刑罰或流放至西伯利亞、高加索等偏遠地區；君主專制的「異化」後，帶來農奴制的「異化」，造就一批不事生產的地主與貴族階級，他們仰賴農民的勞動而活，卻自視甚高，經常隨意輕賤農民，隨著解放農奴，資本主義發展，這批階級在頹

⁵⁸ 庫得利亞雪夫著，李欣治譯，王兆徽編著，《俄國文學論集》，台北：四季出版社，1979，頁 193-194。

廢中沒落。緊接著入侵俄國的是資本主義和科學的「異化」，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在俄國各個角落發酵，傳統道德觀念受到衝突，人民不可自拔地陷入追求名利的漩渦當中，與此同時，隨著科學一同壯大的是以人為本的觀念，人們相信自己是生活的主宰，從工具理性的角度理解世界，仰賴數據分析，相信萬物皆可以觀察出規律，科學成爲唯一可信的世界觀，隨著對宗教的祛魅，人們徹底忽略了生活本身的神聖性與其帶來的美好意義。

同時在數種「異化」中打轉，俄國顯得茫然、混亂，如同先知般的文學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動盪不堪的俄國社會中替愚昧的人民開路，批判性寫實主義大放異彩。契訶夫繼承批判性寫實主義的傳統，同時也作了影響甚鉅的革新。與其他批判性寫實主義的作家不同，契訶夫擅用日常生活的元素勾勒背景，將細節轉變成故事要素，不追求內容高潮迭起，專注在人物的心理活動，不同於杜思妥也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契訶夫甚少描繪人物心理轉折的細節，多用人物的行爲舉止暗示人物本身的精神狀態。⁵⁹另外，相較於這兩位作家，契訶夫與自己作品的距離更爲疏遠，客觀冷靜，鮮少出現明顯的個人傾向，有時甚至被詬病爲對筆下事物漠不關心，不過筆者認爲，正是由於對個人觀點的小心處理，才能完整體現當代時空背景，而這也是筆者選擇由契訶夫的作品著手研究「異化」現象的原因之一，下一章筆者將說明契訶夫的身世背景與創作經歷。

⁵⁹ 同註 35，頁 371-373。

第二章 契訶夫前期短篇小說作品中的「異化」

脈絡

第一節 契訶夫生平

契訶夫寫作風格隨著時間變化，通常被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創作之初至 1886 年，此時筆觸尚未成熟，作品為反映現實的幽默小品，藝術價值較低；第二階段為 1886 至 1892 年，契訶夫接受其他文學家的建議開始深化作品，風格逐漸確立；最後一個階段 1892 年至逝世為止則是契訶夫思想、藝術均臻成熟的時期，此時的小說最受重視，劇本也獲得極高的評價。風格轉換與契訶夫生活經驗息息相關，本節將探討契訶夫生平經歷與創作風格，從故事主題、敘事手法與人物塑造等各方面分析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找尋「異化」現象在作品中出現的脈絡，以對作品有更深刻的體悟。

壹、 人生經歷

中學時，父親破產，舉家遷往莫斯科避債，契訶夫因求學問題獨自留在家鄉塔甘羅格（Таганрог），藉著家教與其他散工賺錢以完成學業。塔甘

羅格地處偏僻，距離人文薈萃的聖彼得堡與莫斯科都相當遙遠，當代報刊雜誌未能對少年契訶夫產生影響，他在生活困頓之中開啓自己特殊的創作道路，獨立發展出與當代文學思潮不同的風格，在這段期間契訶夫開始動筆寫出帶有幽默風格的短篇故事，是作家創作生涯的開端。⁶⁰契訶夫完成高中學業後，前往莫斯科的醫學院就讀。此時，青年契訶夫接觸到大量的流行雜誌，開始順應出版社與讀者需求創作，藉由寫作賺錢維生。1886年當代文學家格里戈羅維奇（Д. В. Григорович）⁶¹寫給契訶夫一封信，主旨是希望契訶夫能夠在創作上多加節制，珍惜難得的寫作天賦，將這些靈感使用在經過深思熟慮而寫出的作品，這個建議對契訶夫本人而言無疑是極大的肯定，而這封信也同時引起蘇沃林（А. С. Суворин）、畢里賓（В. В. Билибин）以及普列謝耶夫（А. Н. Плещеев）等當代文學家的響應，在這些文壇前輩的指領下，翌年契訶夫開始創作一系列的嚴肅作品，當中出現挖苦、嘲笑、諷刺之外更深的意義，風格與過去的小品迥異，契訶夫走向了真正的文學之路，⁶²此時期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大獲好評的〈草原〉（*Степь*）。

隨著寫作風格轉換，契訶夫的作品大放異彩，文壇對契訶夫的創作讚

⁶⁰ Батюшков Ф.Д.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http://www.my-chekhov.ru/articles/old1.shtml>) (2013.07.13)

⁶¹ 格里戈羅維奇是當代俄國文壇大老，和別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相識，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私交甚篤，對文壇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⁶² Чехов А.П.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П.Чехова*. М.: Наследие, 2000, с.264-267.

譽有加，由於寫作的中立態度、不為各派別、主義與思潮束縛的客觀風格，契訶夫被當代著名作家柯羅連科（В.Г. Короленко）認為「自由的藝術家」。

⁶³契訶夫意識到身為作家肩負的社會責任，與此同時，他卻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缺乏一個明確的世界觀：「政治方面、宗教方面、哲學方面的世界觀我還沒有，我每個月都在更換著」（契訶夫著，汝龍譯，1958：100）。⁶⁴契訶夫戰戰兢兢地維持「自由的藝術家」的美稱，除了透過作品承認自己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以外，堅定地婉拒表達任何政治立場，因此他一方面揭露當代社會的瘡疤，反映人民違背常理的混亂生活；另一方面卻又遠離社會政治鬥爭，獨善其身，然而隨著作品接觸層面的深化，契訶夫的思想矛盾終於激烈到無法可解，作家的深切自省在〈沒意思的故事〉（*Скучная история*）當中可窺一二。為了貼近社會、擺脫思想困境，契訶夫無視虛弱的身體狀況，策畫了影響他此後創作的「薩哈林之旅」。⁶⁵

1890年，契訶夫隻身一人前往庫頁島，克服身體羸弱、交通落後、天氣惡劣、食宿條件極差等諸多不便，從北而南，幾乎走遍了島上所有能夠到達的居民點，將一切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由於這次的出走，契訶夫的理念有了大幅度的改面，除了內心更貼近群眾之外，主因就是他在庫頁島看見了沙皇統治下最殘酷的一面。庫頁島，又稱薩哈林（Сахалин），是俄國最大的島嶼，位於北太平洋，是沙皇流放犯人之地。薩哈林的自然風光

⁶³ 同註 60。

⁶⁴ 契訶夫著，汝龍譯，《契訶夫論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頁 100。

⁶⁵ 任子峰，《俄國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390-391。

壯麗，富含天然資源，但除去以上兩點，在薩哈林服刑的犯人日常生活要面對的是：陡峭的海岸、難以通行的森林與沼澤，濕冷的氣候、湍急的河流，討人厭的蚊蟲，以及地獄般的礦井和燃燒的山火，⁶⁶崎嶇的自然環境讓犯人的生活更難熬。根據〈薩哈林旅行記〉（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所記錄，契訶夫認為薩哈林從下酒用的鯨魚肉到一切日常的談話，處處使他感覺到特殊的異國風情。⁶⁷

當時薩哈林的知識界道德低下、品格卑微，卻負責管理流放至此的犯人，他們狐假虎威，荒淫暴虐，把監獄當成妓院和賭場經營，對囚犯為所欲為，痛打施虐的情況是家常便飯，而在薩哈林服役的人口五年更迭一次，流動率極高，什麼事都容易被淡忘，檔案記載大部分殘缺不全，⁶⁸多少犯人仍在服役、多少意外死亡、多少逃跑都不得而知，鬆散的管理與毫無章法的制度可見一般，契訶夫對於這樣的狀況十分感嘆，內心興起抗爭的念頭。自薩哈林歸來後，契訶夫確定了自己的立場，這同時也是契訶夫與托爾斯泰的「勿抗惡主義」（непротивленство）分道揚鑣的分水嶺。托爾斯泰的「勿抗惡主義」過去影響契訶夫甚鉅，「勿抗惡主義」的核心觀念源自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托爾斯泰認為要消除這種專制暴力，必須先從自

⁶⁶ 金濤，〈契訶夫筆下的庫頁島〉，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1/11/251519.shtm>）（2013.09.22）

⁶⁷ 契訶夫著，刁紹華、姜長斌譯，《薩哈林旅行記》，哈爾濱：黑龍江出版社，1980，頁3。

⁶⁸ 同上，頁256-260。

身的道德完善做起，不能以暴制暴，⁶⁹「勿抗惡主義」與「自我道德完善」是托爾斯泰的理念，也曾被契訶夫視為真理，但經過薩哈林之旅，契訶夫拋下了托爾斯泰獨善其身的觀念，決心以筆做為武器，同專制、暴力、醜惡、不公抗爭，⁷⁰作品當中反抗的色彩日益鮮明。

確定立場後，契訶夫將文學觸角進一步伸入農村。1892年起，契訶夫全家遷居莫斯科郊區的梅里霍沃莊園（Мелихово），先後生活了六年，協助農民開辦學校、賑濟災民、調查戶口，並在霍亂流行時擔任醫官，宣導防疫，⁷¹進駐農村使得他更貼近農民，創作出描繪農村社會的一系列作品。契訶夫在農村看到的是明顯的階級分化，新興富農得勢，貧農更加孤苦無依，矛盾越演越烈，就客觀條件而言，徹底的社會變革勢在必行。現實生活中，契訶夫個人提倡改革的旗幟也越發鮮明，在各種為正義而戰的社會活動中都能找到他的蹤影，面對為爭取自由而遭到監禁的青年學子，他也不吝於提供經濟資助。⁷²契訶夫抗爭的精神到創作晚期越發高昂，但身體卻深受肺結核所苦，在不同的療養聖地穿梭。即便如此，契訶夫仍堅持自己的信念，孜孜不倦地創作，如此律己甚嚴，從同代作家布寧（И. А. Бунин）的回憶錄就可知一二，契訶夫年長布寧十歲，總是對布寧諄諄教誨，曾告

⁶⁹ 郭新峰，〈論托爾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惡」思想〉，《柳州師專學報》，2010，第25卷第1期，頁79-81。

⁷⁰ 同註 63，頁390-392。

⁷¹ 李明濤編著，《契訶夫》，台北：國家出版社，1993，頁39-41。

⁷² 同註 63，頁401。

訴布寧：「人必須不惜一己之身的工作一生」。⁷³而契訶夫本人就樹立了最好的榜樣。

契訶夫從未正式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場，卻藉由一篇篇的作品表達對沙皇專制的憎恨、社會混亂的無奈，以及對庸俗毫無知覺的人民的憂心，對作家而言一生的敵人就是各式各樣的不公義，他以筆做利刃，劃開發展浮華表面下的腐敗。⁷⁴物質名利、專制制度在社會發酵成爲一個毒瘤，欲望與價值衝突讓人類有限的的能力顯得無所遁形，專制制度連人類內心的自由都奪走，契訶夫是有前瞻性的作家，比誰都更早一步發現「異化」現象對人心的腐蝕，表面上人類能夠掌控生活，實際上卻受困於堅不可摧的牢籠。身爲一個醫生，契訶夫完全理解社會進步的過程帶給人類多麼大的福祉，但是同時他也逐漸理性地意識到：科學的光芒不能照亮世界的黑暗，金錢無法真正滿足個人，而專制制度更是人心的牢籠，契訶夫作品中多的是不學無術的知識份子、坐困愁城的人們，他本人卻恰好是那些角色最尖銳的對比，契訶夫深深明白自己作爲作家的道德義務：藉由創作喚醒社會、教育人民，而他不僅創作，更藉由實際的行爲走入民間，爲人民謀求真正的福利與未來。

⁷³ Gorky M., Kuprin A.I., Bunin, I. A., Koteliansky S. S. (tr.), Woolf L. (tr.), *Reminiscences of Anton Chekhov*. New York: B. W. Huebsch, 1921.

(<http://www.eldritchpress.org/ac/gorky.htm>) (2013.09.24)

⁷⁴ **Nobokov, V.** 同註 38，頁 245-247。

貳、 風格轉變

創作初期，契訶夫爲了養家餬口而寫作，他尙未發覺自己的天賦，也還沒意識到身爲作家的社會責任，只是任由靈感帶領，在漫不經心中完成一篇篇作品。⁷⁵這些作品篇幅礙於雜誌規定，字數受限，但契訶夫結合時事，配合強烈的幽默色彩，讀者熱烈的反應稍微紓解了契訶夫的生活困境，著名的有：〈胖子與瘦子〉(*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小公務員之死〉、〈變色龍〉(*Хамелеон*) 等令人發噱的小品。契訶夫的創作天賦在這個時期的作品已見端倪，但由於作家本人寫作時只求速成，未經深思的緣故，這時期作品文學價值與後期作品相比，顯得相形見绌，他本人也對此時期的作品不甚滿意，到後期出版文集時，刪去了大部分。

1886 年，契訶夫創作了〈苦悶〉(*Тоска*)、〈暈〉(*Спать хочется*)、〈萬卡〉(*Ванька*) 等膾炙人口的短篇作品，當中詼諧色彩漸褪，作家對社會問題的關心浮出表面，此時作品除了描繪角色的生活外，更增添對這些無力反抗的人物的同情，是契訶夫思想躍進的象徵。契訶夫曾自白：從未自認識的作家口中獲得對自己的寫作的認同，而他終於等到了肯定，⁷⁶而格里戈羅維奇的來信更加深契訶夫以文學爲民服務的信念，此時期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草原〉，藉由主角純真的眼光，作者描繪出典型的草原模樣，然

⁷⁵ 同註 60。

⁷⁶ Громов М.П. *Чехов*. М.: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93, с.144-147.

而在美好的自然中馳騁的卻只有貴族、商人和神父等與草原不相稱的人，年幼的主角幻想，同時期待著不一樣的未來，編織了未來俄羅斯大地將由人民主宰的美夢。〈草原〉創新的風格甫刊登即大獲好評，但風格轉換的過程對契訶夫來說極其不易，他本人曾打趣地提及自己生性粗野，率先走上新的道路難免感到窒礙難行，但隨著〈草原〉面世，契訶夫逐步確立自己的風格。⁷⁷〈草原〉展現了當代俄國人無邊無際的哀愁與煩惱，〈沒意思的故事〉是這個時期繼〈草原〉之後的代表作，〈草原〉表達了俄國人面對生活苦難產生的無盡憂傷，〈沒意思的故事〉，則揭露了當代俄國人在「異化」中的茫然無措，同時也展現作家對自身思想困境的反省。

〈沒意思的故事〉可視為契訶夫最初深入描述「異化」主題之作，主角——教授尼古拉·斯捷潘維奇（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是個典型「異化」的人物，少年得志後一直虛度光陰，臨終前才意識到自己的靈魂被侵蝕得一點不剩，生活扣除瑣碎、無趣的細節後一無所有，尼古拉·斯捷潘維奇代表著缺乏崇高理想的知識份子的悲劇，映證了日後韋伯對「異化」後個體自由的悲觀態度：學術化、官僚化和資本主義表面上滿足了個體的欲望，實際卻壓抑了人的自由，成爲一種威脅、煩惱，而非促進，⁷⁸這篇小說展現了契訶夫本人思想發展的困境，同時是作品中出現「異化」特徵的一個開端，接下來他創作的小說、劇本中都出現與「異化」核心息息相關的人、

⁷⁷ 同註 76，頁 147-149。

⁷⁸ Christian Schwaabe，〈馬克思·韋伯——現代世界的祛魅〉，2011，
(<http://www.goethe.de/ins/cn/lp/kul/mag/que/zh8250983.htm>) (2013.11.04)

事、物的蹤影。

爲了擺脫思想困境，契訶夫決定更貼近人民生活，他策畫了薩哈林之旅，隻身前往，深入了解當地風俗，與囚犯們進行交流。經過薩哈林之旅的洗禮，契訶夫的政治傾向變的明確，他不再不問政事，鮮明的立場開始在作品中浮現，展現了反抗沙皇專制的決心，《薩哈林旅行記》記載了大量實地考察的結果，沙皇專制制度的黑暗躍然紙上；著名作品〈六號病房〉（*Палата № 6*, 1892）更是藉由醫院內發生的大小事指桑罵槐，毫不留情地痛批沙皇，後期的寫作風格儼然成型。⁷⁹進駐農村後，契訶夫更是將農村生活血淋淋地展現在紙上，農民生活困頓，資本主義發展與沙皇專制交互作用，在農村生活不斷地強加重擔，〈農民〉（*Мужики*, 1897）描繪了貧無立錐之地的農民艱苦的生活，彷彿只有死亡才是出路；〈在峽谷〉（*В овраге*, 1900）中完整呈現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何摧毀人心、泯滅人性。

進入農村後，契訶夫發現官僚制度與資本主義的「異化」早已對人民伸出魔爪，此時風格展現和以前不同的風貌，對社會的譴責更強烈，對人性的純美更推崇，作家開始將本人意志與希望投射在作品所傳達的理念中，〈洛希爾的提琴〉（*Скрипка Ротшильда*, 1894）當中亞可夫（Яков）死前的悔悟，展現作家想以人性的光輝喚醒人們的企圖；在〈老花匠的故事〉

⁷⁹ Debreczeny, Paul. *Палата № 6-причта или патолог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Munchen: Verlag Otto Sagner, 1997, с.83-85.

(*Рассказ старшего садовника*, 1894) 中，契訶夫更藉由的老花匠米哈依爾·卡爾洛維奇 (Михаил Карлович) 故事中的宣判殺人被告無罪的主審官之口，宣揚自己對人性的信念：

就算這個宣告無罪的判決會給小城的居民帶來損害，但是另一方面，你們想想看，這種對人的信心是不會死的，一定會對我們產生良好的影響。這種信心會在我們心中培養寬宏大量的感情，永遠促使我們熱愛和尊敬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這才是最重要的！（T.8, C.346）⁸⁰

只有最純粹的情感才是苦悶的現世生活中的一縷微光，使人在苦痛中仍存有一絲希望，朝向更美好的未來前進。在後期作品中，契訶夫展現好惡分明的觀感，追求自由，抨擊沙皇專制與盲目追求物質的人們，同時，作家也創造出其他當代人物的典型，這時契訶夫批評的對象已從表面的社會之惡，深入到人性的自甘墮落，例如〈文學教師〉(*Учитель словесности*) 順應生活的文學教師尼基丁 (Никитин)，庸庸碌碌直到最後才覺醒；〈套中人〉(*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 1898) 主角中學教師別里科夫 (Беликов)，在沙皇專制下心懷恐懼地過活，也將恐懼傳染到四周；〈帶小狗的女人〉中茫然度日的銀行職員古羅夫，只能藉由拈花惹草，在毫無意義的生活尋求刺激。契訶夫將醜惡的真相從生活中顯示出來：人們對自己混亂的生活毫無意識，隨波逐流的下場就是變成庸俗的人，一生毫無意義與樂趣，對社會也毫無貢獻。

⁸⁰ 本論文契訶夫短篇小說引文皆取自 Чехов А. П. *А.П.Чех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Том I-XII*. М.: Наука，之後僅標記冊數與頁數，不再作注。中文翻譯參考：契訶夫著，汝龍譯，《契訶夫全集》，上海：上海譯文，2000，並略做修改。

即使在人生的最後，契訶夫仍不只一次在作品中呼喚人們，希望人們從庸俗中覺醒，追尋美好的生活，他在病榻之中寫下遺作〈未婚妻〉（*Невеста*, 1903）。這是契訶夫所有作品中的最後一篇，同時也是最具樂觀色彩的一篇，當中描繪生活條件的艱難以及將遇到的困境，但也表達對人類的信心，勾勒美好的願景，只要從最基本的生活改變，未來就不可限量，如同女主角娜佳（*Надя*），期待著光明的未來，雀躍地收拾行李，要永遠離開那個裹足不前的小鎮，向往後的璀璨人生邁進。⁸¹

第二節 契訶夫前期短篇小說作品中的「異化」成因

契訶夫本人自年幼起就深受經濟問題困擾，歷經家庭破產，舉家遷往莫斯科，到了進醫學院後，都還是在社會底層掙扎著謀生，深明金錢對生活的影響，寫作初期逼迫自己大量生產以獲取稿費維持基本開銷與改善家庭生活，契訶夫根據出版社的要求創作，文章多少帶著譁眾取寵的意味，契訶夫本人對這些滑稽都逗趣的作品並不滿意。

初期作品受限於雜誌規定篇幅短小，契訶夫養成用語簡練的習慣，他的敘事手法不同於當代名家杜斯妥也夫斯基與托爾斯泰，與文壇前輩屠格

⁸¹ 同註 60。

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大體上較為相近，兩者同樣善用外在環境烘托故事情節，但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的契訶夫用字遣詞必須捨去更多細節，讓讀者能更迅速進入狀況。日後，作家也一直將「簡練」奉為創作圭臬，在與友人蘇沃林的書信中也強調：「怪事，我現在對簡短的東西有股狂熱。不管我讀到什麼，自己的也好，別人的也好，總覺得不夠簡練」。⁸²此時期雖然缺乏深度思考，但也誠實展現當代社會的風貌，觸碰到異化在生活表面的象徵。

契訶夫能自由創作後，風格漸趨嚴肅，哀傷婉轉的聲調開始在作品中迴響，筆者以 1890 年契訶夫的薩哈林之旅前後為界，將契訶夫作品中的異化現象區分為「社會之惡」與「人心異變」兩種類型，本節將就前期作品展現的「社會之惡」，根據「異化」現象出現在當代社會的徵兆架構出人心異變的社會背景。

壹、經濟

貧窮是契訶夫初期作品中的慣有氛圍，幾乎也是所有故事發生的背景，如同在〈市集〉（*Ярмарка*, 1882）中描述的场景一般，多數人們總是缺錢：

⁸² Чехов А. П.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Т. 3.* М.: Наука, 1976.

(<http://chegov.niv.ru/chegov/letters/1888-1889/letter-591.htm>) (2014.01.22)

啊，要是有錢就好了！五戈比銅幣和十五戈比銀幣，你們在哪裡呀？戴著父親的帽子在市集走來走去，東張西望，聽聽這個，摸摸那個，再聞聞別的，身邊卻連一毛錢也沒有，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更糟糕、難受，或惱人的事了。可是也有像費玫希卡或者耶果爾卡那樣幸福的，可以花一戈比買冰淇淋吃、或買把小槍，砰的放一槍，響得人人都能聽見，甚至能用五戈比硬幣買匹小馬！（T.1, C.249）

寥寥數語將社會貧富差距刻劃的一清二楚，富人能夠恣意購買不是生活必需的娛樂品，而窮人卻連基本的溫飽都有問題，必須竭盡所能賺錢，「他們饑腸轆轆，衣衫襤褸，神情憔悴，面帶病容，身體消瘦，不住在舞臺上扭動身子，竭力做出一臉的傻相，好讓場子裡多一個咧著嘴笑的人，好多拿一枚十戈比硬幣」（T.1, C.250）。資本主義在原本就困頓的農村萌芽，不僅毫無助益，還可能加劇貧富差距，因為對個人財產的佔有慾就是罪惡的起源，人們只專注保衛財富的同時，戰爭、犯罪、墮落等不正義的行為都將隨之而來，越追求，失去的就越多，苦難將席捲現實與心靈兩個層面，⁸³貧富差距已讓緊接而來的異化現象露出端倪。

無邪的孩童還未正式接受社會的洗禮，對經濟影響人的感受最為直接，反應也不加修飾，因此契訶夫前期作品中常常以小孩做為故事主角，從孩童純真的觀點出發更能引起觀眾對社會問題的關注，⁸⁴〈廚娘出嫁〉

⁸³ Rius, 〈馬克思〉, 台北：立緒文化，1996，頁 79-80。

⁸⁴ Roland, L. Johnson, *Anton Chekhov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s*.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Canada, p.37-39.

(*Кухарка женится*, 1885)就是一例。〈廚娘出嫁〉中七歲的格里沙(Гриша)站在旁邊偷聽大人的談話，聽聞女廚師將嫁給粗野的馬車夫，當下充滿疑惑：「廚娘要結婚了……奇怪，我不明白人為什麼要結婚。媽媽嫁給了爸爸，表姐薇洛琪卡嫁給了帕維爾·安德烈伊奇」(T.4, C.136)。而最令他不解的是，和馬車夫的婚姻顯然毫無利益：「不過，嫁給爸爸和帕維爾·安德烈伊奇還情有可緣，畢竟他們有金錶鏈和講究的衣服，皮靴也總是擦得亮晶晶，可是嫁給那個可怕的馬車夫，生著紅鼻子，穿著氈靴……呸」(T.4, C.136)！格里沙小小年紀就認知到財富的力量，而在他純真的心中，婚姻價值取決對象的財富，金錢「異化」的影響力已在不知不覺中滲透幼童腦海，形成某種偏差的價值觀。

在金錢導向的俄國社會，追求財富蔚為風潮，錢是當代社會的信仰，也是行事的準則，就像〈在理髮廳〉(*В циркульне*, 1883)的神父艾拉斯特·亞果多夫(Эраст Ягодов)優先考量金錢，將人際間的承諾視之無物。理髮師瑪卡爾·布列斯特金(Макар Блесткин)「是個小夥子，年紀二十三歲上下，沒有漱洗，髒兮兮，卻打扮時髦」(T.2, C.35)，理髮廳的擺設也給人同樣寒酸的形象，「旁邊有張小桌子，也像瑪卡爾本人那樣髒兮兮的。桌上放著各種東西，梳子、剪刀、剃刀、便宜的撲粉、廉價而且加了很多水的花露水，應有盡有」(T.2, C.35)。艾拉斯特做為神職人員，同時也是理髮師的教父，卻為了金錢狠心拆散理髮師與自己的女兒，因為「整個理髮店加起來，也不過值五枚三戈比銅幣而已」，他坦白表示：「你怎麼配做新

郎呢，瑪卡爾？你憑什麼做新郎呢，沒錢，沒地位，這個手藝也沒有什麼出息」(T.2, C.37)。艾拉斯特毫不遮掩其利益取向的行爲，振振有詞：「謝金在勞動組合裡入了股。他放出去一千五的債，都有抵押品。就是這樣，孩子。你這些話說也罷，不說也罷，反正那件事已經生米煮成熟飯了」(T.2, C.37)。重利輕義的狀況展現俄國社會受到隨資本主義帶來的異化影響，人們往往靠近利益，背離善良風俗和傳統。

十九世紀下半葉，人對金錢異常執著的特點表現在各式各樣的人身上，〈不悅〉(He в дыне, 1884) 中的警察分局長身價不斐，但卻執著於打牌輸掉的八盧布，不停暗自懊悔，雖然「這筆錢很少，微不足道，然而貪婪和愛財的魔鬼卻藏在警察分局長的耳朵裡，指責他揮霍無度」(T.3, C.148)。貪婪和愛財的魔鬼代表的不僅是局長個人的思維，更展現了金錢異化後逐漸掌控人心的魔力。警察局長過度心疼小錢的損失，但「他越是安慰自己，那筆損失就越發使他感到切膚之痛。八盧布是那麼可惜，那麼可惜，彷彿他其實輸了八千似的」(T.3, C.148)。在警察局長身上可以明顯看出異化的影響：對於金錢的偏執已經超乎理性，凌駕於所有情感之上，內心始終無法放下損失的八盧布，最後甚至氣憤到痛打兒子一頓洩憤，這種對物質過度執著的行爲，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人役於物的異化。

無須面對經濟困境的人展現的是被物質控制的異化，而真正處於經濟弱勢的人們，爲了活下去而努力地掙扎，在生活中別無選擇，只能隨著異

化起舞，爲了金錢不得不放棄自尊與人格，〈惡夢〉(Кошмар, 1886) 中的亞科夫神父 (Яков) 就是受異化壓抑的代表。坐擁莊園的政府農業專任官員庫寧 (Кунин) 初來乍到時，因爲亞科夫神父的舉動讓他感覺不成體統，而百般嫌棄：「這個人，他那可憐又可笑的身材、皺巴巴的長袍、女性化的臉、做彌撒的樣子、他的生活方式和那種官場中拘謹而恭順的態度，都侮辱了庫寧胸中殘存著的一點點宗教感情」(T.5, C.67)。庫寧對村莊的關心是上對下的關注，他無法設身處地思考農村的狀況，對農民生活的困境視若無睹；而在農村中苦民所苦的亞科夫神父，早已被生活折磨到失去自尊，爲了大眾犧牲自我。兩人的隔閡日深，庫寧甚至打從心底瞧不起亞科夫神父，還寫信向地區主教告密，這負面的印象持續到亞科夫神父向庫寧揭露自己需錢孔急，是爲了資助村內窮困的人們，村民的環境比他更糟，而他的自尊卻又不允許他向富人搖尾乞憐：「我怎麼能向那些農民乞討呢？您在這裡工作，您自己看得見。誰能伸出手向乞丐們要飯呢？至於央求有錢人，央求地主們，我做不到！我有自尊心！我害臊」(T.5, C.70)！這樣的壓力使得亞科夫神父不得不努力賺錢維生，那些最令庫寧厭惡的嘴臉背後卻隱藏著最偉大的情懷，庫寧這才意識到自己過去的無知：「這些事我以前都不知道呀！.....在這兒已經做了一年多常任委員、榮譽調解法官、學校會議委員！沒長眼睛的木偶，紈袴子弟！要趕快幫他的忙才對！要趕快」(T.5, C.72)！庫寧看見了農村真實的模樣，開始想著怎麼分配自己的錢財幫助他人，過去的揮霍彷彿成了他的原罪，壓得他喘不過氣了。亞科夫神父和庫寧兩人分別受到了異化現象不同程度的影響，異化現象使得亞科夫神父

不得不壓低身段、拋下自尊，獲取金錢幫助他人，即使出發點良善，卻仍使得他的姿態成了令人不快的樣子，而庫寧過去則是在異化現象的誘惑中，喪失了對生活的感受力，後來雖然恍然大悟，卻依舊良心不安。

和亞科夫神父同樣在困境中努力求生的還有〈牡蠣〉中連溫飽都有困難的父子。父親帶著兒子從鄉下進城謀事，但卻處處碰壁，孩子在街頭說出了自己病徵：「我感覺到一種奇怪的病漸漸控制住我。一點也不痛，但兩條腿不由自主地彎下去，要說的話卡在喉嚨口，頭無力地歪到一邊……顯然，我很快會倒下去，失去知覺」(T.3, C.131)，而這種疾病，其實只是飢餓。走投無路下終於決定帶著兒子上街乞討，但自尊卻總讓他臨陣退縮，這種矛盾心理在敘事者——八歲多的兒子眼中再清楚不過，「從他的眼神我看得出，他想對行人說些什麼，但那句要命的話，卻重如秤砣般掛在他顫抖的嘴唇上，怎麼也吐不出來」(T.3, C.132)。過度飢餓的兒子開始幻想「牡蠣」的滋味，「我把它們都吃了……最後我吃餐巾，吃盤子，吃父親的膠皮雨鞋，吃那塊白牌子，凡是我的眼睛看到的東西，我統統吃下去，因為我感到，只有吃下東西，我的病才會好起來。那些牡蠣可怕地睜著眼睛，其醜無比，我一想到它們就渾身打顫，但我還是要吃！吃」(T.3, C.133)！路過的富人聽見便請小孩吃了幾個牡蠣，取笑小孩連牡蠣殼也一併咬下的無知，只求溫飽的父子和恣意揮霍的路人，是社會中經濟強弱鮮明的對照。契訶夫在牡蠣中成功地塑造了笑中帶淚的情節，藉由孩童的眼光，展示社

會中貧者的困境，引發讀者共鳴。⁸⁵

在發展中的農村也出現了經濟強的對比，〈太太〉(*Барыня*, 1882) 中的女地主依蓮娜·斯特烈爾科娃 (Елена Стрелкова) 出場就挾帶著地主的氣勢，華美的馬車和破敗的農舍形成強烈的反差，農民辛勤工作的成果都被地主收割，耕種的越多，消耗的勞力更多，代表地主的收穫更豐，在長期獲取的酬勞與付出不成比例的情況，「異化」現象就因而產生了。⁸⁶農民爲了溫飽每天埋頭苦幹，無暇顧及精神狀況和心靈發展，失去做爲人的價值；在利潤面前，地主也不將農民當成具有自由意志的人類看待，只將農民視爲生產工具，同樣身爲人類卻被畫分成兩個對立的階級，可見異化在農村已有相當的影響力。地主太太看上農民斯捷潘 (Степан)，強迫他成爲男寵，斯捷潘本人相當抗拒，卻在父親的脅迫與斯特烈爾科娃夫人的眼淚攻勢下屈服。他衣冠楚楚，「昂貴的絲絨和紅布裹緊他強壯的身體，胸前掛著一串錶鏈，上面有些墜飾，皮靴的靴筒用最道地的鞋油擦亮，帽上插著孔雀毛，帽子幾乎像是沒碰到他捲曲的金髮。他的臉看來麻木而順從，但同時又露出怒不可遏的瘋狂神情，害得那些馬吃盡苦頭」(T.1, C.263, 264)，卻絲毫無法感受到平靜，草原和天空都成了他出賣靈魂的見證人。地主太太的強勢顯而易見，財富讓她在農村內呼風喚雨；斯捷潘被迫向物質低頭，但良心不安、滿懷罪惡感，甚至失控打死自己的太太。〈太太〉展現了異化

⁸⁵ 同註 84，頁 14-15。

⁸⁶ 同註 83，頁 76-78。

現象在俄國農村引起的改變：金錢成爲具有力量的武器，讓窮人不得不屈服。

契訶夫前期作品中對「異化」批判最劇烈的首推〈公爵夫人〉(*Княгиня*, 1889)，此篇小說結構較先前作品更爲完整，情節嚴謹，前後呼應，展示了不同層面的「異化」現象。公爵夫人薇拉·加弗莉羅芙娜(*Вера Гавриловна*) 鮮少關懷人民，總是惺惺作態，身邊的人們礙於她的財富地位都簇擁著她，而公爵夫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認爲自己擁有悲天憫人的胸懷。醫生米海伊爾·伊凡諾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 的指責如同一記閃電，劈開她自欺欺人的幻想，醫師指責她根本不愛人，甚至對人類充滿厭惡，她的莊園體系就是建立對人類的憤恨之上：「在您的米哈爾采沃村，有三個您以前的廚師，在您的廚房裡被煙火熏瞎眼，如今靠乞討過日子。……您那些波蘭籍的總管、卑鄙的密探、卡齊米爾人和卡艾坦人，一天到晚，在您那幾萬俄畝土地上跑來跑去，為要討好您而極力從一條牛身上剝下三層皮來」(T.7, C.241)。公爵夫人對村內農民無意識地剝奪，除了不勞而獲地取得人們工作的成果，間接剝奪他們的健康外，還使得村民道德淪喪。村民爲了獲得公爵夫人的青睞以賺取更多的財富，紛紛拋棄自己的本業，接近公爵夫人。他們雖然吃飽穿暖，卻逐漸失去了人類純良的本性。醫師大力抨擊這些自甘墮落的人，同時發洩他對公爵夫人的憎惡，指責公爵夫人恣意掠奪農民工作的成果，使農民爲了追逐金錢等利益失去自我，將責任歸咎於對一切毫無所覺的公爵夫人：「不過，主要的，最使我憤慨的，就是您空有萬貫家

財，卻不為人們做事，連一點也不肯做」(T.7, C.241)！公爵夫人卻對這一切混亂視而不見，專心營造自己崇高的形象；下人們見風使舵討好主人，徹底忽視需要關懷的人，在上位者的虛偽、下屬的阿諛奉承勾勒出當代俄國社會媚俗的氛圍，他們藉由虛幻的自我滿足規避現實與責任，在幻想中喪失自己身為人的自覺，成為異化的受害者。⁸⁷

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後，帶給俄國的是富者恆富、貧者愈貧的社會問題。富人巧取豪奪，使貧者陷入「異化」牢籠，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力追逐金錢，與此同時，他們生命耗損，工作成果被奪走，卻毫無還手之力。處於經濟弱勢的角色們都有相同的特點：窮困無依、捉襟見肘，生活就在一戈比、一盧布當中掙扎，常常需要為了五斗米折腰，而在大部分人為了生活受苦的同時，官員、地主、富商仍能花天酒地，為所欲為，社會充斥著不公不義的氛圍。契訶夫前期的作品將砲口對準這些不事生產，掠奪人民的吸血蟲，強調他們有錢卻對一切漠不關心，缺少對人的關心與憐憫，是「異化」現象的幫兇。

貳、 身份

身份與權力息息相關，但由於俄國歷史背景特殊，封建主義與農奴制

⁸⁷ 支丹，〈淺析契訶夫小說中的人物媚俗心理〉，《學理論》，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2012，第29期，頁196-197。

度較晚廢除，身分階級流動緩慢，加上官僚制度在俄國行之有年，牽涉層面甚廣，因比筆者決定將兩者劃分開來，「身份」小節探討因為身份階級低下而遭遇的不公，而「權力」小節將專注於位於官僚制內深受「異化」困擾的人們。

契訶夫短篇小說中的角色，多是中下階級的人物，他們反映了最真實的社會百態。盧卡奇認為：「並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相反的，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劉昌元，2007：92）。⁸⁸換言之，意識身份是在後天社會環境養成的，人從自身的階級理解自己在社會的位置，意識自然會受到身份階級影響，因此分析弱勢身份對理解社會整體的「異化」現象不可或缺。藉由梳理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作品，觀察當中描繪的俄國社會，分析當代底層階級的意識與思想緣由，就能進一步貼近「異化」現象的核心。

農村中的異化比被資本主義和官僚制的異化都發生得早，農民是最先被異化的一群。農奴制最初規定，農奴沒有主人的同意不能隨意更換住所，之後轉變成身分證制度，沒有行政機關發行的身分證就不能遠行，此外農奴對主人必須承擔勞役責任，逃跑和欠款都是犯罪，必須接受殘酷的刑罰。1862年農奴解放之後，表面上農奴獲得自由，脫離與地主的控制，但實際

⁸⁸ 劉昌元，〈盧卡奇及其文哲思想〉，台北：聯經，2007，頁92。

上地主利用農奴對土地的需求、高額的賦稅等其他形式限制農民，⁸⁹建立新的雇傭關係，加上解放後國家也開始對農民徵收雜稅，農村的狀況隨著城市發展反而每況愈下。契訶夫作品中，地主或官員對農民的輕蔑隨處可見，〈不悅〉中的警察分局長的兒子朗誦課文時，說到了農奴，分局長即時的反應透露出農民地位的低下，他想著：「一個農民，歡天喜地，走過鋪著雪的道路，……『走過』……『歡天喜地』……應該使勁抽他十鞭子，他就不會這麼歡天喜地了。與其歡天喜地，還不如按時繳上稅款」(T.3, C.149)！這個想法說明兩種狀況：一是農民入不敷出，無力繳交稅款，二是農民地位低下，官員可以隨意打罵，農民雖然身為人類，在異化的社會中卻不具備人類的價值，僅被視為物質、稅收來源，動輒被打罵，毫無個人主體性。

身分背景低下的人們和農奴一樣，被視為財產的一部份，存在價值僅僅來自本身的勞動力，例如〈萬卡〉(Ванька, 1886)被送到鞋匠阿里亞興(Аляхин)處做學徒的萬卡·朱可夫(Ванька Жуков)。年僅九歲的萬卡遠離熟悉的環境與親人，孤單恐懼，而鞋匠夫婦卻未善待他，這些種種的不幸萬卡都寫在信上：「今天我挨了一頓打。老闆揪著我的頭髮，把我拉到院子裡，拿師傅幹活用的皮條狠狠地抽我，怪我搖他們搖籃裡的小娃娃，不小心搖到睡著了」(T.5, C.479)。萬卡在主人眼中的價值建立在勞動之上，一旦休息時間多了，勞動成果便會減少，鞋匠夫婦都無法忍受這種損

⁸⁹ 米羅諾夫，同註 35，頁 385、423。

失，對萬卡極為苛刻，「上個星期老闆娘叫我處理一條青魚，我從尾巴開始弄，她就撈起那條青魚，把魚頭揮到我臉上。……老闆隨手抓到什麼就用什麼打我。……至於茶啦，白菜湯啦，只有老闆和老闆娘他們自己才能喝個夠。他們叫我睡在走道上，小娃娃一哭，我根本不能睡，只能一直搖搖籃」(T.5, C.479)。他寫信抱怨現實生活的慘況時，回味著從前在鄉村的生活，那時雖然貧窮但卻快樂自由，反觀現在艱難的生活環境和飽受壓抑的氣氛，萬卡只能將希望寄託在鄉下的祖父身上，童稚真誠的求救躍然紙上，最後萬卡沒寫上地址就將信寄出，故事收尾在萬卡滿懷希望地沉沉睡去，然而困境仍是無法可解。童工出身的萬卡，從小就被「異化」現象籠罩，在主人家不受重視，是最先被社會疏離的一群，在痛苦的環境下生長，心靈無法健全發展，之後也很難逃出「異化」的掌控。

與萬卡同病相憐的還有〈暈〉〈*Спать хочется*, 1888〉中十三歲的瓦爾卡(Варька)，倆人的處境如出一轍，一樣要打雜、跑腿和照顧娃娃，使人不忍的是，瓦爾卡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因為鞋匠的娃娃老是哭個不停，「小娃娃在哭，他早已哭得聲音嘶力疲，可是仍舊哭嚎個不停，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會停住不哭」(T.7, C.7)。哄著娃娃的時候，由於過度疲勞，現實、夢境與回憶在瓦爾卡的腦海裡交融成一體，瓦爾卡用力抵抗還是不敵睡意，而昏睡的結果就是招來一陣打罵，幾次循環，太陽就昇起了。瓦爾卡暗自高興著，因為一旦忙得不可開交，就不會昏昏欲睡了。漫長的一天很快就過了，到了晚上又是痛苦的時候，瓦爾卡掙扎後發現她的敵人就是

眼前這個不住啼哭的嬰兒，「她想到馬上就可以擺脫這個綁手綁腳的娃娃，不由得感到暢快，內心麻癢癢的。弄死這個娃娃，然後睡吧，睡吧，睡吧。她笑著向那塊綠色斑點使了個眼色，威脅地搖一下手。瓦爾卡悄悄地走向搖籃，彎下腰去，湊近那個娃娃」(T.7, C.12)。長期處於弱勢的瓦爾卡用了最殘酷的手段結束自己的痛苦，她掐死了嬰兒，就是周遭環境「異化」她的證據，在這個階段的創作，契訶夫的作品中開始出現反抗的色彩。

主人對奴僕高高在上的態度，並不會隨著時間改善。那種態度變成毒瘤，侵蝕奴僕的意識，進而異化奴僕，〈牆〉(Стена, 1885)中，要應徵莊園總管的年輕人在前廳等候時抱怨幾句，內容大多是關於他是個正直、受過教育的人，不應該被丟在前廳等候兩個鐘頭之久，地主的僕人伊凡聽見了，態度卻相當不以為然，他說：「既然他想當總管，給主人做奴僕，就該老實地做他的總管，用不著胡思亂想，硬要當什麼受過教育的人」(T.4, C.140)。身為僕人的伊凡認為：做人奴僕就該聽命於主，其餘都不要多想，這樣的表現標誌出了伊凡個人意識的消退。當人習慣奴僕的地位，對周遭感到麻木，不再思考，個人意識就會逐漸被奴僕的身分異化，主人的想法徹底取代自身，他不再思考，也不反抗公爵小姐的胡鬧，是個人意識隨著「異化」消亡的徵兆。

身份弱勢的除了為人奴僕之外，還有另外一批人，他們自力更生，但在社會中也絲毫不受關注，當中包含了工匠、車伕、教師等處處尋常可見

的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努力，卻從未被重視。〈急救〉(*Скорая помощь*, 1887) 中，鄰村的泥水匠喝醉酒後糊裡糊塗地掉到河裡，被撈起時嘴裡還抱怨著客人：「這個人，只給了我七盧布工錢，就說：『你啊，你得敬重我，把我看做你的父母』。哼，他最好被狼吃了」(T.6, C.236) ！泥水匠爲了溫飽努力工作，卻被人看不起，因而自尊受損，即使溺水後冷得幾乎失去意識，仍絮絮叨叨個沒完，可見這樣的對待讓他十分憤恨。村民們齊心協力想救醒他的同時，穿著講究的地主太太路過，在富太太和管家也試著出主意拯救泥水匠，但發現無濟於事後，二話不說馬上離開，看不見對一條生命逝去的一絲憐憫，不論是雇主或是地主太太都同樣不尊重泥水匠作爲人的本質，這樣疏離的行爲都屬於異化的表現。

異化造成社會疏離的另外一種形式是對他人的苦難漠不關心。〈苦惱〉(*Тоска*, 1886) 中的馬車夫姚納 (*Иона*) 隨著滿天紛飛的白雪一起登場，他身形佝僂，像個幽靈一樣蜷曲在座位上，姚納的馬瘦骨嶙峋，和他一起停滯不動任由白雪覆蓋，直到晚上才有人招車，乘客是個粗魯的軍人，姚納想說話，卻開不了口，「姚納回過頭去瞧著乘客，努動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要說話，然而他的喉嚨卻一個字也吐不出來，只發出啾啾的聲音」(T.4, C.327)。後來姚納終於找到機會開口，可惜軍人無心傾聽，要姚納閉嘴趕車。在一連串的等待下，雪再次覆蓋他與那匹瘦馬，還是沒有人對他們付出一點善意或關懷，跟著大雪襲捲而來的哀傷讓姚納顧不上賺錢，只有人能傾聽他的喪子之痛，但乘客仍舊對他的苦悶恍若未聞、視若無睹，

一到目的地便頭也不回地離去。路途上有三人作伴，可是姚納的孤單非但沒有減輕，反而嚴重到幾乎撕裂他的胸膛，「那種苦惱是廣大無垠的。如果姚納的胸膛裂開，苦惱滾滾地湧出來，它仿佛可以淹沒全世界，話雖如此，它卻是人們看不見的」(T.4, C.329)。路上的眾多人們經過，卻沒任何人注意到姚納和他的苦惱，姚納的攀談也都無疾而終，沒有人注意到姚納，更遑論關懷，最後他只能向馬兒訴說他無處發洩的痛苦。上層階級對中下階級慣性的冷漠、底層階級間彼此的疏遠，⁹⁰讓他們在生活中感到隔閡，情緒找不到出口，個人內心的異化也就不可避免了。

知識份子是被契訶夫作品中相當引人注目的角色，他們受過教育，懷抱理想，最後卻也無法倖免於異化對靈魂的干擾。在俄國，上流社會的家庭通常會聘請家庭教師教導孩子外語，學生們爲了維持生計，也願意在不同的家庭兼差。契訶夫本人也曾是家庭教師，相當理解教師遇到的困難，他們大多生活困頓，急需薪水，必須面對孩童的頑皮與雇主的強勢，契訶夫對這個弱勢階層的體驗感同身受，故事情節栩栩如生。〈家庭教師〉(*Penemumop*, 1884) 中，七年級的中學生爲了籌措學費，答應當一名二年級的學生家教，但他的學生頑劣不堪，常常不寫作業，對學習內容一竅不通，學生父親——退休文官偶爾也會進到房間與他們一同上課，種種惡劣的環境讓這名小教師煩躁不堪，「他心驚肉跳，難受得很。心頭髮緊地偷瞄一眼掛鐘，看見離下課還有一小時又一刻，像是永恆一樣長」(T.2, C.338)！

⁹⁰ 張保明，〈契訶夫〈苦惱〉以小見大的構思特點〉，(<http://goo.gl/031vb>) (2013.10.09)

下課後，家庭教師怯生生地詢問他是否可以拿到積欠了六個月薪水了，卻被含糊其辭地帶過，小教師別無他法，只能認份地踩著那雙又髒又重的靴子去別處教課了，這樣的忍氣吞聲是異化的第一階段。

人類習慣於忍氣吞聲，總是默默服從而不知反抗，最後就會失去為自己爭取權益的勇氣，是異化的第二階段，〈窩囊〉(Размазня, 1883) 中的女家庭教師就是個例子。她被雇主叫進房間內結算當月薪水，主人態度強勢地苛扣薪水，從月薪開始殺價，接著巧立名目東扣西減，女教師內心委屈，卻又怯弱的不敢表示任何意見，「左眼泛紅，眼眶含淚，她的下巴開始顫抖，神經質地咳了起來，擤著鼻子，可是她仍一言不發」(T.2, C.62)。通過兩人的對話，契訶夫展現了女教師被異化了的靈魂，在社會現實壓力之下，她早以習慣被體制強加在身上的身份弱勢，總是屈服於權威，即使受過教育，卻不會也不願意去思考、去抗爭，只能在雇主面前點頭稱是，⁹¹即使後來雇主說明一切只是玩笑，指責她不該如此軟弱，女教師只是苦笑著，用表情說明內心的反駁，因為她根深蒂固地認為：這樣是可以的。女教師在不知不覺中早被異化到失去個人意識，變成一個盲目軟弱的個體。

無論受過教育與否，底層階級的弱勢讓他們的人格扭曲，先失去崇高的信仰，接著是判斷的能力，最後連靈魂都褪了色，只能任人宰割。〈公爵

⁹¹ 吳曉雷，〈柔弱的靈魂－對契訶夫短篇小說〈窩囊〉的會話與功能分析〉，《文教資料》，2011，第 16 期，頁 20-22。

夫人)中醫生的指責證明了這樣的狀況:「所有這些兩條腿的動物都被培養成奴才,吃得太飽,變得粗魯,簡而言之,失了分寸,不成體統。有的年輕人工作不到三年就變成了偽君子、馬屁精、告密者了,這樣對嗎」(T.7, C.241)?人被異化後容易失去理念,變得無法判斷是非,因此年輕力壯的青年們拋下農地,而甘願為人奴僕做些低下的工作,最後連靈魂裡的淨土也失去了,成為毫無道德觀念的個體。

底層階級的異化源自於剝奪與壓迫,與受到「異化」現象困擾的工人狀況大同小異。工人在生產機械出現後,對生產物失去主控權,必須依從機器的規律,將自己納入機械,成為它零件的一部份,必須日復一日重複著同樣的動作,意志力隨著貧乏無趣的工作日益空洞,⁹²而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身份弱勢者,為了養家餬口而工作,出賣自己的勞力與腦力,過程往往遭受到不公不義的對待,付出的代價超過獲得的報酬,在這樣的情況下,底層階級不得不拋棄尊嚴與理想,將自己納入體制之中,順應體制過生活,然而慘烈的代價卻是他們成為體制的一部分的同時,他們也逐步丟失了自己的靈魂與意識,最後連最基本的思考能力都喪失,「異化」的束縛不言而喻。

參、 權力

⁹² 同註 96, 頁 104。

韋伯對「支配」的定義清楚說明社會中複雜的關係：「支配就是一群人會服從某些特定命令的可能性，而支配的正當性就是那群人認為特定命令加諸在他們身上是合理的，所以服從」(顧忠華，2013，282)。⁹³ 照理而言，屬於法治型支配的官僚制應該讓社會更有規律的運作，但在契訶夫小說中的俄國社會，卻是因為官僚制而更加紊亂不堪，與韋伯認為官僚制是「異化」主因的理論不謀而合，本段落將分析契訶夫涉及官僚制的短篇小說，對照韋伯的理論，整理官僚制在「異化」現象產生時所扮演的角色。

韋伯理論提及：在理想的官僚制度中，官僚應該在公職之外享有個人自由；升遷有確切的審查制度，而非取決於上司的好惡；領有固定薪水，視公職為唯一職業；有專長，並且在自身工作有一定的職權；嚴格遵守規章制度，辦事按部就班。⁹⁴ 實際上俄國的官僚制度自古以來即惡名昭彰，與韋伯的理想大相逕庭：他們沒有人身自由，依附在單位或是長官身上，出於恐懼而不得不盡心盡力；他們領取薪水，也收受賄賂，在公職上虛應故事；通常沒有才能與職權，聽從長官的命令行事；最後一點最為嚴重，長官的意見就是他們的依歸，鮮少照章行事，⁹⁵ 這樣亂無章法的官僚制讓官員，從職場延續到與他人相處都飽受異化折磨，最後導致自己本身的異化。

⁹³ 顧忠華，《韋伯學說當代新詮》，台北：開學文化，2013，頁 282。

⁹⁴ Heady 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 Dekker, 1991, p. 68-73.

⁹⁵ 米羅諾夫，同註 35，頁 156。

官僚制的種種僵化使得生活不得不與之對抗，然而層層法律和牽涉當中的貴族與官員，讓官僚制度堅不可摧，⁹⁶而當中最受苦的就是權力金字塔底層的官員。他們受過教育，起初懷有思想，但被官僚制異化後，一步步地後退變成對上級唯命是從的小嘍囉，他們頑固迂腐、見風轉舵、或見利忘義，有著多種不同的面貌，脫序行爲展現官僚制的異化。幽默詼諧的〈新年的受難者〉(Новогодние великомученики, 1886) 諷刺地描繪了當時俄羅斯低級文官新年必須面臨的窘境：向許多長官拜年，街道上車水馬龍，「人行道上，拜年的人們不住地奔跑，吐出舌頭，瞪大眼睛。他們跑得那麼起勁，要是潘契弗里的妻子拉住一個奔跑著的十四品文官的衣襟，那麼不只衣襟，就連那個文官的整個半邊身子以及他的肝臟和脾臟也會留在她手裡的」(T.4, C.279)。有個衣著整齊的文官暈倒在某戶人家的大門前，警察將他送到醫院，才知道文官已經忙了一整天。新年的彌撒一結束，他就開始登門拜年，從早到晚在各個長官家交際應酬，還沒向所有長官拜完年就不支倒地了，但他執意要出院繼續拜年：「我還要到我岳父庫茲瑪·瓦維雷奇家去，還有我們庶務官娜達麗雅·葉果羅芙娜家，都得去。我還有許多地方沒去呢」(T.4, C.281)。故事最引人發噱的是這個文官還沒走出急診室，便又有五個文官因爲同樣的症狀被送進來了，低級文官必須藉由討好上級、打好人際關係，才能確保自己官場之路的順遂，困難的處境和官僚制的腐敗可見一斑。

⁹⁶ Лотман Ю.М. *Беседы о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СПб, 1994, с.43-45.

小官員面對官僚體系這個巨獸時內心的掙扎在〈真正的事實〉(*Сущая правда*, 1883)、〈合二爲一〉與〈太太們〉(*Дамы*, 1886) 都有所著墨，展現了異化現象在職場中的不同階段，清楚表現異化如何由社會向人心循序漸進地伸出魔爪，摧毀他們的靈魂。〈太太們〉中，教師的嗓子壞了而不得不退休，督學憐憫教師的不幸，加上一起共事了十四年的情份，做出了決定：「您聽著，我幫您想了個辦法。下星期我們孤兒院裡的文書就要辭職退休了。要是您願意的話，就接替他的職位吧！這就行了」(T.5, C.104, 105)！教員歡天喜地地回家準備填寫申請書，督學也替自己的善良與正直感到驕傲。市長夫人知道有空缺，便舉薦一個家境不錯的青年填補。起初，督學態度決絕，但省長的推薦信、省稅務局局長夫人的說情，由上而下源源不絕的壓力逼得督學不得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向醜惡的現實妥協。而教員填好申請書來找他時，督學既心虛又罪惡，「忽然，他想到他竟然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當著他下屬的面，扮演這樣荒唐的角色，就不由得又氣憤又煩惱」(T.5, C.107)，大吼大叫地將教員轟了出去。督學在職權許可的範圍內，無法依據自己的意願與公義作出正確決定，卻向權威妥協了，可以看出官僚制已經偏離正軌，成爲壓抑官員思想與行爲的怪獸，而這也就是韋伯所謂的異化。

〈真正的事實〉中，十四品文官卡尼弗列夫(*Канифолев*) 酗酒、行爲脫序、無心公務，最終被撤了職，送別會中，卡尼弗列夫說出他最近酗酒

的主因：「我看不慣他們的虛偽！他們那種卑鄙的虛偽咬碎了我的心！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那些惡劣勾當，卻無動於衷」（T.2, C.177）！上司縱容其他官員的所作所為，但卡尼弗列夫除了妥協以外，別無他法。盛怒之下，他決定去找長官攤牌，一吐心中的不快，同行的其他官員紛紛勸阻，因為他們根深蒂固地認為低級官員沒有能力反抗上司：「我們這些人只有本事喝醉了酒大嚷一通，可真要有個風吹草動，就夾起尾巴跑了。你也是這樣的人呀」（T.2, C.178）！但無計可施的卡尼弗列夫狗急跳牆，真的跑到了長官家，揭露工作上一切的不公義：「比方說，為什麼您辦公室裡的地板很久都沒打蠟？為什麼您容許會計睡到十一點才起來？為什麼您容許米恰耶夫把局裡的報紙拿回家，卻不容許別人這樣做」（T.2, C.178）？卡尼弗列夫內心的憤恨不平在他的言語、行為中展露無遺，「講出這些真正的實情的時候，他的嗓音發顫，眼睛裡含著淚水，不住用拳頭捶胸口」（T.2, C.178）。失序的官僚制導致低級官員們的異化，有自覺的官員受到排擠，而絕大多數的官員則是被體制訓練的麻木不仁、不知反抗，這樣的結果反而背離了官僚制設立之初以理性管理國家的期望，官僚制反而成為社會異化的源頭，使得身處官僚制和被官僚制管轄的人們都蒙受其害。

官僚制的毒害除了在社會肆虐，更甚者進入了人類的靈魂，扭曲他們的人格，影響他們的行為，如同〈二合一〉中的文員伊凡·卡皮通尼奇（Иван Капитоныч）一般。伊凡的外表和肢體展現了他窩囊膽小的性格，「他年輕，然而脊椎已經彎成弓形，膝蓋老是往下彎，手上骯髒，手心恭敬地貼緊褲

縫。那張臉無精打采，一副哭喪相」(T.2, C.9)。而在上司面前，伊凡總是畏縮、沉默，因此上司從沒把他當一回事，在上司眼中，伊凡就是懦弱庸俗的代表：「他一看見我，就抖個不停，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好像我要把他吞下肚去，或者活活殺死似的。每次我責備他，他總是呆若木雞，四肢顫抖」(T.2, C.9)。但在公車上的伊凡挺起胸膛，對政治高談闊論，對公車售票員大呼小叫，還對現今社會大肆批評：「跟這些先生一起生活簡直要命！他們拘泥形式，墨守成規！形式主義者，庸俗之輩！他們會把人活活地悶死」(T.2, C.10)！但意氣風發的伊凡認出上司的瞬間，就如同洩了氣的皮球，「他的背彎了下去，馬上愁眉苦臉，噤若寒蟬，手臂也垂了下來，手心貼緊褲縫，兩腳發軟」(T.2, C.10)。卡皮通尼奇群眾面前自大張狂，一見到長官卻馬上被打回原形，恢復成那個辦公室裡窩囊怯弱的小職員，這樣的行為差異顯然是受到官僚體制的異化，低級官員無法將個人思想與職場生活區分開來，因此面對上司時毫無尊嚴，只能對著群眾頤指氣使來發洩內心壓力。由於官僚權力過度擴張，異化便由此產生，凌駕於人後開始掌控人心。

官僚制異化的影響不僅限於職場，連帶著侵蝕社交生活，不論是和親密的家人、久別重逢的兒時玩伴或與自己獨處時，異化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在釘子上〉展現小文官面對長官時的恐懼，這種情緒連帶影響到日常生活。一群低級文官要替其中一名慶祝命名日，一行人浩浩蕩蕩到家時，卻發現：「牆上有一顆大釘子，釘子上掛著一頂新制帽，帶著亮晃晃的帽檐和

帽章。文官們面面相覷，頓時臉色發白」(T.2, C.41)。某個長官來訪，於是主角只好先帶著同事去喝茶等候，「文官們的肚子痛苦得縮緊了！饑餓無情，但可惡的釘子上卻掛著一頂貂皮帽子」(T.2, C.42)。這次是更有權勢的長官來訪。壽星聽到了長官調戲妻子的話語，卻仍裝作若無其事，一群人只好又回餐館等待。最後，「一直到傍晚七點多鐘，釘子才解除負擔，他們也才能動手吃餡餅！可是餡餅乾了，白菜湯冷了，鵝烤焦了，總之斯特魯奇科夫的前程破壞了一切！不過呢，他們吃得倒是滿有味道的」(T.2, C.42)。這群低級文官沒有一個人表達對這件事情的不滿，他們只能在背後抱怨，相互取暖。這些底層文官散發出平淡而哀傷的氣氛，他們對事事由長官掌握的現況不滿，但只能藉由私下怒罵抒發怨氣，發洩的同時又必須說服自己這樣在官場上就有希望了，他們的人生就圍繞在抱怨、妥協，與自我欺騙當中打轉，毫無出路。本篇當中的主角應該是命名日最引人注目的那位，但通篇只看見他的軟弱、怕事，權力強弱分明的官僚制早已異化了他，對官場中似錦前程的希望也蒙蔽了他和其他同事，讓他們沒有自尊地苟且偷生，官僚制對人心的異化可以從這群官員的反應中得到映證。

〈胖子與瘦子〉(*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 1883) 和 〈普里希別耶夫中士〉(*Унтер Пришибеев*, 1885) 描述受到官僚制異化的社交生活，前者喪失精神意識的自由，而後者被困在僵化的制度中。〈胖子與瘦子〉中，從出場就看出兩人的生活水準相差甚多，胖子酒足飯飽走出酒館的時候，偶遇提著大包小包的瘦子全家，驚喜地向瘦子打招呼，「他們互相擁抱，吻了彼此三

次，然後看著對方淚汪汪的眼睛，顯得又驚又喜」(T.2, C.250)。他們久別重逢，熱絡地交換近況，瘦子忙著介紹家人，順便分享自己最近升官的喜悅，但等瘦子聽見胖子官品時，輕鬆自在的氣氛驟變，「瘦子突然臉色變白，呆若木雞，然而他的臉很快就往四下扯開，做出暢快的笑容，仿佛他臉上和眼睛裡不住迸出火星來似的。他把身體縮起來，哈著腰，顯得矮了半截」(T.2, C.251)。官僚制度中的上下有別使兩人的親暱感消失了，瘦子的談話內容開始變調：「多承大人體恤關注，有如使人再生的甘霖。這一個，大人，是我的兒子納法納伊爾，這是我的妻子露意絲，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新教徒」(T.2, C.251)。老友間的敘舊轉換成職場中的阿諛奉承，「胖子本想反駁他幾句，但看到瘦子那副誠惶誠恐、阿諛諂媚、低三下四的寒酸相，幾乎要吐了出來」(T.2, C.251)。官場階級高低有別深入瘦子的靈魂，讓他即使面對幼時玩伴也找不回自己身為人的尊嚴，官僚制的異化讓瘦子忘卻了他與胖子在私人生活上其實是平等的，他們的地位不該被職場上的位階區分成上下等，但官僚制異化後囚禁瘦子的意識，制度也掌控了他的生活。

〈普里希別耶夫中士〉則是展現了和〈胖子與瘦子〉不同的官僚制異化風貌。〈普里希別耶夫中士〉的開場地點位於法庭，普里希別耶夫中士被指控妨礙公務與毆打警察、村長。普里希別耶夫中士是十五年前退役返鄉的軍人，他的固執守舊搞得村子雞犬不寧，村民人人惶惑不安。事件的起因是中士看不慣人群圍觀一具死屍，自覺有責任驅逐民眾，他振振有詞地

反駁法官，認為自己是爲了阻止百姓鬧事才挺身而出：「難道能允許鄉民胡作非為嗎？哪一部法典裡寫著，可以縱容百姓，讓其恣意妄為的？我絕不允許，法官大人，要不是我驅散人群，給他們點顏色看，誰又敢站出來」（T.4, C.122）？普里希別耶夫中士替自己答辯的過程中口若懸河地講述自己過去的經歷，但他越是滔滔不絕，就越展現了他的迂腐無知，直到最後他被判了刑，仍困惑不解，「但有一點他是清楚的，那就是這世界變了，變得簡直沒法活下去了。種種陰暗、沮喪的念頭困擾著他」（T.4, C.125）。可是當他看見民眾聚集，「他積習難改，不由得手貼褲縫立正，操起沙啞的嗓子，生氣地喊道：『平民百姓，散開！不准聚會！都給我回家去』」（T.4, C.125）！在官僚體系中的官員們必須謹守本分，接受口令後執行動作，例行性的程序逐漸僵化人的意識思想，使人喪失個人的主體精神。由於政治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官僚制的過度擴張，會將壓抑的氣氛傳達至社會，使人除了服從命令之外，毫無精神生活可言，⁹⁷普里希別耶夫中士的生活顯然就是被入侵社會領的官僚制所異化的證明。〈胖子與瘦子〉中，官僚制使人在官品面前喪失主體性；〈普里希別耶夫中士〉裡，官僚制則是使人成爲政府壓抑社會的機器，兩者無疑都是官僚制異化的囚徒。

隨著對社會生活的入侵，官僚制接著將魔爪伸入了最後一塊淨土——人的精神生活，最具代表性與衝擊性的作品就是〈小文官之死〉。〈小文官之死〉描述一個文官因爲小事提心吊膽，最後被嚇死的故事，故事情節簡單，

⁹⁷ 顧忠華，《韋伯學說當代新詮》，2013，頁 286-288。

卻展現了小文官內心極其荒謬的價值觀。小文官看表演時不小心打了個噴嚏，意外地噴濺到前面的將軍，這件小插曲讓他自覺冒犯了將軍，「他心慌意亂了，傻笑一下，開始望向舞臺，他看著演出，但已不再感到幸福，惶惶不安了起來」(T.2, C.164)。這個無心之過卻讓小文官內心的恐懼蔓延，將軍的一舉一動都讓他提心吊膽，內心草木皆兵：「應當向他解釋清楚，我完全是無意的，這是自然規律，否則他會認為我是故意噴到他的。就算他現在不這麼想，以後也一定會這麼想的」(T.2, C.165)！帶著這樣的心情回家，他向妻子尋求意見，妻子也認為親自道歉才不會失了禮數。相較於耿耿於懷的小文官，將軍一點也沒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小文官積極道歉的行為反而讓不知所以然的將軍感到萬分不耐。這樣的反應卻讓小文官確信了將軍的不悅，更想方設法地企圖解釋。最後，將軍終於失去理性將小文官趕出辦公室，「切爾維亞科夫感到肚子裡有個東西碎了。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著，他一步步退到門口。他來到街上，步履艱難地走著。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裡，沒脫制服，就倒在長沙發上，後來就……死了」(T.2, C.166)。總是擔心受怕的小文官是官僚體系中最無辜的犧牲者，嚴苛的環境迫使他們縮小，將自己納入官僚體系，外在的壓抑和內心的恐懼幻化成巨獸，將他們一點一滴地吞食。

契訶夫小說中受過教育的主人公大多缺乏中心思想，精神生活空虛浮泛，生活無所寄託，痛苦難耐，他們對這個異化了的社會無言的反抗表現

在荒誕的行爲上，⁹⁸這種沉默的抗爭在官僚制中更是顯著，因爲在巨大的官僚體系面前，每個人作爲當中的一員，都相對的渺小、孤獨，官僚制造成底層官員的異化，剝奪了他們自由思考的能力，也毀滅了他們存在的真正價值。另外，相較於社會環境而言，官僚體系更加封閉，它所具備的優點，例如：法規合理、分工精細、執行確實等優點，隨著規模擴大，反而使得上層與下層的不平等擴大，⁹⁹周遭環境不只迫使個人意識發展趨緩，甚至還造成個人意識的逐漸消亡，在這樣的威脅下個人的存在岌岌可危。

第三節 小結

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起始於一種以經濟爲前提的物質鬥爭，他批判人與社會的相互關係隨著物質發展而崩壞，¹⁰⁰處於經濟弱勢的人們，往往是被奴役的一方，他們爲了個人的溫飽，對金錢異常執著，時常在拋棄尊嚴與否之間苦苦掙扎，面對生存與尊嚴，他們總是只能抉擇其一，經濟弱勢處於困境時的百態，在俄羅斯廣大的國土籠罩了一層陰影。而相對窮人而言少數的富人們也顯得茫然失措，他們懷疑身邊的人是否真心相待、對小小損失耿耿於懷、在意著世俗名聲等，被種種煩憂纏身。在資本主義入侵的當下，沒有切確信念的人無論經濟狀況爲何，內心都無法平靜。

⁹⁸ 姜曉潔，〈論契訶夫小說的荒誕性〉，(<http://goo.gl/AH8vf>) (2013.07.28)

⁹⁹ 洪謙德，〈從韋伯看馬克思：現代兩大思想家的對壘〉，台北：揚智，1998，頁 49、50。

¹⁰⁰ Ken Morrison，同註 14，頁 141-145。

關於身份弱勢層面，盧卡奇從馬克思理論整理出這樣的結果：「社會劃分為階級是由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決定的」(盧卡奇，1923：119)。¹⁰¹處於身分弱勢的小人物們的地位就像在工廠被資本家剝削的工人一般，是被奴役的角色，因此無論受過教育與否，都同樣淒慘，他們無法扭轉旁人輕蔑的眼光，也無力從底層翻身。身分低下，通常也伴隨著經濟弱勢，無論走到何處都必須看人眼光過活，在冷漠的社會之中苦苦尋找他們的容身之處。帶著希望寫信給爺爺的受虐童工、疲倦到失去理智殺死嬰兒的小保母、被雇主看低喝酒洩憤的泥水匠、沒有個人思想的老管家、爲了生活四處奔波的家教等人，他們所面對的處境說明當時社會的冷漠、逐利，人與人間的尊重和關愛降至低點。

韋伯口中的人類社會與相互支配脫不了關係，也就是和權力息息相關，他認爲：「祛魅」使得理性的法治型統治崛起，官僚制擴張，造成社會異化。法治型統治具備普遍意義的正當性，奠基於條理分明的規章法典，所要求的命令與服從都有所本，當權者權力有限，能排除傳統型和魅力型可能帶來的專斷，¹⁰²但隨著官僚制的發展，這樣看似理性的統治方式逐漸露出破綻。官僚制具備法規合理、分工精細、執行確實等優點，但凡事一體兩面，在精密的分工下隱藏的是官僚在權力上下層的不平等，而對法條

¹⁰¹ 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119。

¹⁰² 顧忠華，同註 108，頁 283-285。

規章的過度依賴更是使人僵化的原兇。在上層的官僚權力高漲，能左右下屬的存亡，在下位者只能聽命行事，麻痺個人的思想。契訶夫作品中對官僚的諷刺極為強烈，受不了上司與同事胡作非為而行為失常、糊里糊塗成為政府幫兇、無法根據內心道德做事、個人尊嚴與意志的喪失等等荒誕行為，無一不指向元兇——迂腐僵化的官僚體系。

總結本節，契訶夫前期關於異化的寫作脈絡以「社會之惡」為主，作品與現實問題針鋒相對。異化描寫著重於兩方面：整體社會氛圍與毫無自覺的人類，艱困的社會環境逼得人們不得不向生活低頭，生活充滿取捨與犧牲；部分人們無意識的掠奪加深社會大眾的苦痛，整體的社會氛圍強化了異化現象對人們心靈的影響。契訶夫憑藉敏銳的觀察力，從人物的日常生活下筆，描寫拜金、墮落、懦弱，以及平庸等表現，這些罪惡的根源無一不指向社會，一般群眾只是社會之惡下最無辜的犧牲者，他們面對「異化」現象時的無助、掙扎，都是契訶夫此時期下筆的重點。

創作之初，契訶夫接觸到異化現象最直接的表現，他如實地描繪社會亂象，然而隨著作品深化，作家察覺異化現象早已侵蝕人心，開始探討異化現象對個人心靈的影響。在後期的作品中，契訶夫厭倦了插科打諢之作，不再滿足於揭露現實的醜惡，他穿透了異化現象的表面，對核心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他以更有深度的作品逼迫讀者面對現實的真面目，使讀者

自發地反省生活，進而尋求出路，¹⁰³本論文接下來的兩個章節將從「人心異變」研究後期作品中更具有討論價值的異化現象。



¹⁰³ Speirs Logan, *Tolstoy and Chekho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54-157.

第三章 「異化」主題的內在反映

在契訶夫較後期的作品，他進一步觸及「異化」現象的根本問題——人心異變。他從表面的社會亂象深入到「異化」的核心，具體地描繪出「異化」如何侵蝕人心，最後使得人類靈魂徹底崩壞的過程。契訶夫後期作品矛頭指向在社會現實迷失自我的人，批判的對象從逼得人走投無路的社會變成了人類自己。受「異化」困擾的人們被欲望驅策、汲汲營營地追名逐利，困在生活平庸的瑣事中茫然度日，忘記人生真正的價值，在生活中只能感受到隔閡、壓迫，體現了生活「異化」後人與自己、他人與社會疏離的情況。

「異化」現象對人心的侵蝕可以從兩個方面探討：內在心理與外在行爲。於內在心理中，筆者將「異化」現象的影響畫分成個人價值觀的改變與自我意識的消亡；在外在行爲上，「異化」現象的影響則顯現在個人行爲的荒誕與人際關係的冷漠，筆者將從這四個方面探討契訶夫後期短篇作品中「異化」主題的表象：價值觀的扭曲、自我的喪失、行爲的荒誕與人際關係的疏離，梳理「異化」現象的脈絡，以理解「異化」現象在俄國的來龍去脈。

第一節 價值觀的扭曲

馬克思指出：人類的存在使得社會逐漸成型，社會隨著人類活動逐漸衍生而出，而「異化」現象隨著人類的物質生活發展開始壯大。起初，社會活動十分單純，人類克服自然界的阻礙、生產所需物資，藉由勞動以及生產的產品維持自己的生命，進而體會到自己的存在，過程辛苦，卻優遊自得。然而，隨著社會發展，金錢成爲媒介，私有制形成，人的生產出現了比維持生命更抽象的目的——交易與獲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被抽象的利益關係替代，¹⁰⁴累積財富成爲生活的首要目標，價值觀開始崩壞。資本主義在俄國生根發展極爲迅速，「異化」現象對人心的影響首先出現在價值觀的改變上，人們重視的東西從過去的家庭、道德、信仰變成金錢和名聲，筆者將價值觀的扭曲區分成：生活目的庸俗化、道德標準低落，本章節前半段將由此探討價值觀扭曲，最後道德淪喪的過程。

除了價值觀的扭曲之外，自我意識的消散也是契訶夫對人心異變的另一著墨點。當時除了物欲橫流之外，由上往下的專制保守氣氛壓制身處官僚體制內的官員，同時蔓延到俄國民衆的思想中。在這樣的氛圍下生活，人的主體意識在嚴密的統治之下，往往受到壓抑，必須拋棄個人意見，盡量融入體制，才能保障自身的權益。當這些人決定與現實妥協後，就放棄了改善生活的希望，他們不再表達不滿，爲了融入生活而改變自己的個性

¹⁰⁴ Ken Morrison, 同註 14, 頁 442-444。

與人格，最後放棄最後防線——思考，導致心靈被異化。¹⁰⁵契訶夫作品與當代俄國現實生活的灰暗相互呼應，基調往往是沉悶的憂鬱情緒，筆下的人物內心意識顯露出與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之感，他們受到社會壓抑，生活缺乏目標，內在精神狀態被生活異化，個人意識逐漸消散，筆者將其區分為生活意義的缺乏與個人意識的消散兩部份進行分析。

根據韋伯的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資本主義在歐洲國家發展的過程與基督新教的茁壯息息相關，因此發展初期帶著濃厚的宗教意味。新教信徒相信世俗成就可以榮耀上帝，一生孜孜矻矻，只求現世的努力能幫助他們獲得上帝永恆的恩寵，因此他們懷抱超越個人需求的熱忱辛勤工作，毫不放鬆地聚積財富，同時嚴守清規戒律，摒除浮華奢侈的享受，簡樸度日，而正是這些從宗教衍生出特有的倫理「精神」(spirit)形塑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雛型。

¹⁰⁶韋伯認為：在宗教信仰的影響下，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懷抱著崇高的理想，將工作視為連結個人與生命的神聖使命，追求金錢不是為了個人的享樂，而是為了榮耀上帝，然而這些價值觀在宗教改革後有了顯著的改變。

宗教改革之後，緊接而來的啓蒙運動、工業革命撼動了人類的世界觀，人類的主體性隨著科學發展逐漸覺醒，宗教對人類的影響已微乎其微，累

¹⁰⁵ 劉昌元，同註 96，頁 111-114。

¹⁰⁶ 顧忠華，同註 108，頁 383-385。

積財富從榮耀上帝的方式轉變為人生的目的，終生勞碌都是為了賺取金錢，進而享樂。經濟上的獲利不再僅僅是為了滿足生活必需，金錢的異化便在這種手段與目的錯亂的狀況下登場。而隨著人類思想上的躍進，理性思考取代過去宗教、道德等抽象價值觀的地位，人們開始本著自身的商業利益與社會利益來決定自己生活的觀點與態度，¹⁰⁷這種經過算計的逐利行為更進一步表現在個人的價值觀之上。

壹、生活目的庸俗化

十九世紀末的俄國，資本主義和科學與日俱進，人類對理性的依賴也逐漸增加，信仰和道德的地位被取代，不同的價值觀相繼崛起，不斷的鬥爭試圖主宰人們的生活。人們依照自己的主觀意識將需求按輕重緩急排列，在資本主義萌芽的俄國社會中，世俗生活中最首要的就是金錢與名聲，契訶夫後期作品中充滿對這樣的人生的批判，主角們生活的目的僅僅建立在金錢名利等世俗價值之上，他們苦心追求狹隘的目標，過著被欲望驅使的可悲生活。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的異化理論中主要抨擊對於物質過度執著的現象，隨著財產私有制的發展，累積金錢成為人和自然、社會，

¹⁰⁷ 韋伯著，于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70-72。

甚至於人本身的隔閡，製造了人和生活的矛盾，¹⁰⁸而整個社會都受到金錢異化時，個人當然也難倖免，〈在莊園裡〉（*В усадьбе*, 1894）的拉雪維奇（*Рашевич*）一出場就點出當時俄國人普遍貪財的風氣，展現了社會中的異化：

當代的人，我的先生，既沒有思想，也沒有理想，他們全部的行為都貫徹著一種精神：如何才能多剝削一點，像是要扯下人家最後一件襯衫一樣。您只要拿張一盧布鈔票就能收買當代那些所有自詡進步和正直的人，而現代知識分子的特點則在於您跟他講話的時候，必須嚴密提防您的口袋，要不然他就會把您的錢包扒走。（T.8, C.336）

拉雪維奇出身貴族，總是自認言之有物，但在眾人眼中，拉雪維奇言行不一，口中批判著當代人的道德低落，心裡盤算的卻與他大力抨擊的眾人無異。因此，只有初到這個城鎮的法院偵訊官梅耶爾（*Мейер*）才能不帶成見的與拉雪維奇一家相處。拉雪維奇覬覦梅耶爾的年輕有為，希望將女兒任尼亞（*Женя*）嫁給他，總是盤算：如何將任尼亞嫁給梅耶爾，順理成章的要求梅耶爾替他償還貸款、利息與欠繳的稅金。

從拉雪維奇的言語能推論出社會整體拜金的氛圍：「如今，要是一個老婆偷光丈夫的東西，逃之夭夭，那已經不會使人吃驚了。哪算得了什麼，小事一樁」（T.8, C.336）！甚至，「連十二歲的小姑娘都想找情人，她們搞什麼業餘演出和文學晚會，無非是為了便於勾搭上有錢人，去做他的姘婦

¹⁰⁸ 林進平，《馬克思的「正義」解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9，頁 90-93。

罷了」(T.8, C.336)！家庭中，爲了利益出賣親人的，也所在多有，「媽媽出賣自己的女兒、對於那些做丈夫的，甚至可以直截了當地問一聲，要多少價錢才肯賣他的妻子，甚至還能討價還價」(T.8, C.336)！貪財的風氣蔓延至整個社會，拉雪維奇也同樣被金錢遮住眼睛。他爲了脫離經濟困境，迫不及待欲將女兒嫁給梅耶爾，這樣的行爲與她抨擊的對象其實是一丘之貉。女兒的終身大事，事關重大，但價值觀念世俗化的拉雪維奇念念不忘自己的財產，梅耶爾的人品、性格、家世等一概不在他考慮的範圍之內。異化的拉雪維奇，眼中所見、腦海所想都只與房產、稅務等金錢相關問題，思毫不顧及女兒的未來，因此即便在最親近的兩個女兒眼中，拉雪維奇的行爲也無異於最醜陋的癩蛤蟆。

短篇小說三部曲（Маленькая трилогия）¹⁰⁹中的〈醋栗〉的主人翁尼古拉·伊凡內奇（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也同樣是被物質欲望蒙蔽心智的一員。尼古拉十九歲起就在稅務局裡工作，日復一日在原地不停地重複寫著相似的公文，茫然度日。在平靜無波的生活中，如何回到鄉下，重拾自在的生活的這種苦惱擴大成對莊園的期望，於是莊園成爲他人生的依託，他開始研究農藝，「有關農藝方面的小冊子和日曆上的這類建議，是他的一大樂趣，成了他心愛的精神食糧」(T.10, C.58)。並且多方蒐集資訊，物色莊園，「他喜歡看報，但只讀其中的廣告欄，如某地出售若干俄畝的耕地和草場，

¹⁰⁹ 三部曲爲〈套中人〉、〈醋栗〉和〈關於愛〉，藉由中學教師、獸醫和地主三人的故事指出當代社會沙皇專制、物質欲望橫流和制度僵化等問題。

連同莊園、果園、磨坊和若干活水池塘」(T.10, C.58)。尼古拉對莊園的幻想隨著看到的廣告而有變化，當中的醋栗成爲尼古拉夢想的代名詞，是他窮盡一生追求的東西。爲了滿足內心的渴望，尼古拉開始克難的日子，省吃儉用存下賺的每一分錢，追求財富的累積，以圓自己的農村夢。生活中所有行爲都是基於利益考量，從日常的食衣住行到結婚，無一不是錙銖必較地進行。「金錢好比白酒，能把人變成怪物」(T.10, C.59)，從尼古拉眼中只有莊園開始，就成了怪物，他甚至對妻子的死毫不愧疚，人性的光輝就在追逐金錢的過程中消失。

尼古拉心嚮往之的農村生活，卻偏偏與真正自由的農民的觀念——知足常樂背道而馳。傳統生活中，農民遵守善良風俗，本著良心和正義感做事，從最質樸的物質條件中找尋生活的樂趣，因爲對他們來說財富的累積並沒有意義，金錢不能使人得到社會的尊敬，只會讓人變得自私自利並遠離基督思想。¹¹⁰尼古拉一生都被金錢與欲望奴役，失去真正的人性與自由，成爲奴隸，庸俗的幸福感將尼古拉從人變成庸人，最後的肖像甚至成了一隻豬：¹¹¹「他蒼老了，發胖了，皮肉鬆弛。他的臉頰、鼻子和嘴唇都向前突出，眼看就要發出像豬那樣的呼嚕聲，鑽進被窩裡去了」(T.10, C.60)。尼古拉主宰自己的人生，確立生活目的，做出人生意義的個人闡釋，雖然對自己的命運有著絕對的掌控權，¹¹²但過度執著於物質層面的平庸夢想，使

¹¹⁰ 米羅諾夫，同註 35，頁 338。

¹¹¹ 童道明，《我愛這片天空——契訶夫評傳》，北京：中國文聯，2004，頁 164-165。

¹¹² 賀來，〈哲學如何回應「祛魅」的世界——理解當代哲學的重要視角〉，《天津社會科

尼古拉一生都被欲望趨使著，令人無限感慨。尼古拉費力追求的莊園成爲他與真正的自由的障礙，然而當代俄國卻充斥著尼古拉這類的人：他們眼光狹隘，在物質當中尋求幸福與自由，爲了滿足欲望而累積金錢，不僅使人性的光輝黯淡，還忽略真正的生活之美，只能空虛地終老，而這些人們的靈魂已經被金錢異化，無法意識自己生活在物質鑄造的牢籠中，毫無自由可言。

金錢異化在生活中循序漸進地入侵，對人心有著全面性的不良影響，人類在潛移默化之中步步退後，最後只能拋棄理想，向現實妥協。〈一家商號的歷史〉（*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торговог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 1892*）的主角西羅多夫（Сидоров）繼承母親的遺產時，內心懷抱遠大的志向，面對城市處處可見的愚昧與偏見時，總是想著：「思想，要多一點思想才可以！思想」（T.8, C.37）！西羅多夫決定開設書局教化這個愚昧粗野的城市，他從莫斯科運來了許多書籍，陳設在店裡，但一個因爲想讀書而上門的客戶也沒有，商店門可羅雀。現實狀況改變了西羅多夫的經營方針，他想：「狹隘的專業化是不行的，凡是有關教育以及用各種方式促進教育的東西都得賣」（T.8, C.38）。西羅多夫起初僅僅增添文具用品，雖然仍未忘卻自己開店教育人們的心，但關注的重點已變樣，店裡商品越來越多，種類越來越雜，各式各樣的東西接二連三地入侵書店。

過去的理想逐漸被現實考量取代，而這樣的侵蝕卻使人茫然未覺。理想就像從貨架掉落的書一般，「有一本砸在他頭上，另外那幾本一直掉下去，砸在燈上，打碎了兩個燈罩」(T.8, C.39)。除了麻煩和破壞，不再具有其他價值。面對過去的理想，「西羅多夫搔了搔頭皮，嘟囔著：『嘿，這些書……寫得好厚啊！』他就把所有的書收拾起來，用繩子捆緊，塞在櫃檯下面」(T.8, C.39)。在書籍已經無法喚醒西羅多夫，在他把書打入冷宮時，就證明過去的梦想已經敗給現實，教化人心、改善城市等志向都被拋諸腦後，好好經營商店才是現在的首要目標。原本立意良善的書店被對金錢的渴求徹底占領後，擴張至隔壁的雜貨店。西羅多夫過去曾經翻閱著這些書告誡自己：不可以陷入昏庸的魔障，但社會需求、現實情況改變了書店，也改變了西羅多夫。聚會中的對談展示了西羅多夫前後思想的轉變：

「在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現在譏誚地稱呼為「美國人」的老朋友們的命名日宴會和婚禮上，偶爾會有人跟他談起進步、文學或其他高尚的問題『您，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看過最新的〈歐洲通報〉嗎？』有人問起。『不，我沒看……』他眯著眼睛玩弄著胸前的粗錶鏈，回答說：『這種東西跟我們不相干。我們是幹比較實際的工作的』」。(T.8, C.40)

西羅多夫的崇高目標在向現實妥協後，在生活中黯淡，最後被世俗之物取代。身處在異化的社會之中，人很難從拜物的社會風氣中逃離，只要人在意識上不強加反抗，異化就會藉由社會活動進入人的心靈深處，讓人不由自主地接受異化的支配，隨波逐流地往世俗墜落。¹¹³

¹¹³ 謝勝義，《盧卡奇》，台北：東大圖書，2000，頁124-126。

追名逐利是當代俄國社會盛行的風氣，〈阿莉阿德娜〉(Ариадна, 1895) 描述貌美如花的拜金女阿莉阿德娜如何善用自己的美貌，利用他人感情換取奢華的生活，是女性受到異化，生活目的世俗化的例子。莫斯科地主夏莫辛(Шамохин)在輪船上邂逅阿莉阿德娜後，命運都改變了。夏莫辛出身小康，兼之個性儉樸，鮮少為物質生活煩心，但對象阿莉阿德娜卻恰恰相反，她是隔壁落魄地主柯特洛維奇(Котлович)的妹妹，生活捉襟見肘，但阿莉阿德娜仍相當注重物質享受，「比方說，她想要一匹新馬，卻沒有錢買，那有什麼了不得的？可以拿個什麼東西去賣掉或者當掉。如果管家發誓說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賣或者可當了，那就把側屋的鐵皮房頂拆了來，賣給工廠，要不就在農忙季節把幹活的馬趕到市集上去，賣多少算多少」(T.9, C.111)。阿莉阿德娜注重享受遠勝過生活本身，這種荒謬行為看在為愛盲目的夏莫辛眼中卻都展現了妙不可言的機智，然而她除了享樂，對身旁一切都冷淡以對。

膚淺的阿莉阿德娜對自己的未來卻有著明確的藍圖：「她想到未來，總是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大富大貴的人，常常幻想舞會，幻想坐車兜風，幻想僕人也穿著華服，幻想豪華的客廳，幻想自己主持的沙龍，幻想一大票公爵、伯爵、大使、著名的畫家和演員，幻想這些人都愛慕著她，讚嘆她的美酒和打扮」(T.9, C.112)。夏莫辛對她的感情誠摯熱烈，原諒她一再的出軌，對阿莉阿德娜各式奢侈的要求有求必應，揮金如土到最後甚至連莊園

都賠上了。可惜的是阿莉阿德娜的感情只對豪奢的生活付出，這場殘酷的愛戀最終宣告破滅，她最後選擇嫁給了家財萬貫的公爵馬克圖耶夫（Мактуев），而夏莫辛也從這場毫不對等的關係中覺醒。阿莉阿德娜的形象完全反映出當時俄國女性拜金的亂象，雖然她出身貴族、受過教育，卻像動物一般被自己的欲望操縱著，追尋奢華空虛的物質生活，無怪乎夏莫辛最後對城中受過教育卻不住追求金錢的女人的評價是：「她們早已退化，回到原始狀態，一半是人，一半是野獸了」（T.9, C.130）！

當代俄國的異化幾乎將人民推入了死胡同，「他們對自己衣衫襤褸、房屋簡陋感到羞愧，但卻又無力改變。他們已經習慣裝模作樣，孩子快要餓死，卻讓女兒穿著綢緞衣物，用美麗的雕刻裝飾房屋，想方設法地想證明自己日子過得不比別人差，因而背負了最沉重的十字架」（Флеровский，1938：460）。¹¹⁴契訶夫後期作品中充斥著被世俗化的生活目的地驅使，卻對此困境毫不自知的人。這些角色通常根據工具理性行動，本著自身利益，修正自己的態度與行爲，深受異化影響卻毫無所覺。韋伯曾就此資本社會中普遍的拜金現象嚴厲地批評過：「那種為了獲利而獲利的活動，歸根結底是一種可恥行爲」（韋伯著，于曉譯，2008：72）。¹¹⁵而當獲利成爲人生目標，名利的重要性又增強到勝過一切事物的時候，異化對價值觀的扭曲也就進到了下一階段——道德標準的低落。

¹¹⁴ Флеровский Н. *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России*. М., 1938, с.460.

¹¹⁵ 韋伯著，同註 130，頁 71-72。

貳、 道德標準低落

道德和利益自古至今一直是相當兩難的問題，宋代儒學家程顥、程頤兄弟認為：追求利益應以內心的道德為準則，如果符合內心的道義，就算求取利益也不算壞事。程頤更進一步說明了道德和利益的關係：名利是眾人想追求的目標，但若是只想到自己的私利，專注於追求世俗之物，就大大的有害了。欲望過於強烈，就會是非不分，道德墮落；手段過於激烈，就會巧取豪奪，造成仇恨。¹¹⁶世俗之物凌駕於人自身的意志，掌控人類的行為，使人類失去自由、遭受奴役，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異化現象。契訶夫後期作品中當代俄國社會混亂，金錢異化人的靈魂，將生活目的拉低到只有世俗的層次，久而久之就被金錢、名聲等世俗成就蒙蔽雙眼，是非不分，眼中所見只有利益，各式各樣道德淪喪的行為在不同的主角身上發生。

〈跳來跳去的女人〉(*Попрыгунья*, 1892) 文章開頭就顯出奧爾迦·伊凡諾夫娜 (*Ольга Ивановна*) 和戴莫夫 (*Дымов*) 這對夫妻的格格不入，戴莫夫是個尋常的醫師、品位不高的文官，每天專注於工作和研究；奧爾迦則長袖善舞地結交各個藝文領域的名人，這些演員、歌唱家、音樂家、畫家、作家等無一不讚嘆她的才能。由於喜愛藝術，奧爾迦用各式物品布置家裡，企圖營造生活的美感，但風格雜亂，毫無品味可言。而為了引人注

¹¹⁶ 盧連章，《程顥程頤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256-259。

目，她和裁縫絞盡腦汁在衣服上增加花樣，「她們經常把舊衣服染過，加上一些不值錢的零頭網紗、花邊、長毛絨、綢緞，簡直就會創造出奇蹟。做出一種迷人的東西，不是衣服，而是夢幻」(T.8, C.9)。這些行爲表面看來極有才氣，實際上卻無一不顯示女主角的做作和庸俗。

缺乏品味的奧爾迦卻有個獨特的過人之處——結交名流。只要人們有點名氣，她就立即去拜訪，迅速地熟悉彼此，並邀他們參加她的宴會，因為「每結交一個新的名人對她來說都是真正的喜慶。她崇拜名人，為他們驕傲，每天夜裡都夢見他們。她如饑似渴地尋找名人，而且她的這種渴望永遠得不到滿足」(T.8, C.10)。奧爾迦雖然受過教育，但內心缺乏真正的價值，雖然企圖藉由結交各個領域的名人隱藏自己內在的空虛，但仍舊只能如同小說名稱一樣在理想和現實、不凡和庸俗，丈夫和畫家中不停地「跳來跳去」。¹¹⁷

奧爾迦低落的水準讓她無法看出戴莫夫的品格和成就，但在明事理的同事眼中戴莫夫早已晉身偉人之列，他因治療病人而染上白喉病故時，同事哀痛地說：「他死了，是因為他犧牲了自己。……對科學來說，這是多大的損失啊」(T.8, C.30)！而直到戴莫夫死亡的那刻為止，奧爾迦還是只關注世俗中成就和名聲，「奧爾迦·伊凡諾夫娜回想她和他的全部生活，從頭

¹¹⁷ 彭甄，〈價值缺席：“女性行動”旨向的設定——契訶夫短篇小說《跳來跳去的女人主題分析》〉，《俄羅斯文藝》，2010，第1期，頁28-32。

到尾，包括所有的細節，這才突然間明白過來，他確實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人，跟她所認識的那些人相比，可以說是偉大的人。她又回想起她去世的父親和所有跟他共事的醫生們對他的態度，她這才明白，他們都認定他是未來的名人」(T.8, C.30)。她傷心欲絕，部分出自情感的悲慟，更大的原因是她錯失了身邊這位未來的偉人。奧爾迦認為藝術才是美的表現，執著於虛幻的華美，但在生活體現藝術的她其實早已被異化，行為話語無一不透露出她的愛慕虛榮與矯揉造作。而她無視人們的個性、品德，只從世俗成就來評價，因此戴莫夫對她的寬容、對醫學的貢獻、對病人的犧牲等高尙行為都無法打動她，她的道德感早已為欲望所遮掩。這是處於異化的俄國人必須共同面臨的問題：理性抬頭，宗教的力量式微，人們普遍道德低落，將金錢視為生活目的，價值判斷缺乏準則，對於人類來說，正視多元價值的交戰相當困難，¹¹⁸當中許多人打了敗仗，落得被欲望主宰、價值觀崩解下場。

〈跳來跳去的女人〉的奧爾迦，追尋藝術家的名聲，沉迷膚淺的婚外情，道德不堪一擊。而〈太太〉(Супруга, 1895)中的奧爾迦(Ольга Дмитриевна)則揮金如土，縱情娛樂。〈太太〉敘述一個彷彿再平凡不過的婚姻故事，細節中卻隱含著令人不寒而慄的異化現象。醫師尼古拉·葉夫格拉菲奇(Николай Евграфыч)是鄉村教士的兒子，本性有些粗野，卻單

¹¹⁸ 馬克思·韋伯著，王容芬譯，《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演講 倫理之業》，北京：中央編譯，2012，頁 20-21。

純、質樸，娶了虛偽、粗俗、膚淺的奧爾迦·德米特利耶芙娜。結婚七年以來，記憶中只有奧爾迦香噴噴的長髮、一團柔軟的花邊和一雙很小很美的腳，其餘的婚姻生活在記憶中只是一團混亂：「他記起從前在鄉下他父親的家裡，往往會有一隻鳥無意中從院子裡飛進屋裡來，開始猛烈地撞擊玻璃，打翻各種物件，如今這個女人也是從一個他完全陌生的圈子裡飛進他的生活，把他的生活攪得亂七八糟」(T.9, C.95)。婚姻生活對尼古拉來說就像地獄一樣，他不再期望幸福，身體狀況不佳，家裡庸俗的擺設讓他聯想到妓院，生活極不快樂。而為了應付妻子巨大的開銷，年收入高達一萬盧布的他也債台高築，「即使他家裡住上一夥強盜，他的生活也不致像目前這樣。因為這個女人，生活變得這麼令人絕望，這麼不可救藥地殘破」(T.9, C.95)。甚至連奉養母親的十盧布都無法擠出。反觀奧爾迦，生活奢華，追求者眾，還有婚外情滋潤她的生活，過得歡暢無比。尼古拉看不起奧爾迦人格的低下，暗中不停反省自己，尋思為什麼無法感化奧爾迦的卑劣：「她從沒相信過任何人，不管別人的意圖多麼高尚，她總是懷疑其中含著什麼卑鄙惡劣的動機和利己主義的目的」(T.9, C.97)。

尼古拉始終無法理解怎麼會有人為了享樂而生活，也不懂奢華能帶來什麼幸福，最後決定放手，向妻子提出離婚，奧爾迦卻對飽受折磨的丈夫說：

「我非常瞭解您。您討厭我了，您純粹是想甩掉我，才跟我離婚。

多謝多謝，我可沒像你想的那麼笨。我才不離婚，我不離開您，不離開，

不離開！第一，我不願意喪失現在的社會地位。第二，我已經二十七歲，利斯卻只有二十三歲；再過一年他就會嫌棄我，拋棄我。第三，不瞞您說，我也不敢保證我這種迷戀能夠維持多久。就是這樣！我決不離開您」。(T.9, C.98)

奧爾迦貪戀丈夫提供的富裕生活和社會地位，對待丈夫殘忍又卑鄙，毫不感激丈夫的百般容讓與疼愛；面對炙熱發展的愛情，她卻也不甚肯定。奧爾迦精明地算計後發現：生活的美好來自豪奢的生活、高尚的地位，和刺激的愛情，而唯一兩全其美的辦法就是逼著丈夫准許她出去和情夫約會，撕破臉的次日還不忘向丈夫追討他承諾的二十五盧布。奧爾迦眼中只看見自己的利益，忽視先生的感情與付出，自私涼薄的表現將道德感下修到另一個層次，是被異化的代表。

人對物質的欲望太過強烈時，容易失去理智，除了上述的荒謬行為之外，也可能失控做出天理不容的事，〈在峽谷〉呈現一個家族為了金錢而做出的脫序行為，是異化後道德淪喪的證明。小說的開場便描繪烏克列耶沃村（Село Уклево）的破敗與無聊，全村只有兩間像樣的房子，一間是鄉公所，另一間就是故事主角格里戈利·彼得洛維奇·崔布金（Григорий Петров Цыбукин）的家。崔布金主要依靠經營雜貨店維生，他總能瞄準商機，善於謀利。市儈的崔布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阿尼西姆（Анисим）在警察局的偵查處工作，小兒子斯捷潘（Степан）幫忙雜貨店的工作，但由於身體不好、耳朵又聾，主要事情都落在斯捷潘的妻子阿克西尼雅（Аксинья）

身上。崔布金在媳婦阿克西尼雅找到與自己相似的特質：「阿克辛尼雅剛剛跟那輩子結了婚，就顯出她精明強幹，對誰可以賒帳，對誰不可以賒帳，她心裡清清楚楚。她保管鑰匙，甚至信不過她的丈夫」(T.10, C.145)。同樣的幹練和冷酷讓崔布金對兒媳相當滿意。崔布金和同村的瓦爾瓦拉(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再婚後，連同二兒子一家把事業經營得有聲有色。崔布金家雖然日進斗金，但斤斤計較，面對農民和乞丐卻是殘酷無比，他憎恨農民，總是大聲喝斥她們；而對待乞丐也同樣無情，總是對著他們說風涼話，總而言之，崔布金家掌握了村裡的財產，卻對於他人的困難處境視若無睹。缺乏同理心的行爲也出現在日常生活中，他爲大兒子娶媳婦時一擲千金，卻連請裁縫訂作衣服的錢也不願支付，「她們給瓦爾瓦拉做一件棕色連衣裙，鑲黑花邊和玻璃珠，給阿克西尼雅做一件淡綠色的連衣裙，配上黃色前胸和曳地長後襟。等到裁縫做完活，崔布金卻不付她們工錢，只給店裡的貨物。她們愁悶地走了，手裡提著她們完全不需要的幾包硬脂蠟燭和沙丁魚」(T.10, C.151)。金錢至上的觀念傳染給大兒子阿尼西姆，而自私自利的心態更是讓阿克西尼雅完全地道德淪喪。

阿尼西姆迎娶麗帕(Липа)之前，出於貪念，加之朋友慫恿，擅自偽造和使用假錢，婚後不久就被逮捕。阿尼西姆在公家機關工作，應該了解法律，但卻在錢的異化下知法犯法，最後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六年的苦刑。雖然阿尼西姆的道德出現了瑕疵，但他在犯罪後總是心神不寧，價值觀尚未完全崩壞，但二媳婦阿克西尼雅的行爲則是將「道德淪喪」發揮得淋漓

盡致。阿克西尼雅外表天真，「她那對難得眨眼的眼睛、長脖子上的小腦袋、苗條的身材，都有點蛇的樣子；再加上綠色的衣服，黃色的前胸，唇邊露出微笑，看上去活像春天從剛萌嫩芽的黑麥田中挺直身子昂起頭來瞧著行人的一條毒蛇」(T.10, C.155, 156)。雖然外表純真，但阿克西尼雅一再地被比喻成蛇，當中的暗示不言可喻。阿克西尼雅在家庭生活中隱藏自己的野心與貪念，崔布金欣賞她的能力，從未懷疑過她。直到阿尼西姆被流放，崔布金將名下工廠登記在麗帕的小孩——孫子尼基弗爾(Никифор) 的名下後，阿克西尼雅恐怖的真面目才展現出來。

阿克西尼雅知道過戶的事情後，立刻仇視起崔布金和麗帕母子，對異化了的阿克西尼雅而言，他們已經不是家人，而是財產的掠奪者，「她沒有擦眼淚，滿含淚水的眼睛緊盯著老頭子，目露凶光，臉孔由於氣憤而歪斜。她的臉和脖子一起漲紅，繃得很緊，因為她用足了氣力嚷叫」(T.10, C.170)。無視崔布金和瓦爾瓦拉不知所措地站著，已被佔有金錢的欲望控制的阿克西尼雅吼著：「我累死了！講到做事，講到成天坐在店裡，講到三更半夜偷偷出去私運白酒，就都該我做；可是講到分地，卻只分給那苦役犯的老婆和小鬼！她是這兒的女主人，太太，我成了女傭！那就乾脆把全部都給她，這囚犯的老婆，讓她活活噎死才好，我呢，回家去！你們另外去找傻瓜來吧，你們這些該死的強盜」(T.10, C.170)！對阿克西尼雅而言，哥哥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家人擔憂、麗帕和孩子的狀況堪憐等狀況，都比不上自己努力經營的工作成果被崔布金掠奪走來得重要，這樣缺乏感情的

硬心腸展現了她靈魂的異化。最後，阿克西尼雅轉向她心中的罪魁禍首——麗帕母子，她無視麗帕的恐懼，將尼基弗爾活活燙死。害死了姪子後，阿克西尼雅「默默地走進正房，唇邊帶著她平素那種天真的笑容」（T.10, C.172）。阿克西尼雅在葬禮後馬上將麗帕攆了出去，順理成章地接下了家族一切的事業，而崔布金也被趕了出來，靠乞討過活。爲了奪產，阿克西尼雅可以燙死姪子、驅逐嫂嫂、趕走公公，這樣脫序的行爲是異化後道德標準低落的證明。

人心異化後，存在於體內的道德良知被各式各樣的欲望吞噬，金錢、名聲、權利無一不蒙蔽人們的雙眼，腐蝕人們的良知。〈跳來跳去的女人〉、〈太太〉、〈在峽谷〉的例子中，爲了金錢、名聲，人們放縱自己被欲望驅策，道德良知慢慢褪色，最後不見蹤影。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出發點出自於這類的行爲：物質凌駕於人的精神之上，掩蓋人的是非觀，也連帶抹去人類的理智，人們變得既封閉又自私自利，完全受縛於物質，¹¹⁹距離自由越來越遠。

第二節 自我的喪失

契訶夫寫作後期，社會中最明顯的「異化」現象就是金錢至上的拜物潮流與反噬人心的官僚體系，而官僚體系異化對個人的影響又比金錢異化

¹¹⁹ 林進平，《馬克思的「正義」解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9，頁 99-103。

來得更深刻。俄國自尼古拉一世開始，亞歷山大二世繼位，到亞歷山大三世為止，無一不是採用保守主義治國。尼古拉一世設置了新的警察特務機構，負責偵查政治事件、滲透文藝活動等防範任何與政權對立的聚會，對此時的沙皇政府而言，任何帶有改革的思想皆為異端，需予剔除。接著設立的書報檢察制度，更為俄國知識圈蒙上一層陰影。¹²⁰亞歷山大二世繼位後，受限於情勢不得不進行了許多內政改革，但社會氣氛依舊死氣沉沉。亞歷山大三世變本加厲地禁錮社會思想，在位期間雖短，卻破壞了地方自治、限制大學自治權，利用俄國嚴密的官僚體系持續對人民的高壓統治，為俄國社會增添恐懼不安的氣氛。除了全面入侵俄國的資本主義之外，人民還必須分神面對由上往下的思想壓制，而原本作為中心思想的宗教和傳統卻又被祛魅而失去撫慰人心的效力，尋找生活意義和維持個人思想成了人民共同的煩惱。

壹、生活意義的缺乏

異化的世界和人相對立，人們生活在當中，只能感覺到種種敵意與束縛，過去還有信仰可以支撐人類脆弱的心靈，但祛魅後，信仰不再具有神祕效力，人們頓失所依，尋找生活的意義變成每個人首要的課題。一旦開始尋找生活的意義，就會感覺到來自社會的敵對力量，那股力量利用對物質的欲望、麻木的態度將人們侷限在生活的無趣、瑣碎之中，排除了生命

¹²⁰ 白曉紅，《俄國斯拉夫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32、33。

中的高尚價值，〈鄰居〉(*Cоседи*, 1892)、〈關於愛〉(*О любви*, 1898)、〈帶小狗的女人〉等角色都體現了這樣的煩惱。

〈鄰居〉的伊瓦辛(*Петр Михайлыч Ивашин*)年僅二十七歲，卻開始衰老，「他身上已經有年老的獨身地主的種種氣質。他不談戀愛，不想結婚，只愛他的母親、妹妹、奶媽、花匠瓦西里奇。他喜歡吃好菜，睡午覺，談政治，談高尚的問題」(T.8, C.55)。伊瓦辛的生活範圍只限於莊園，樂趣建立在最基本的活動和談天之中。雖然受過高等教育，「不過現在他卻把這件事看得像是服滿了青年在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不得不服的兵役似的，而如今每天在他腦子裡活動的思想已經跟大學以及他學過的那些科學毫不相干了」(T.8, C.55)。基本上除了維持生命所需的活動和空談之外，伊瓦辛對未來沒有任何期盼。他所剩不多的情感只表現在對妹妹季娜(*Зина*)的關心之上，季娜和已婚的弗拉西奇(*Власич*)私訂終身困擾著他。中年的弗拉西奇的外表完全不引人注目，甚至還讓人輕蔑：「他既談不上健康，也缺乏漂亮的、男子漢的風度，更沒有上流社會的派頭，連歡喜的樣子也沒有，從外表來看，總顯得沒有光彩，不知道是個什麼樣的角色」(T.8, C.63)。他和伊瓦辛兩人展現契訶夫典型的人物風格：陰鬱、哀傷，面對生活總有說不出的空虛和無奈，而這些特質反映在現實就是毫無深度的作為與停滯不前的生活。¹²¹

¹²¹ Петрова Т.Г. *А.П. Чехов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http://kostromka.ru/revyakin/literature/421.php>) (2014.01.13)

在落後的農村，弗拉西奇批評俄國人的散漫，懷想過去的美好歲月，就被視為自由思想者，「許多人把這種自由思想看做一種沒有害處的、無傷大雅的怪癖」(T.8, C.64)，但實際上自由思想早已和現實脫軌，成為某種機械式的教條，「他的自由思想缺乏獨創精神和熱情。不管憤慨、盛怒，或高興，總是一個樣子，毫不動人，顯得疲疲沓沓。就連激昂慷慨的時候，他仍舊頭也不抬地拱著背。最乏味的是，優美純正的思想經他一講，也顯得平庸而落後了」(T.8, C.63, 64)。陳腔濫調讓弗拉西奇成為空談者，無法有任何作為，在痛苦中失去對生活的思想與熱情，甚至喪失反抗能力，「弗拉西奇絕對不是那種敢於站出來決鬥的人，至於罵他壞蛋，打他耳光，他只會變得更加可憐、畏畏縮縮。這種不會反抗的可憐蟲都是最討厭、最難纏的人」(T.8, C.57, 58)。習慣用順從和畏縮來面對已經異化了的世界，弗拉西奇只能繼續受困於不幸的生活。

弗拉西奇對藝術與音樂一竅不通，務農也缺乏天賦，還因為一場笑鬧劇似的婚姻成為笑柄。弗拉西奇受難者式的生活、懦弱與順從的態度激發季娜的憐憫，而她的青春、大膽和活力充沛的自由思想也打動了他，生活出現一絲微光，幾乎將季娜當做女神般崇拜：「她就是我的神。自從她在我這兒住下的那天起，我走進這所房子就像走進一座神殿。她是個絕無僅有、不同尋常、最高尚的女人」(T.8, C.61)！但伊瓦辛否定弗拉西奇內心的英雄事蹟，眼中只看見弗拉西奇的軟弱與平庸：「他在弗拉西奇的激動和痛苦

裡，以至他的全部生活裡，根本就看不見最近期的或者遙遠的崇高目標，卻只看見煩悶、無聊和缺乏生活能力」(T.8, C.65)。他對於弗拉西奇展現的熱情、正直視為白費力氣，鄙視弗拉西奇將生活中的瑣碎和高尚的價值連結在一起，但伊瓦辛也發現，即使他再如何看不起弗拉西奇，他「仍舊喜愛符拉西奇，感到他身上有一種力量；不知什麼緣故，他從來也沒有勇氣反駁他的話」(T.8, C.65)。因為就生活意義而言，弗拉西奇懷抱著自由的思想，只是在困頓中暫時迷失了，而依瓦辛卻從未有過任何中心思想，當然，也從未真正生活過。

弗拉西奇在苦痛的經驗中被迫丟失對生活的想像，困頓的生活讓他感受到生活的磨難，即使懷有自由思想，卻只能在其中盲目的過活。現實種種壓迫、限制，讓他總是分身乏術，無法尋找到生活的意義。伊瓦辛則相反，除了妹妹的感情事之外，生活從未對他伸出魔爪，一生安於逸樂，直到拜訪依瓦辛後，他「想起自己的生活，暗自相信到目前為止，他的言行都不是他所想的，別人對他也是如此。因此，如今在他眼裡，全部生活就像倒映夜空、糾結著許多水草的池水那樣黑。而且他覺得，這是無法補救的」(T.8, C.71)。前者被生活所迫，失去了精神生活，在愛情中找到唯一希望，後者坐擁財富，卻自甘墮落，生活空虛又無趣，兩人被生活異化，面對困境卻又無能為力。

相較於〈鄰居〉兩個男性角色一個庸俗、一個畏縮，〈關於愛〉的主

角阿列興（Алехин）的形象正面，個性鮮明，雖然從事粗重的農活，但散發出知識份子的優雅氣質：「這是個四十歲上下的男子，身材高而豐滿，頭髮很長，與其說像地主，不如說像教授或者畫家」（T.10, C.56）。阿列興大學畢業後，拋下了他的才能和興趣，回到農場帶領全家人工作，努力償還債務。爲了現實，他活在與理想不合的農村困境中，夾在理想和生活矛盾之中，他如是說：「我自己也耕地、播種、收割，同時又覺得乏味，厭惡地皺起眉頭，好比鄉下那種餓得發慌、溜進菜園裡去偷吃黃瓜的貓；我渾身痠痛，一邊走路，一邊就睡著了」（T.10, C.68）。阿列興清楚意識到自己和原始的農務生活格格不入，但文明的習慣逐漸被疲勞腐蝕，靈魂和肉體都被困在索菲諾村（Софьино）。

阿列興結識了副庭長盧加諾維奇（Луганович）和他的妻子安娜·阿歷克塞耶夫娜（Анна Алексеевна），終於在黯淡的人生找到一思光亮。盧加諾維奇是個和阿列興大異其趣的人，他溫和守舊，面對生活相當淡漠，連參加宴會時都缺乏熱情，「他總是講些沒趣味的老生常談，在舞會和晚會上總是挨近那些穩重的人，沒精打采，顯得是個多餘的人，臉上神情溫順、冷漠，彷彿是人家把他運到這而來出售似的」（T.10, C.72）……生活彷彿與他無關，沒有煩惱，卻也不曾快活，只是奉公守法，在社會上溫順地生活著。但這樣近乎迂腐的人卻經濟實力雄厚，在官場也一路順遂，體現了韋伯異化理論中的核心：官僚制麻痺人心，能聽命辦事，徹底執行上層要求的人們較容易獲得重用。盧加諾維奇無所用心，對生活的壓迫渾然未覺，

自始至終都沒有體悟到生命的酸甜苦辣，更遑論尋找生活的意義了。

然而阿列興和安娜的處境卻使得他們痛苦不安，只有兩人的愛情才是生活重心的寄託，但礙於現實的考量，兩人只能壓抑自己的情感，不敢面對，阿列興自白：「我們彼此之間沒有說穿我們的愛情，而是膽怯地、嚴密地把它掩蓋起來。我們害怕那些足以洩漏我們的秘密的事情」（T.10, C.72）。他們仔細考慮著對方的未來，因而誰也不敢透漏自己的心聲，他們害怕把彼此從一個困境拉到另一個困境，只能暗中享受不為人知的苦戀。最後安娜身體每況愈下，被送往克里米亞（Крым）療養，曾經在苦難生活中給予他們力量的生活意義消失，真切又痛苦的戀情就此畫下句點時，阿列興才意識到：

所有那些妨礙我們相愛的東西是多麼不必要，多麼渺小，多麼虛妄啊。我這才明白過來：如果人在戀愛，那麼他就應當根據一種比世俗意義上的幸福或不幸、罪過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東西來考慮這種愛情，否則就乾脆什麼也不考慮。（T.10, C.74）

祛魅過後，異化的生活崛起，在生活面前無能為力的人們，尋找生活意義變成生活中的難題，阿列興和安娜曾經在愛情中找到了生活的意義，但迫於現實又讓它從指縫間溜走，讓人對阿列興和安娜的命運更添不勝唏噓之感。

同樣講述在愛情中尋找生命意義的故事在〈帶小狗的女人〉中也出現

了。契訶夫藉由一部羅曼史般的故事展現了當代社會苦悶的生活氛圍、對他人譴責的恐懼、對真愛的無能為力與面對現實的裝聾作啞，¹²²希望雖然如同黑暗中的燭光般幽微，但已賦予兩人足夠的力量，繼續與生活纏鬥。古羅夫（Дмитрий Гуров），一看到帶著小狗的安娜·謝爾蓋耶芙娜（Анна Сергеевна）就見獵心喜，情場浪子的形象深植人心。古羅夫大學主修語言學，卻到了銀行工作；準備在私人歌劇團當演唱，卻臨陣退縮，從這樣的行為可以看出古羅夫基本上是個意志不堅定的人，隨著社會的期望而轉變方向，對於生活沒有太多的想法。而他很早就奉父母之命結婚了，妻子的威嚴、莊重讓古羅夫和她之間總隔著一道牆，古羅夫害怕妻子，討厭待在家裡，經常在別的女人身上尋求慰藉。古羅夫瞧不起女人，總是在言語中汙衊女人，但他的生活快樂卻幾乎全部來自女人，甚至可以說沒有女人就不知道怎麼過日子，「只要他一連兩天身邊沒有那個『卑賤的人種』，他就過不下去。他跟男人相處覺得乏味，不稱心，跟他們沒有多少話好談，冷冷淡淡，可是到了女人中間，他就覺得自由自在，知道該跟她們談什麼，該採取什麼態度；甚至跟她們不講話的時候也覺得很輕鬆」（T.10, C.128, 129）。雖然古羅夫經驗豐富，經歷過許多沉痛的教訓，「跟正派女人相好，特別是跟優柔寡斷、遲疑不決的莫斯科女人相好，起初倒還能夠給生活添一點愉快的變化，顯得是輕鬆可愛的生活波折，過後卻不可避免地演變成爲非常複雜的大問題，最後情況就變得令人難以忍受了」（T.10, C.129）。

¹²² 網路資料：《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анализ рассказа Чехова.

（<http://goldlit.ru/chehov/291-dama-s-sobachkoi-analiz>）（2014.02.14）

然而生活的空虛卻逼得他總是重蹈覆轍，「每一次他新遇見一個有趣味的女人，這種經驗不知怎的總是從他的記憶裡消失；他渴望生活，於是一切都顯得十分簡單而引人入勝了」（T.10, C.129）。古羅夫對生活的渴望只能藉由外遇的新鮮感滿足，甚至必須一再地外遇才能體驗生活，顯然是異化後缺乏生活意義的象徵。

古羅夫爲了尋找生活中的樂子來到雅爾達（Ялта），而安娜則是爲了逃避丈夫而來，她的婚姻對她而言同樣是種限制：「我嫁給他的時候才二十歲，好奇心煎熬著我，我渴望過好一點的日子，我對自己說：『一定有另外一種不同的生活。』我一心想生活得好！我要生活，生活」（T.10, C.132）。無趣的生活逼得古羅夫四處尋花問柳，也使得安娜走投無路之下逃到雅爾達，單純的安娜很快就上鉤，成爲古羅夫風流情史的一章。兩個缺乏生活目的的人碰撞在一起，火花表現上隨著安娜返回莫斯科畫下句點，但實際上卻在他們的心裡燎原。起初只有安娜一人投入的愛情，最後卻在古羅夫心裡一發不可收拾，「他一閉上眼睛就看見她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顯得比本來的樣子還要美麗，年輕，溫柔；他自己也顯得比原先在雅爾塔的時候更漂亮。每到傍晚她總是從書櫃裡，從壁爐裡，從牆角裡瞅他，他聽見她的呼吸聲、她的衣服的親切的窸窣聲」（T.10, C.136）。安娜像影子一樣沉默卻亦步亦趨地跟著，他目光追尋著安娜的身影，愛情賦予了古羅夫生活的意義。

愛情成爲古羅夫和安娜活著的目的，他們同樣忍受著古羅夫口中的兩種生活：

「一種是公開的，凡是要知道這種生活的人都看得見，都知道，充滿了傳統的真實和傳統的欺騙，跟他的熟人和朋友的生活完全一樣；另一種生活則在暗地裡進行。由於環境的一種奇特的、也許是偶然的巧合，凡是他的認為重大、有趣、不可或缺的事情，凡是他的真誠地去做而沒有欺騙自己的事情，凡是構成他的生活核心的事情，一律是瞞著別人，暗地裡進行的；而凡是他的弄虛作假，他用來偽裝自己、遮蓋真相的外衣，例如他在銀行裡的工作、他在俱樂部裡的爭論、他的所謂『卑賤的人種』、他帶著他的妻子去參加紀念會等，卻統統是公開的。他根據自己來評斷別人，不信他眼前所見的事，老是揣測每一個人都在秘密的遮掩下，就像在夜幕的籠罩一樣，過著他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

(T.10, C.141, 142)

古羅夫帶著虛偽的假面具在表面生活中遊走，婚姻、工作、聚會對他來說卻一點意義也沒有。遇見安娜之前，他生活的目標和樂趣來自於短暫歡樂的婚外情，一感到無趣就抽身，直到遇見安娜，他才有了心靈寄託。安娜溫順地在表面生活受苦，她瞧不起丈夫，忍耐毫無意義的婚姻與生活，內心期盼著更好的、不一樣的生活，卻常常失望，瀕臨崩潰時逃到雅爾達，遇見了古羅夫，對他的依戀支撐起她的生活與心靈，在這場不可告人的戀愛中，兩人缺失的生活意義逐漸被找回——對嶄新、美好的未來的期盼。

〈鄰居〉、〈關於愛〉和〈帶小狗的女人〉這三個故事理念與韋伯理想中異化生活的出口殊途同歸：這個時代世界已經被祛魅，人們的命運便是必須從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尋找那些已經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的最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¹²³生活意義的缺乏，也就在愛人和被愛之中找到了一個解套方式。弗拉西奇與季娜的愛情是他們逃離苦悶、煩惱的出口，但卻不見容於哥哥伊瓦辛和家庭；阿列興和安娜曾經朝著生活微弱的閃光前進，最後卻還是失去了方向；古羅夫和安娜較他人幸運，他們找到了出路，但同時卻也更為不幸，因為他們清楚地了解活在空虛的表面生活和秘密的實際生活會有多艱難。

貳、個人意識的消散

馬克思將異化區分成兩種，一是物質與金錢的異化，它們超越人類掌控，搖身一變成爲人類的依歸；另一種則是權利的異化，少數人握著大量財富、權利，奴役其他勞動者。¹²⁴在第一種狀況中，人被異化後，爲了追求金錢，想方設法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第二種，則是人被畫分成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剝削者感覺生活空洞沒有意義，而被剝削者在生活中只感受到奴役和痛苦，以上兩種狀況，人所處的外在世界都已被異化，自我意識也隨之消散，〈姚內奇〉（*Ионыч*, 1898）、〈出診記事〉（*Случай из*

¹²³ 韋伯著，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48-50。

¹²⁴ 孫伯鏞，同註2，頁6-8。

практики, 1898) 都是馬克斯理論中異化的例子。

德米特利·姚尼奇·斯塔爾采夫 (Дмитрий Ионыч Старцев) 被派到 C 城做地方自治局醫生，定居在城鎮的郊區，與農民、病人都有來往，和 C 城最有名望的屠爾金 (Туркин) 一家交好。斯塔爾采夫深受屠爾金的女兒葉卡捷琳娜·伊凡諾夫娜 (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的吸引，但葉卡捷琳娜因為自己的音樂夢想拒絕了斯塔爾采夫的求婚後。從此，斯塔爾采夫的人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在 C 城執業五年的斯塔爾采夫不再為了減輕人們痛苦而替人治病，診療的理由變成了金錢的累積。斯塔爾采夫看不起居民，對無知的議論感到厭煩，因此鮮少和人交談，和誰都不深交，斯塔爾采夫成為陰鬱、傲慢的人，而他生活的目的地完全變成了追求財富，任何藝文活動都提不起他的興趣，「對於戲劇和音樂會這類娛樂活動，他向來不去參加，可是每天晚上都打『文特』，一玩就是三小時，玩得興致勃勃」(T.10, C.36)。從關懷群眾的醫師，變成沉迷賭博的賭徒，異化幾乎改變了他的人格。

而再次和葉卡捷琳娜相見時，縈繞在斯塔爾采夫心中的已經不是過去的那抹倩影，對她的感覺在不如從前那樣熱烈了：「即使現在他還是覺得她動人，動人得很，不過，她缺了一點什麼，要不然，就是多了一點什麼？他自己也說不清究竟是什麼，可是有一種東西在作梗，使他生不出從前那種感覺來了」(T.10, C.37)。想到過去的熱情，斯塔爾采夫反而感到不自在了。時間讓感情變淡，但讓他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已經完全被生活異化，

對愛情沒有任何興趣了。葉卡捷琳娜和他在花園會面時，「他也記起了過去的一切，連同全部細節：他怎樣在墓地徘徊，後來在凌晨又怎樣筋疲力盡地回到自己的住處。他忽然傷感起來，往日的情懷多麼令人惋惜，他內心的激情似火花般閃亮了」(T.10, C.38)。過去因為愛情而產生的美好和疼痛似乎又燃起他心中的情感，但「斯塔爾采夫想起了每天晚上從衣袋裡拿出鈔票來，津津有味地清點，他心裡那點火星就熄滅了」(T.10, C.39)。隨著斯塔爾采夫的變化，人們對他的稱呼也從表示尊敬的名字加上父名，變成輕蔑地只稱呼他的父名——姚內奇。斯塔爾采夫一開始在與人相交往時感到舒服、對愛情懷抱有希望，靈魂具有溫度，但受到異化後，轉變成眼中只剩鈔票、田莊、房產等物質的人。

姚尼奇有許多職務在身，必須面對鄉村、城鎮的病人，還有地方自治局的工作讓他分身乏術，但他不以為苦，「他有許多事要辦，可是仍舊不放棄地方自治局的職務。他貪得無厭，凡是可以賺錢的機會都抓住不放」(T.10, C.40)。姚尼奇的自我意識顯然被異化的生活目標吞噬，賺取金錢不再是為了維持必要的生活，而是人生的終極目標。異化了的姚尼奇除了賺錢，對其他任何事都不感興趣，過著枯燥無味的生活，由於這種改變，人們在姚尼奇眼中已經不具有人的價值，人與人之間的尊重、互愛不存在他的思想當中，因此他變得暴躁、易怒，面對病人時總是發脾氣。回顧斯塔爾采夫剛到 C 城的生活，那時他只因結識了屠爾金一家就感到心滿意足，而葉卡捷琳娜的一舉一動都能讓他開心，但在異化之後，自我意識完全消散，內

心不再具有崇高的價值、溫暖的感情等人類應該具有的想法，彷彿只有金錢能夠滿足他，但姚尼奇累積了許多家產後，個性變得乖僻，人們面對他時戰戰兢兢，盡力迎合，即便如此，他的生活仍舊空虛、乏味，毫無快樂可言。

姚尼奇的自我意識被對金錢的渴望埋沒，屬於馬克思異化理論中第一類型的受害者，筆者認為〈出診記事〉是契訶夫創作後期中最能表現出馬克思異化理論中第二種狀況的短篇作品，寫實的呈現工人被奴役、剝削的生活，同時描繪了剝削者內心的不安。

〈出診記事〉藉由醫生柯羅遼夫（Королев）一次出診的見聞點出了俄國的異化現象。工廠主人麗雅里可娃（Ляликова）太太的獨生女兒（Лиза）生病了，醫生柯羅遼夫代替教授前往工廠出診。夜裡醫生留守時，想到了工廠裡的場景，感到相當不快：

一千五百到兩千個工人在不健康的環境裡不停地工作，做出質地粗劣的印花布，半饑半飽地生活著，只有偶爾進去小酒店，才能從這種惡夢裡漸漸醒來。另外還有上百個人監督工人做工，這些人一輩子只負責記錄工人的罰金、罵人、做些不公道的事情。廠內只有兩三個所謂的廠主，自己一點事兒也不幹，卻看不起那些糟糕的印花布，然後坐享工廠的利益。（T.10, C.80, 81）

工人們在惡劣的環境底下工作，工時越長、產量越高，工人自身的損

壞也就越大，而他們辛苦的勞動成果大部分進入了別人的口袋，這就是異化最根本的起源：工人的勞動成爲產品，屬於剝削、壓榨他們的工廠主人，爲這些剝削者帶來廣大的利益，工人們僅僅獲得了與失去的時間、體力不相符的報酬，甚至還賠上健康，¹²⁵契訶夫作品中展現了各種不同的異化樣貌，這部短篇般誠實又赤裸地呈現工廠狀況，幾乎完全符合馬克思異化理論的源頭，因爲工人們的生活就是一場悲劇，而這齣悲劇異化了工人的內心，讓工人喪失自我意識，不明白自己身爲「人」的價值。

握有權力、金錢的人們，總是以下對上的態度面對被剝削者，「平常工人做著枯燥無味、損害健康的苦工，他們吵架、酗酒，滿身蟲子。而此刻，那些工人正在戰戰兢兢、恭恭敬敬地給四輪馬車讓路，柯羅遼夫在他們的臉上、便帽上、步伐上，看出他們全身髒兮兮，帶著醉意，驚慌不安」(T.10, C.75)。工廠主人想要改良工人生活的舉動，例如：讓工人演戲、看幻燈片、替工人請醫生等，在柯羅遼夫看來對現況一點幫助也沒有，「他，作為醫師，善於正確判斷那種無法查明病根，因而無法醫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廠也視爲一種不正常現象，原因同樣不明，而且無法消除。他並不認爲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種種措施都是多餘的，不過，他把它們看得跟醫治不治之症一樣」(T.10, C.80)。被剝削者過著痛苦的生活，而有良心的剝削者內心同樣不平靜，就拿工廠主人麗雅里可娃太太和女兒麗札來說，她們掌握了大量的財富，卻過著不幸的生活。麗雅里可娃太太怯弱、膽小，把感情都寄託

¹²⁵ 孫中興，同註 15，頁 29-31。

在獨生女兒身上；而麗札看來就像是個需要人們憐憫的窮人，她多愁善感，對於自己的身份地位感到害怕，在診療中對醫生表明她坐享其成的心虛和罪惡：「我要對您說說我自己的看法。我覺得自己好像沒什麼病，只是我心裡不安，我害怕，因為處在我的地位一定會這樣，沒有別的辦法」(T.10, C.83)。惡劣的工作環境、極低的薪水、漫長的工時、工作到半夜的工人們、工廠傳來的陣陣聲響都敲在麗札的心上，逼著她面對不勞而獲、像是強盜般的生活。

故事中沒有人了解生活的意義，也沒有動力去了解。工人每天活在被剝削的痛苦之中，藉由酒精麻痺自己；麗雅里可娃太太和麗札享受著優渥的生活，前者下意識地對生活感到害怕，後者過得痛苦萬分。異化就像一層陰影一樣籠罩著他們，讓她們看不清楚真正的生活該是什麼樣子。醫生的一席話讓麗札恍然大悟：

「您處在工廠的主人和富有的繼承人的地位，卻感到不滿意，您不相信您有這種權利，於是現在，您睡不著覺了，這比起您感到滿意，睡得酣暢，覺得樣樣事情都順心當然好得多。……我們這一代呢，卻睡不好，感到苦惱，談許許多多話，老是想判斷我們做得對不對。…再過上五十年光景，生活一定會好過了，只是可惜我們活不到那個時候。要是能夠看一眼那時候的生活才有意思呢」。(T.10, C.84)

她終於理解自己的出路只有一條：拋下這五間工廠和百萬家產，離開這個食人血肉的生活。柯羅遼夫醫師是故事中唯一清醒、保有自我意識的

人，最後喚醒了麗札的意識，但他們對現況同樣無能為力，只能將希望寄託在遙遠、不可知的未來。

以上分析的異化案例是從馬克思的視角出發，將矛頭對準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弊病，而從韋伯的觀點來看，他認為除了資本主義以外，官僚制也是社會異化的主因之一，指出：祛魅導致信仰體系的解體，人生成爲無意義的存在，再也不可能產生「盡享天年」之感，理想價值消失之後，人們追求的目標被侷限在世俗的框架中，個人自由意識日趨消失，生命的意義也日趨枯竭，剩下的就是「資本和技術官僚冷漠無情的統治」。¹²⁶

官僚體系雖然是政治上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但契訶夫所處當代俄國社會，不見官僚制的諸多優點，只看見其中死板的制度、腐敗的官員。官僚制在契訶夫作品中和金錢一同扼殺了社會的生氣，儼然是異化的幫兇之一，〈套中人〉、〈醋栗〉和〈關於愛〉三部曲都展現了官僚對個人意識的壓抑，〈醋栗〉的尼古拉和〈關於愛〉的盧加諾維奇是官僚制度異化下的生存者，他們奉公守法，以事不關己的漠然態度融入官僚制度與社會當中，麻木而不思反抗地過活，而別里科夫是個相當極端的例子，他面對異化時的恐懼、慌亂都展現在他的行爲當中，三者面對官僚制度的異化都有其因應之道，但無人能夠脫離異化的影響，都是官僚制度下的受害者。

¹²⁶ 王澤應，〈祛魅的意義與危機〉，《湖南社會科學》，2009，第4期，頁5。

〈醋栗〉中的尼古拉十九歲起開始在稅務局工作，而他在稅務局時總是畏縮地坐著，每天沉默不語做著同樣的工作，幻想著莊園，那時他甚至不敢發表自己的見解，但買了莊園，搬回鄉下後，過去在稅務局那種懦弱職員的生活好像不曾存在一般，他對農民頤指氣使，態度高高在上，「尼古拉·伊凡內奇從前在稅務局裡甚至不敢有自己的見解，可是現在他所講的話沒有一句不是至理名言，而且是用大臣那樣的口吻講出來的」(T.10, C.61)。身處官僚體系當中時，尼古拉無法抵抗來自制度的支配，因此對上級唯命是從，完全不敢有自己的想法，等到他脫離稅務局後，成為自己的主人，自我意識看來似乎死灰復燃，脫離了官僚制度的異化，但卻又再度落入物質的陷阱中，尼古拉自我意識在童年或許還看的見一些蹤影，但隨著他進入政府機關，某部分的自我意識已經被制度吞噬，在現實中無法享有自由，每天都被困在同個地方、做著同樣的事，他只能苦心追求自己夢想中的莊園，以逃避壓抑沉悶的生活。追逐的過程中，自我意識剩餘的那部份卻逐漸被物慾蒙蔽，尼古拉和庸俗的社會妥協，私有財產的強烈執念超越了人性，¹²⁷因此到了最後，尼古拉居住在自己的莊園，不多加思考，和動物一樣了。

〈關於愛〉的盧加諾維奇是地方法院的副庭長，身分地位較稅務局的小職員尼古拉為高，面對官僚體系的異化時，不似尼古拉那樣的怯弱、畏

¹²⁷ 孫兆恒，〈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與環境〉，《雁北師範學院學報》，2006，第22卷第1期，頁72-74。

縮，但同樣缺乏主見，對上級的命令深信不疑，「盧加諾維奇是個好心腸、樸實的人，像這樣的人堅定的抱著一種看法，認為一旦受審，那就必定是有罪，誰對判決的公正有所懷疑，誰就只能按照法定手續用書面提出，而萬萬不能在吃飯時候，在私人間的閒談裡表達出來」(T.10, C.69)。盧加諾維奇其實是個好人，與妻子安娜同樣關心阿列興的處境，對阿列興的生活感到遺憾，在阿列興有困難時慷慨解囊，完全將阿列興當成自己人。阿列興一再強調盧加諾維奇的善良，但阿列興同時卻也看見了盧加諾維奇的守舊、死板。盧加諾維奇融入職場和社會都使用同一個方法——減少個人意識與存在感，他把官僚體系視為堅不可摧的一種制度，努力讓自己融入其中。在契訶夫寫作的時代，建立於理性、非人格的官僚制度正嚴密地統治俄國，鮮明的自我意識或是過多的非評斷都可能惹禍上身，身處官僚機構當中的官員更是人人自危，像盧加諾維奇一樣缺乏個人意識與特色的文官相對來說更受長官青睞，也就更能在職場上生活。

尼古拉和盧加諾維奇兩人的故事都有著濃厚的異化色彩，他們順應著社會風氣，從中找尋自己的出路，即使缺乏個人意識，生活空虛無趣，卻成功避免了和社會的實際衝突，而〈套中人〉的別里科夫則是既缺乏自我意識，又和社會衝突的特殊例子。

別里科夫（Беликов）古怪、膽怯、孤僻，和人相處時總是帶著一層層的套子。同時，他也對一切存有疑慮，時時戒慎恐懼。總體而言，外在世

界令別里科夫感到害怕、不自在，但在這些情緒當中卻隱藏著狂熱——對上層命令的強烈信仰。別里科夫對所有事情存疑，「只有政府的通告和報紙上的文章，其中寫明禁止什麼事情，他才覺得清清楚楚。……至於批准和允許的事，他卻覺得含有可疑的成份，含有某種模糊而沒說透的東西」(T.10, C.43)。別里科夫討厭人群，連和同事往來都相當的制式化，偶爾到同事家坐坐，但在那一兩個鐘頭內總是一言不發。對別里科夫而言，人與人的交際只是應盡義務之一。別里科夫為人冷淡，但面對有人破壞規矩時，就會變得異常激動，「各種對於規章的破壞、規避、偏離的行為，雖然看起來和他毫不相干，卻使得他垂頭喪氣。如果做祈禱的時候有個同事來遲了，或者中學生玩皮搗亂的事傳到他的耳朵裡，或者有人看見女學監很晚同一個官在一起，他就激動不安，老是說，千萬別鬧出什麼亂子來」(T.10, C.43, 44)。別里科夫平常極力縮進套子中，但在校內或鎮上發生事情時積極評論、插手，甚至不達目的不罷休。他先從調皮搗蛋的學生開刀，利用職務，說服了其他老師，開除了兩個學生；接著，他古怪的個性也讓學校的老師、甚至校長都紛紛妥協；最後，他甚至將魔爪伸往小鎮，整個小鎮在他的監控之下，人人自危，各式活動無論正派與否都被取消，表面上小鎮井然有序，但氛圍總是死氣沉沉。

別里科夫內在懦弱的人格和外在強勢的行為兩相比較下，顯現出他的矛盾。新來的史地老師柯瓦連科一見別里科夫就心生厭惡，絲毫不能忍受，而整體環境對於別里科夫的容忍也讓他覺得不可思議：「我不明白你們怎麼

能跟這個告密的傢伙，這個惹人討厭的醜八怪相處。哎，諸位先生，你們怎麼能在這兒生活，你們這兒的空氣惡劣極了，簡直會把人活活悶死，難道你們算是導師、教師？你們是官僚，你們這兒不是學府，而是城市警察局，有一股酸臭氣，像在警察亭子裡一樣」(T.10, C.49)。柯瓦連科和姊姊瓦爾瓦拉(Варвара)未受別里科夫的荼毒，仍保有活力和思考能力，他們讀書、在街上爭論，甚至騎腳踏車，這些他們看來理所當然的事情卻是小鎮好久沒有體會過的自由，而這些行爲也激怒了別里科夫，最後甚至氣死了他。

別里科夫缺乏任何思考能力，在極權社會殘酷的生存環境之下，每每遇到現實生活和法律、告示或規矩的牴觸，精神就會遭遇危機，他的脆弱讓他無法與之對抗，不由自主流露出發自本性對極權統治的怯弱、盲從，而他時時處在恐懼當中，面對生活時迷惘、無能爲力。¹²⁸別里科夫的死亡並未替小鎮帶來真正的解脫，「然而一星期還沒過完，生活就又照先前一樣，仍然那麼嚴峻、令人厭煩、雜亂無章了。這樣的生活固然沒有經政府的告示禁止，不過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許可啊，情況並沒有變得好一點。確實，我們埋葬了別里科夫，可是這類的套中人，而且將來也還不知會有多少呢」(T.10, C.53)！別里科夫的故事看來只是一齣諷刺的荒誕劇碼，但實際上在他短短的人生旅程中卻概括了當代社會人們共同遭遇的精神危機

¹²⁸ 安春華，〈從〈套中人〉看契訶夫的創作意識〉，《中州大學學報》，第26卷第三期，2009，頁62-65。

與痛苦，沙皇長期的高壓統治扭曲了當代俄國社會的思想，這類的套中人並不是特例，未來也會繼續存在，影響社會、壓抑社會的生氣。

韋伯則將異化歸咎於全面的理性化，而當中最具規模的就是官僚制度。官僚系統是較為有理可循的統治模式，但這樣的層級式管理機構容易淪為僵化的政治機器，上層者利用自己的權勢獲取不當的利益，而下層者習慣遵從上極指示缺少是非判斷能力，官僚制度在運作的同時，也正在漸漸掏空被統治者的個人意識，而當官僚過份入侵生活領域時，往往也帶走社會的生氣，¹²⁹使得社會死氣沉沉，人們毫無想法地麻木度日，尼古拉、盧加諾維奇都是這樣的例子。除了官僚之外，人民也在專制的高壓統治下逐步成為當局的機器，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有意無意地充當起警察、密探，如同別里科夫一般助長當局的統治，¹³⁰最後成為政府的機器，失去自我意識。

¹²⁹ 顧忠華，同註 108，頁 283-285、289。

¹³⁰ 胡克剛著，徐祖武主編，《契訶夫研究》，1987，頁 69-71。

第四章 「異化」主題的外在表現

十九世紀八零年代初，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登高一呼：「上帝已死」，宣布人類和世界的神祕連結已然消失，宗教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撫慰人心，為生活提供目的，世界陌生的新面貌取而代之，祛魅後產生的迷失感和資本主義一起異化了人類。異化生活的空虛和無意義、世界冷酷殘忍的面貌滲透進文學作品，就是荒誕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中的起源。著名作家卡謬（Albert Camus，1913-1960）將荒誕定義為：人和世界的對立，由於這種斷裂，導致人在面對生活時不知所措，一切顯得空虛而無意義，¹³¹而正是人與世界的斷裂，人才能意識自己的渺小和世界的廣大。除了上述的深層意義，荒誕同時具有：不合常規、缺乏邏輯與荒謬可笑等淺顯易懂的特質。

可悲又可笑的本質構成了契訶夫作品荒誕的主軸，前後期作品表現了不同的特質。前期作品中，契訶夫將矛頭對準社會，風格具有荒誕淺顯的特質，詼諧逗趣地諷刺社會；後期作品，契訶夫則將鋒頭轉向人的行為，作品較少，卻展現了較富深度的荒誕特質。契訶夫作品中各種荒誕的行為都是人類被異化的證明。異化表象可畫分為外在表現和內在反映兩種，行為

¹³¹ 胡月霞，〈從卡謬的薛西弗斯神話——看現代人的幸福與荒謬〉，《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第七屆論文集》，2008，頁 2-5。

是內在的一面鏡子，反映內心的思想與意識，當內心意識被異化，外在筆陷也就不可避免地開始脫離常軌，終至崩壞。筆者將外在表現的荒誕畫分為個人行為的異常與人際關係的疏離二方面，兩者環環相扣，展現出社會整體的異化氛圍，本段落前半部討論個人的異化行為，後半部則分析異化的群體生活。

第一節 個人行為的異常

十九世紀中後期是俄國社會不斷資本主義化，階級衝突日益激烈的年代，¹³²別林斯基、赫爾岑、杜伯羅留波夫等人的思想已深入民間，產生效果。民粹運動風行，知識份子帶頭與專制、農奴制的遺毒抗爭，政府卻相對的保守反動，處處壓制，各種價值觀的衝突造成俄國社會思想的「混亂」，金錢名聲蒙蔽人心，官僚制度吞噬意識，內心的異化展現在價值觀的扭曲和自我的喪失兩個方面上，外在的異化則反映在行為上，轉變成恐懼、庸俗和對死亡的嚮往三個形式，恐懼反映人們對生活的不確定感，庸俗展現人們思想的匱乏，而嚮往死亡則代表了現世生活的悲哀與無助。契訶夫後期作品常常出現這類異化後內心衰弱，進而被生活擊敗的角色，而他們大多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¹³³就某些層面而言，展現了俄國社會異化後的混亂。

¹³² 曹靖華主編，同註 50，頁 263-266。

¹³³ Катаев В.Б.(ред.) *Чехов и Германия*. М.: МГУ, 1996, с.136-139.

壹、 恐懼

恐懼是人類的本能反應，是面對危險或未知事物時自然出現的情緒，但在契訶夫作品中主角的恐懼往往超越可理解的範圍，生活刺激、驚嚇，甚至令他們倍感威脅。受到異化的人們面對生活時，最先感受到的是橫亙在他們與社會、他人之間的障礙，任何事情都可能激發他們的不安全感，他們惴惴不安，內心沒有片刻的安寧。〈套中人〉和〈恐懼——我朋友的故事〉（*Страх-Рассказ моего друга, 1892*）這兩篇作品將因異化而過度放大的恐懼表現得淋漓盡致，前者藉由生活中種種躲藏的行爲表現出對社會的恐慌，而後者從角色的自白描畫出對生活整體的畏懼。

別里科夫在〈套中人〉登場時的打扮就讓他詭異的形象躍然紙上，「他總是穿著套鞋、帶著雨傘，而且一定穿著暖和的棉大衣。……就連他的臉也好像裝在套子裡似的，因為他總是把臉藏在豎起來的衣領。他帶黑眼鏡、穿絨衣，耳朵裡塞上棉花，一坐上出租馬車，就吩咐車伕把車棚支起來」（T.10, C.43）。他的行爲展現了身處於這個世界的不安，「一句話，在這個人身上可以觀察到一種經常的和不可遏制的企圖，總想給自己包上一層外殼，給自己製造一個所謂的套子，以便同世人隔絕，不致受到外界的影響」（T.10, C.43）。別里科夫躲藏的行爲表現了他對生活和改變的恐懼，而僅僅是將自己的身體隱藏起來還不夠，他連思想都放進套子裡，不讓人一探

究竟。別里科夫在從前、不曾存在的事物和希臘語中找到自己的天地，當中沒有任何創新和變化，也就不會有事物驚擾他，因此在現實生活總是惶惑不安的他，總是稱讚過去，說到希臘語時甚至會露出甜蜜的表情。小說中並未仔細說明故事發生的年代，但從敘事者的口吻和別里科夫的行為就能看見當代俄國的反映，由上而下的權威、由外至內的干擾引發人對生存環境的病態恐懼，人和社會針鋒相對，充滿壓迫的社會氣氛則讓眾人除了妥協無計可施，別里科夫只好選擇用套子武裝自己異於常人的恐懼。從別里科夫的行為可以清楚觀察到異化的特徵，他害怕生活，總試圖隱藏自己，「他在被子裡心驚肉跳。他生怕會出什麼亂子，生怕阿法納西來殺他，生怕小偷溜進來，後來通宵做驚慌不安的夢。早晨我們一塊兒到中學去的時候，他心情煩悶，面色蒼白」(T.10, C.45)。在社交生活上，他也總是惶惑不安，「看得出來，他所去的那個人數眾多的中學，惹得他全心地害怕和厭惡，對他這個性情孤僻的人來說，跟我一塊兒走路，也是一件苦差事」(T.10, C.45)。外在世界對被異化的別里科夫來說是個猛獸，無論他如何盡力隱藏，卻始終無法獲得內心的平靜。

別里科夫除了背負個人的恐懼之外，還身兼專制制度的護航者，他像個祕密警察般不停地監視、打探眾人，不僅牢牢地將自己束縛在高壓統治下，¹³⁴整個城鎮也在他的威嚇之下變得死氣沉沉：「全城都受他的控制！

¹³⁴ 孫兆恒，〈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與環境〉，《雁北師範學院學報》，2006，第22卷第1期，頁72-74。

我們這兒的太太在星期六不搞家庭演出，因為怕他知道。教士們當著他的面不敢吃葷，不敢打牌」(T.10, C.44)。別里科夫的影響不僅止於特定對象益發小心謹慎的行爲，還嚴重地壓迫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別里科夫這樣的人的影響下，在最近這十年到十五年間，我們全城的人變得什麼都怕。他們不敢大聲說話、寄信、交朋友、讀書，不敢周濟窮人、教人識字」(T.10, C.44)。由此可見，別里科夫不但是恐懼的受害者，也是帶原者，他不遺餘力地將自己的驚慌傳達至周遭，但就算如此，他仍沒有一刻感到鬆懈，連在愛情中也總是有著諸多顧忌：「這件事弄得我六神不安，我現在通宵睡不著覺。老實說，我害怕，她和她弟弟的思想方式有點古怪，他們議論起事情來，您知道，有點古怪，她的性情又很活潑，一旦結了婚，以後說不定就會惹出什麼麻煩來」(T.10, C.48)。別里科夫對外界近乎病態的恐懼，只能藉由各種套子來抵抗，他利用衣物、套鞋、雨傘、車篷遮掩自己的身體；利用政府的法律規章隱藏自己的想法，將夢想寄託在過去或是不存在的事物，旁人看來他已經將自己遮掩的密不透風，別里科夫卻尤嫌不足，不論何時都戰戰兢兢，害怕眾人悠悠之口，也畏懼他心中至高無上的政府，但即便這樣，他的內心仍從未安寧。

直到死後，別里科夫才真正逃離無窮無盡的恐懼，從滿是壓迫的世界中解脫，「如今他躺在棺材裡，他的神情溫和、愉快，甚至高興，彷彿他在慶幸他終於裝進一個套子裡，從此再也不必出來了」(T.10, C.52)。死亡落實了別里科夫一生追求的梦想：徹底地與社會隔絕。棺材是別里科夫最完

美的套子，他寧靜安詳地躺在其中，外在的紛擾再也不能驚醒他。然而，恐懼並未隨著別里科夫入土，喪禮過了不到一個星期，人們心中自由的感覺又消失了，恐懼還是占據在人們的腦海，毫不放鬆對人們思想的掌控。

別里科夫的恐懼來自社會，當中包含了許多複雜的因素：政府、上司、同事、學生，甚至小鎮居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不自覺中引起他的憂慮與害怕，他無法克制自己的恐懼，也無法容忍他人做出違反法規的事，破壞眼前虛假的和平，因此，別里科夫終其一生都在杞人憂天。套中人面對困境時怯弱、無能，這樣的人生旅程不僅可笑，而且可悲，生活帶來的只有價值衝突、自我破碎和無數的恐懼，揭示了當代俄國面臨的危機與異化生活的困境。

契訶夫描繪〈套中人〉的主角別里科夫時，著重於非常外顯的異化行為，別里科夫一言一行無一不透露出自己的恐慌；〈恐懼——我朋友的故事〉中，契訶夫則將重點轉換在兩個主角面對生活時內斂的恐懼，他們的行為不如別里科夫詭異的外顯，讓人一眼就能判斷他們的害怕，但由於已經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社會滿是虛偽，混亂有過之而無不及。

〈恐懼——我朋友的故事〉中有兩個主角，一個是西林（Силин），另一個是文章的敘事者。西林大學畢業後曾經在政府機關工作，後來辭掉工作回家務農，敘事者對他這樣的行為相當不置可否。西林相當喜歡敘事者，

雖然敘事者也認為西林聰明、善良又誠懇，但從他對西林行爲的反應可以看出兩人關係並不對等：「每次他把藏在心裡的秘密告訴我，把我們的關係說成友誼，總會惹得我不痛快，使我覺得彆扭。他對我的友情有點讓人難受、不舒服，我寧願只跟他維持普通朋友的關係」(T.8, C.127)。敘事者對於西林的妻子瑪麗雅·謝爾蓋耶芙娜(Мария Сергеевна)有著特殊的情感，也就讓這樣不對等的友誼更增添了一層隔閡。這些待人接物的小事雖然微不足道，卻和接下來西林與敘事者的交往息息相關，也連帶著影響他們的生活。西林的自白讓某個下午變成敘事者心中最難忘的黃昏，西林說出自己認為最值得畏懼的東西其實是生活本身：

「有時候，我心裡煩悶，就會幻想我死後的情景，我描繪過成千種極其陰暗的景象，把我自己弄得又痛苦又興奮，像是夢魘，不過請您相信，在我眼中，就連那情景也不會比現實可怕。當然，那些幻象是可怕的，可是生活也可怕。我呢，好朋友，不瞭解生活，怕生活。……世界上有一種害怕曠野的病，我得的是一種害怕生活的病。每次我躺在草地上，良久地看著一隻昨天才出生、對什麼都不瞭解的小甲蟲，我就覺得它的生活充滿恐懼，而且在它身上我看見了自己」。(T.8, C.130, 131)

生活對西林來說，不是他存在的地方，而是他的夢魘，在當中他只感受到種種的未知和恐懼，這種與周遭的隔閡便是身處在異化當中不知何去何從的人們的心聲，也是契訶夫作品中荒誕的特質之一——世界的不可知。

這樣的荒誕使人意識到自己與世界的隔閡、感受到精神的痛苦，進而對世界感到畏懼，最後只能在異化困境中苦苦掙扎。¹³⁵

西林的思想中已經被埋下恐懼的病根，體悟到生活的不可理解之後，恐懼更是肆無忌憚地從四面八方席捲而來，他明白自己生病了，卻又無計可施。他害怕的不是攸關生死的大事，而是日常生活當中最瑣碎的小事，因為就連在小事中也處處可見人的虛偽和生活的殘酷：「我覺得可怕的，主要是我們誰也躲不開的日常瑣事。我沒法分清我的行動當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做假，這總使得我心慌。我體會到生活條件和教育把我限制在狹小、虛偽的圈子裡，我的全部生活無非是天天費盡心機欺騙自己和別人，而且自己並不覺得。一想到我到死都擺脫不了這種虛偽，就心裡害怕」(T.8, C.131)。西林的恐懼其來有自，因為不論是他自己或是正在聽他說話的敘事者都是他口中那些虛偽的人。西林在政府機關感受到這種恐懼，但在農村卻同樣對生活感到害怕，他害怕人們的無知、生活的無趣，也害怕自己無法察知生活的意義，因此不管在哪，恐懼的陰影總是糾纏著他。他本人認為，他最深沉的恐懼源自於不幸福的婚姻生活，因為他的妻子從未愛過他，「我的婚姻既古怪又愚蠢。必須告訴您，婚前兩年的時間，我一直著魔似地愛著瑪霞，追求她。我向她求過五次婚，她都拒絕了，因為她對我根本就不感興趣。到第六次，我被愛情折磨得暈頭轉向，就在她面前跪下，

¹³⁵ 姜曉潔，〈論契訶夫小說的荒誕性〉，《陝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9，第11卷第2期，頁50-52。

乞討似地求婚，她才同意。……我現在仍舊跟婚後第一天那樣熱烈地愛她，可是我覺得她仍舊對我冷淡，每逢我走出家門，她大概暗暗高興」(T.8, C.132, 133)。西林和妻子處在同個屋簷下，卻無法感受到愛情，這讓他對一切又更疑慮，他不知道妻子對自己是否有感情，也不了解自己婚姻的意義。人與人之間充斥著虛偽與謊言，妻子的愛卻又虛無飄渺，和周遭的人們、世界又缺乏連結，無怪乎他總是戒慎滿恐懼。

敘事者鮮少透漏自己的內心，雖然聽著西林說話，但顯然毫不關心，只是在心中盤算著怎麼接近瑪麗雅。敘事者想起自己的幸福感到膽戰心驚，但內心卻又無懼地想：「在他看來，生活是可怕的，那也就不必跟生活講客氣，索性打碎它，趁它還沒碾碎你，凡是可以從它那兒撈到手的，你統統拿過來就是」(T.8, C.137)。敘事者也確實實行了他自己對生活的理念，在衝動之下和西林的妻子瑪麗雅發生了一夜情，但瑪麗雅對他的深情讓他卻步，接著西林發現了他們私通，這兩件事讓西林的恐懼也蔓延到敘事者身上了：「我瞧著那些白嘴鴉，看見牠們在飛，不由得覺得奇怪、害怕。我為什麼做這件事？為什麼這件事要落到這樣的下場，而不是別樣的結局？她嚴肅地愛我，他到我的房間裡來取帽子，這種事符合誰的需要，為什麼需要？帽子跟這有什麼關係」(T.8, C.138)？敘事者察覺到自己就是西林口中那種虛偽，而且這輩子都不可能脫離虛偽的人，雖然馬上就逃離了西林夫妻，但這種對生活的恐懼一旦出現，就不會再消失了。敘事者和西林同樣將生活視為敵人，只是前者選擇直接面對，攫取生活的美好，

卻不願意負起責任，而西林恰好相反，他對生活感到恐懼，在生活中鮮少感受到快樂，卻選擇逃避，遁入生活之中。¹³⁶

契訶夫寫作當時正逢沙皇政府高壓統治，由上至下的壓抑使得人心惶惶，資本主義又在俄國發展，人民感受到金錢的剝削與誘惑，生活變得混亂又不可理解，異化後的社會更是失序，恐懼是最直接的反應。契訶夫作品中常有觸及恐懼的議題，而恐懼的起因通常有兩種，一是將人逼入絕境的對社會、權威的恐懼，另一種則是對日常生活的恐懼，人們無法理解生活，認為生活可怕至極，〈套中人〉的別里科夫屬於前者，〈恐懼——我朋友的故事〉的兩個男主角則是屬於後者。

貳、庸俗

人是群體動物，在異化的生活中無法感受到自己與外在世界的連結，孤獨的感覺萌發，爲了消滅這種孤獨感，人類會選擇向社會妥協，行爲舉止也會順從社會期望。然而社會已經被異化，人們所順從的其實是一個拜金、重名利的敵人，他們越努力想融入社會，就越容易被生活吞噬，最後陷入庸俗而不可自拔，〈文學教師〉（*Учитель словесности*, 1894）、〈姚

¹³⁶ 馬衛紅，《現代主義語境下的契訶夫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71-74。

尼奇）兩部作品幾乎通篇都可找到對庸俗的諷刺和描述，展現了人心的異化。

〈文學教師〉的情節圍繞著文學教師尼基丁（Никитин）發展，他墜入愛河、進入婚姻，最後被生活異化，困在庸俗的生活，興起了逃脫的念頭。謝列斯托夫（Шелестов）的二女兒——本篇的女主角瑪麗雅·戈德芙魯阿（Мария Годфруа），大家都稱呼她瑪紐霞（Манюся），在小說前半部的形象聰明、可愛，跟父親一樣對馬匹有很深的了解，文學教師尼基丁（Никитин）被她的諸多優點迷住了。愛上瑪紐霞以後，謝列斯托夫家除了寵物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令他心嚮往之，「自從尼基丁愛上瑪紐霞以後，謝列斯托夫家的東西樣樣都中他的意：房子、房子旁邊的花園、晚茶、籐椅、老奶媽，甚至老人常愛說的那兩個字：『粗鄙』」（T.8, C.313）。愛情遮住了尼基丁的眼，使他無法看清自己，更遑論瑪紐霞和謝列斯托夫一家。尼基丁和瑪紐霞頑固迂腐的姊姊瓦麗雅（Варя）更是常有意見不合之處。表面看來尼基丁學識豐富，但當信用社經理謝巴爾津（Шебалдин）和尼基丁攀談時，才發現原來身為文學教師的尼基丁連萊辛（Лессинг）的〈漢堡劇評〉（Гамбургск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也沒讀過，尼基丁隱約覺得心虛：「這真叫人難為情。我是文學教師，可是直到今天我還沒讀過萊辛的書。我得讀一讀他的著作才成」（T.8, C.316）。對於自己做為教師，卻名不副實的情況，尼基丁在內心有所警戒，連和瑪紐霞在夢中相會，都可以看到他的心虛，「隨後她挽著尼基丁的胳膊，跟他一塊兒走進市郊的公園。在那兒他看

見橡樹和像帽子的烏鴉窠。有一個窠搖晃起來，謝巴爾津從裡面探出頭來，大喝一聲：『您沒看過萊辛的書』（T.8, C.319）！萊辛的書是一個尼基丁可以脫離庸俗的暗示，在小說的進行中都可以看見尼基丁對於是否要讀這本書的心態的改變，在他和瑪紐霞求婚的當天，「他很快脫掉衣服，很快上床，為的是趕快開始想自己的幸福，想瑪紐霞，想將來，微微地笑著，忽然想起自己還沒讀過萊辛的著作。『我得讀一讀他的著作才成……其實，我何必讀它呢？讓它見鬼去吧』」（T.8, C.323）！追求知識的渴望迅速的被現實取代，尼基丁選擇了眼前平庸的快樂，而結婚後，尼基丁也確實感受到幻想中的幸福。

尼基丁他在工作虛與委蛇，把日子重心放在瑪紐霞和他們的小日子上，在不知不覺中墮入了庸俗的陷阱中，「他一刻也不停地觀察他聰明、能幹的瑪尼雅怎樣佈置她的小窩。他也想表示自己在家裡不是多餘的人，就做些白費力氣的事情，比方說，從車棚裡推出雙輪馬車來，繞著它走一圈，看一遍」（T.8, C.327）。尼基丁享受著樸實愉快的生活，直到某次賭博輸了十二盧布，才開始檢視一切，「他猛地想到他之所以不心疼那十二盧布，是因為那筆錢是他白白得來的。如果他是工人，那他就會明白每一個戈比的價值，就不會不在乎輸贏。再來，他想，就是他的全部幸福也完全是白白得來的，他沒費什麼氣力，這幸福實際上對他來說是一種奢侈品，就跟藥物對健康的人來說是奢侈品一樣」（T.8, C.329）。尼基丁發現自己的不勞而獲，對自己現有的快樂生活產生了質疑：「要是他跟絕大多數的人那樣老是

為一塊麵包操心，為生存奮鬥，要是他工作累得胸口和背脊疼痛，那麼晚飯啦，溫暖舒適的住所啦，家庭幸福啦，才會成為他生活中的必需品、獎賞，使生活變得美好、豐富多采；照眼前這樣，那麼，一切在他卻只有一種古怪的、不明確的意義」(T.8, C.329)。尼基丁體會到了生活的異化，過去曾有過的幸福現在看來卻滿是限制，他心裡興起了要突破困境的念頭，「尼基丁忽然生出熱烈迫切的願望，一心想到那個世界走，在一個工廠或者什麼大工場裡做工，或去發表演說，去寫文章，去出版書籍，去奔走呼號，去勞累，去受苦。他需要一樣東西來抓住他的全身心，使得他忘記自己，不關心個人幸福，這種幸福的感覺是那樣地單調無味」(T.8, C.330)。

當尼基丁意識到自己和生活格格不入後，開始正視自己，他知道「他完全算不得教師，不過是個官僚罷了，跟那個教希臘語的捷克人一樣庸碌無能。他從來沒有當教師的志向，一點也不懂兒童教育，對它也從不發生興趣。他不知道該怎樣對待孩子才好，他不明白他所教的課的意義，也許簡直沒教對」(T.8, C.331)。尼基丁意志軟弱，有時他彷彿願意為了真正的生活挺身而出，有時他卻又庸庸碌碌地放縱自己。在和自己一連串激烈的思辯後，尼基丁終於發現自己從未真正生活過。異化的生活中於使得尼基丁無處可逃，只能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想法，「在這沒抹水泥的兩層樓小房子裡，對他來說想要幸福已經不可能了。他領悟到幻想已經破滅，一種新的、不安定的、自覺的生活正在開始，這跟平靜的心境和個人的幸福卻不能並存」(T.8, C.331, 332)。人一旦意識到自己處在異化的生活當中，想要欺瞞

自己，繼續一無所知的生活已經不可能了。尼基丁觀察周遭的生活，卻只看見平庸和無趣，他在日記本寫下自己急欲逃離的願望：「『我的上帝，我在什麼地方啊？我讓庸俗團團圍住了。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罐罐的酸奶油、一壺壺的牛奶、蟑螂、蠢女人。再也沒有比庸俗更可怕、更使人感到屈辱、更叫人愁悶的了。我得從這兒逃掉，我今天就得逃，要不然我就要發瘋了』」（T.8, C.332）！尼基丁的心態已經不可能再回復到過去那種平靜無波的狀態了，但他是否真能夠逃脫異化的掌控就不得而知了。

〈姚尼奇〉的故事鋪陳和〈文學教師〉有相似之處，同樣以正面的形象開頭，最後在庸俗中結尾。德米特利·斯塔爾采夫·姚尼奇是 C 城地方自治局新派任的醫生。C 城的生活沉悶單調，當地人最引以為傲的就是屠爾金（Туркин）一家。主人伊凡·彼得洛維奇（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肥胖、漂亮，風趣幽默，常舉辦業餘演出為慈善事業募集基金，本人偶爾出演；但他的幽默不是天生，而是苦練的成果：「他說的話與眾不同，這種語言是他長期練習說俏皮話形成的，而且顯然成了他的習慣」（T.10, C.28）。妻子薇拉·姚西佛芙娜（Вера Иосифовна）喜歡寫作，會將自己的作品朗誦給賓客聽，可惜作品平庸無趣，盡是寫些社會上不會發生的事，毫無價值，但在初來乍到的斯塔爾采夫耳中卻很是愉悅：「儘管她讀的內容在生活中從來不曾有過，但聽起來還是很愉快，很舒服，讓人的腦子裡生出許許多多美好的恬淡的思想」（T.10, C.26）。女兒葉卡捷琳娜·伊凡諾夫娜（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年輕，會彈鋼琴，但毫無天賦，彈出來的音樂在斯塔爾采夫耳

中竟如同山崩落石：「葉卡捷琳娜·伊凡諾夫娜彈的是一段極難的曲子，又長又單調，唯一的妙趣就是難彈。斯塔爾采夫一邊聽著，一邊想像著，高山上亂石滾滾而下，滾滾而下，他盼望著這些石頭早點停住」(T.10, C.27)。屠爾金一家才能平庸至極，但在 C 城卻已經是最有名望的家庭，C 城的環境、風氣不言而喻，而斯塔爾采夫日漸庸俗也就有跡可循了。

斯塔爾采夫喜歡和他們來往。常和葉卡捷琳娜一起討論文學、藝術，他甚至能夠向她抱怨生活和人們，他著迷於她的美麗與機伶，而葉卡捷琳娜是城中少見會讀書的人這點，更讓斯塔爾采夫不可自拔。在狂熱的愛戀中，斯塔爾采夫沒有發現到葉卡捷琳娜對深刻的東西毫無見解，缺乏真正的素養，例如她讀書，但無法從書中體會到深層的道理，當他問她讀了什麼書的時候，她這樣回答：「〈一千個農奴〉，可是這個皮謝姆斯基的名字多麼可笑，叫什麼阿列克謝·費奧費拉克特奇¹³⁷」(T.10, C.30)！她喜歡音樂，卻偏偏一點才能也沒有，在刻意展現自己的情況下，更顯得她的愚昧。斯塔爾采夫對葉卡捷琳娜的感情始終得不到回應，求婚被狠狠地拒絕，理由冠冕堂皇，卻無法掩飾夢想下的無知和平庸：「我愛藝術，勝過生活裡的一切。我愛音樂愛得發瘋，我崇拜音樂，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獻給它。我想當一名演唱家，我渴望名聲，成就和自由，而您卻要讓我繼續待在這個城市裡，繼續過這種空洞無意的生活，這種生活我受不了。做一個妻子，啊，

¹³⁷ 皮謝姆斯基 (Алексей Феофилактыч Писемский, 1821-1881)，俄國當代作家，《一千個農奴》為其代表作，描繪在貴族、官吏、地主橫行暴力下的農奴生活。

不行，原諒我！人應當追求一個崇高而輝煌的目標，而家庭生活只會永遠束縛我，德米特利·姚尼奇。（說到這裡她微微一笑，因為這個名字讓她想起了『阿列克謝·費奧菲拉克特奇』）」（T.10, C.34）。斯塔爾采夫的初戀哀傷地結束，之後也就鮮少主動拜訪的屠爾金家。

接下來的四年，斯塔爾采夫埋頭於工作，了無生趣地度過了，因為全城的人都是庸俗之輩：

「當地居民的言談，對生活的看法，連同他們的外表，都惹得他生氣。漸漸地經驗告訴他：你盡可以跟當地人打打牌，或者吃吃喝喝，這時候他們都心平氣和，寬厚善良，甚至相當聰明，但是只要話題一轉到吃喝以外的事，比如說談談政治或者科學，那他們就目瞪口呆，或者提出空洞、愚蠢、惡毒的議論，叫人聽了只好揮揮手走開」。（T.10, C.35）

無法和其他人交流，斯塔爾采夫爲了避免言談無意中又激怒眾人，越來越沉默，而這樣的行爲也讓當地人對他的隔閡日漸增長，他們開始批評他傲慢無禮。表面上看起來斯塔爾采夫成功地保護自己的靈魂，免受當地人們的庸俗侵擾，但實際上斯塔爾采夫爲了逃離生活，已經丟失了過去的水準，逐漸染上惡習，「還有一樣消遣，他是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地迷上的：每到晚上，從一個個口袋裡掏出行醫得來的錢，這些黃黃綠綠的票子有的帶香水味，有的帶醋味，有的帶熏香味，有的帶魚油味。這些票子胡亂塞在各個口袋裡，有時約摸有七十個盧布。等到積攢到幾百，他就送到信貸合作社存活期」（T.10, C.36）。他熱衷的事情已和文學、藝術或是其他深刻的

事情無關，只是將注意力放在文特和金錢，他心中瞧不起城裡不學無術、胸無點墨的人，但自己也慢慢被生活異化，成為當中的庸人之一。

斯塔爾采夫和葉卡捷琳娜再相見時，過去誠摯的情感重上心頭，但感情和金錢相比，隨即被拋諸腦後，斯塔爾采夫的行爲已經被異化，看不見人性的蹤跡。而他也更深刻的意識到屠爾金一家全是空有其名的草包：「他一下子憶起了那一切場景——薇拉·姚西佛芙娜的小說啦，葉卡捷琳娜熱鬧的琴聲啦，伊凡·彼得羅維奇的俏皮話啦、巴瓦的悲劇姿勢啦，他心想，全城頂有才能的人尚且那麼淺薄無聊，那麼這個城市又會怎麼樣呢」（T.10, C.39）？斯塔爾采夫只看見屠爾金家的低下，卻沒有發現自己也已經成為庸俗的人，更甚者，爲了賺錢，他連良善的本性都丟失了。

斯塔爾采夫醉心於工作，努力賺錢，甚至到了貪得無厭的地步，什麼都不願意放手，對金錢的渴望讓他開始目中無人、行爲粗俗，「每當他在信貸合作社聽說某處有房出售時，他就毫不客氣地闖進去，走遍每個房間，完全不管那些沒穿好衣服的婦女和孩子正驚恐地瞧著他」（T.10, C.40）……斯塔爾采夫滿懷希望的來到這個城鎮，在平凡的人們之中想努力維持自己的風骨，但隨著愛情失敗，信念也隨之瓦解，金錢的誘惑超越了所有，最後完全被異化，沉浸在生活瑣事當中，成為一個庸俗、低級的人。契訶夫研究學者卡塔耶夫（Катаев В.Б., Чехов）指出斯塔爾采夫的周遭環境滲透

了他的生活、想法、逐步扼殺了他的靈魂，時間滴水穿石般緩慢地改變了斯塔爾采夫，而他不知不覺地被異化，無力抵抗。¹³⁸

契訶夫在這兩篇作品中建立的世界，主角面對生活的異化時，毫無抵抗之力，因為整個外在世界的基礎就是庸俗、虛偽。尼基丁從戀愛開始，慢慢的步入異化的生活中，起初感到平靜甜蜜，後來卻漸漸發現生活與自己格格不入，最後意識到庸俗將他包圍，興起了逃脫的念頭；斯塔爾采夫進入了被異化的城鎮，置身於庸俗的環境之中，戀愛失利後被金錢掌控，在庸俗中隨波逐流，失去了眾人的尊敬，變成一個徹底的庸人。〈文學教師〉和〈姚尼奇〉兩者在不知不覺中都受到來自外界社會的影響，墮入平凡、無趣，缺乏思想的生活，是異化後庸俗的證明。

參、對死亡的嚮往

資本主義和官僚制度異化後，人的活動成和人自身相互疏遠，人變成附屬在某種社會規範底下的商品，生活除了努力生產賺錢、服從制度規定等追求社會認同的行為之外，缺乏對人性的基本尊重，個人特質完全不受重視，甚至還有被抹煞的疑慮。¹³⁹他人恣意凌辱、外在世界的壓迫、生活的封閉無趣等負面的感受將人類靈魂逼入死胡同，而外在世界的壓迫和生

¹³⁸ Ктаев В.Б. *Сложность простоты: Рассказы и пьесы Чехова*. М.: Изд-во Московск. Ун-та, 1998, с.21.

¹³⁹ 謝勝義，同註 138，頁 112-115。

活的封閉無趣更讓他們無處可逃，在世界上生活對他們來說只有無窮無盡的折磨，而唯一的出路只有死亡。

契訶夫本人對生活態度悲觀，卻對美好的未來保持著期望，因此作品中自殺的案例並不多見，然而作者在創作中往往賦予死亡美好的特質，彷彿那些將要死亡的人都可以在彼岸找到真正安身之所，因此他們在死亡前後總會流露出解脫的感覺。對照現世生活的苦悶，嚮往死亡成爲小說人物對生活本身不滿的被動表達，而契訶夫對角色死亡的處理展現一種莫可奈何的哀傷，點出了異化生活真正的出路並不存在於現世，〈主教〉(Архиерей, 1902)、〈洛希爾的提琴〉都呈現了這樣的氛圍。

〈主教〉開頭的場景已經藉由場景預言了彼得主教(преосвященный Петр)的死亡，由於身體不適，他在晚禱中身心都不甚痛快，而他彷彿在人群中看見自己的媽媽瑪麗雅·季莫費耶芙娜(Мария Тимофеевна)，心情才平靜下來，但眼淚卻掉了下來，不久晚禱的人們被傳染了，一起輕聲地啜泣，直到合唱團開始唱歌，才逐漸平息。晚禱結束後，彼得主教經過了墓園，深夜的墓園不但不恐怖，還散發出寧靜的感覺，「那些白色的牆、墳墓上的白色十字架、那些白色的樺樹、黑色的陰影，那個遙遠的、恰好掛在修道院上空的月亮，這時彷彿過著一種它們自己的、不被人類理解而又親近人類的特殊生活」(T.10, C.187)。身體不適、看見久未見面的親人的錯覺、民眾的啜泣聲、白色的牆、墳墓上的白色十字架都暗示了彼得主教

離死亡不遠，契訶夫藉由場景營造出莊重、寧靜的氣氛，毫無恐怖的感覺。

彼得主教的生活忙碌而苦悶，他每天去探望犯風濕病的教區主教，同時代替教區主教接見那些請求幫助的人，他生病後才發現每天面對這些人的要求到底是多麼的無聊瑣碎，幾乎壓得他喘不過氣。而俄國的生活，又與他曾長期待過的歐洲大相逕庭，種種的反差讓他每天都處於緊繃之中，「他覺得老百姓粗鄙，那些請託事情的女人乏味而愚蠢，那些宗教學校的學生和他們的教師缺乏教養，有時候很野蠻。收進和發出的公文不下幾萬件，然而那都是些什麼樣的公文呀！全教區的監督司祭給老老少少的神父們，以至他們的妻子兒女，打五分和四分的品行分數，有時候也打三分，關於這些事他必須說話，批閱和草擬嚴肅的公文。簡直連一分鐘的空間也沒有，整天戰戰兢兢，只有到了教堂裡，彼得主教才能定下心來」(T.10, C.194)。現實生活的工作大大地影響了彼得主教的心情，只有在教堂裡他才可再度找回心中寧靜、安樂之感，教堂之於彼得主教就是心中的一塊淨土。隨著健康惡化，彼得主教隱約感覺到自己似乎接近死亡了，生活的諸多苦悶困擾著他，因此在教堂禱告時他開始靜心凝想：「他的思想把他帶到遙遠的過去，帶到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去，那時候人們也這樣唱新郎，唱殿堂，現在，過去顯得那麼生動、美麗、歡愉，大概實際上從來也沒有這樣過吧。也許在另一個世界裡，在死後的生活裡，我們會帶著這樣的感情回想遙遠的過去，回想我們俗世的生活吧。誰知道呢」(T.10, C.195)！彼得主教意識到自己死期將盡時，他感到害怕，因為他還有著期望，「他心想，

凡是處在他的地位所能得到的東西如今他都得到了，他有信仰，然而並非一切都很清楚，他還缺點什麼，他不願意死。他仍然覺得好象缺少一種極重要的、他過去朦朧地想望過的東西，如今，這種對未來的希望還是使他激動，如同在小時候，在宗教學院裡，在國外一樣」(T.10, C.195)。對照現在的隔閡、恐懼，彼得主教想念母親過去誠摯的愛，也想念從前與人相交的無拘無束，在禮拜時腦中思緒百轉千迴，想到從他少年時起就看著受苦痛折磨的人來禮拜，直到現在仍是有許多人痛苦地生活，彷彿什麼都沒改變過，他想到了自己封閉的生活，胸中厭惡油然而生，「好像他寧可犧牲性命，只求別再看到這些寒倉的、廉價的百葉窗和低矮的天花板，別再聞到這種濃重的修道院氣味」(T.10, C.199)。彼得主教性格溫和謙虛，行爲卻大異其趣，總是在接見人民的時候沒來由地發脾氣，與人們的隔閡漸深，因此主教在現實生活中苦於沒有真心相交的對象，連母親也因為害怕而與他保持距離。

彼得主教他病重垂危之時，感受到過去的生活離他越來越遠，那些苦痛、折磨就要跑到他看不見的地方，不會再出現，也不可能再繼續讓他受苦了，死亡將近他內心卻開始暗自喜悅。臨終前，主教再度感受到母親對他的愛，她滿是憐惜地喚著他的小名，姪女卡嘉(Катя)憂傷地站在一旁，過去他心中所缺乏的就是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真心的交流，而這個遺憾也被彌補了，於是他面對死亡時，態度灑脫：

「他呢，已經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什麼也不明白了，只覺得自己好

像成了一個普通人，在田野上興高采烈而且很快地走著，手裡的拐杖敲打著地面，頭上是廣闊的天空，陽光普照，他現在自由了，像鳥一樣愛到哪兒去就可以到哪兒去了」！（T.10, C.200）

彼得主教面對死亡時的反應在文中有著鮮明的對比，第一階段因為心中有未竟之夢，對死亡感到害怕；第二階段內心對現況感到氣惱，希望藉由死亡逃離壓抑的生活；第三階段隱約感覺到死亡可以幫助他真正地從苦痛中解放，安然面對；第四階段則是在死前再度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真情流露，最後喜樂安詳地死去。契訶夫後期作品中，人們起初對未知的死亡感到害怕，直到理解了死亡是從現實苦難生活的解脫，帶來的往往是愉快、安詳，如同彼得主教一般，就能安然接受，〈洛希爾的提琴〉中的棺材匠夫妻也是這樣的例子。

棺材匠亞科夫（Яков）做棺材的手藝好，在這個比鄉村還小的城鎮內頗有口碑，同時又會拉提琴，能靠表演賺取收入，他卻爲了每個莫名其妙的損失鎮日心緒不佳，「比方說，星期日和節日幹活是有罪的，而星期一又是不吉利的日子，這樣一年當中總有兩百天光景不得不閑坐著，無所事事。這損失不小！如果這個小城裡有人舉行婚禮而不要奏樂，或者沙赫凱斯沒有請他，那也是損失」(T.8, C.298)。對於金錢的執著也讓他的同理心消失，甚至希望同村的警官快點昇天，好讓他能夠得到一筆豐厚的交易「警官害癆病，病了兩年，亞科夫盼望他快點死，可是警官動身到省城去就醫，誰知道他就死在那兒了。這又是損失，至少也有十個盧布，因為那口棺材一

定很貴，而且蓋上錦緞」(T.8, C.298)。亞科夫的苦惱說明他在意每一毛錢的損失，沒有賺到錢對來說就是嚴重的虧損，內心始終爲了那幾個無緣的盧布耿耿於懷。

亞科夫總是煩惱生活中的損失，甚至每天記錄，進而在損失中又看見另一筆損失，這讓他氣到幾乎喘不過氣。當亞科夫這樣的人的妻子下場可想而知，他發現自己從未善待瑪爾法（Марфа）時，她已經病危，而正是她臉上的神情讓亞科夫大吃一驚：「她的臉燒得緋紅，神情異常開朗和喜悅。『青銅』¹⁴⁰平素看慣她蒼白、膽怯、哀戚的臉，這時卻心慌了。看樣子，她好像真要死了，而且似乎在暗自高興，她終於要永遠離開這個小木房，離開這些棺材，離開亞科夫了。她望著天花板，努動嘴唇，臉上表情幸福，仿佛她看見了死亡，她的救星，正在跟它小聲交談似的」(T.8, C.299)。亞科夫每天對損失忿忿不平，妻子臨死前愉悅的表情才讓他意識到自己從未好好對待過妻子瑪爾法，總是對她破口大罵、動手動腳的威嚇，「他這一輩子似乎從沒跟她親熱過一次，從沒疼過她，也沒有任何一次想到要買塊頭巾送她，或者從人家喜宴上給她帶回一些甜點。他光是對她大吼大叫，為了損失罵她，捏著拳頭撲向她；雖然他從來沒有真正打過她，不過畢竟嚇唬過她，每一次她都嚇到呆住」(T.8, C.299)。瑪爾法是亞科夫的異化生活最直接的受害者，她膽小溫柔，總是對亞科夫逆來順受，每天善盡自己的職責，但亞科夫卻從未給她好臉色過。

¹⁴⁰ 亞科夫在村中的綽號。

妻子嚮往死亡的模樣震懾住亞科夫，「他又想起他這一輩子沒有對瑪爾法親熱、疼愛過。他們在小木房裡同住了五十二年，這五十二年很長很長，可是不知怎麼的，事情竟會如此下場：在這段時間裡，他一次也沒想過她，關心過她，好像她是一隻貓或者一條狗似的」(T.8, C.301)。和亞科夫五十年的婚姻生活對瑪爾法來說只是無盡的折磨，她每天總有做不完的事，而亞科夫每天也總有損失，在這段婚姻生活中，瑪爾法感受到的只是生活的壓力和亞科夫無止盡的憤恨，連看完病回到家都不敢躺下，就怕亞科夫又開始將損失算到她頭上。瑪爾法死前唯一的回憶就是五十年前他們曾經有過個女兒，三個一起坐在柳樹下唱歌，那個金髮女娃曾經在滿是苦難的生活中給予她希望，但女兒早夭，亞科夫甚至不記得她，接下來的五十年瑪爾法獨自面對冷漠的丈夫和殘酷的生活。

亞科夫的靈魂早就被異化，在妻子將死之際，他也只忙著定做棺材、計算成本，最後一次跟瑪爾法道別時，他還碰了碰棺材，為自己的手藝感到驕傲。瑪爾法死前的歡愉，來自於知道總是奴役、嚇唬她的丈夫再也不能指使她，或將她當成出氣包，而生活同樣再也不能奴役她、使她感受到任何痛苦了，人人畏懼的死亡成為瑪爾法逃離異化生活的出口，於是她心甘情願、甚至滿懷喜悅地迎接死亡。喪禮結束後，亞科夫才真正意識到瑪爾法的離開，他突然感到難受，過去歷歷在目，他想起了那棵柳樹、他們的金髮女娃娃，想著生活和生活中不可避面的各種損失，想到未來的損失

只會越來越多，情況益發不可挽救。亞科夫看過醫生後知道自己離死亡不遠了，內心頓悟：

「死了倒好，不必再吃東西，喝水，納稅，得罪人了；而且由於人在墳墓裡不是睡一年，而是睡好幾百年，一千年，那麼，要是細算一下，好處就大極了。人從生活裡得到的是損失，從死亡裡得到的反而是好處」。(T.8, C.304)

亞科夫不畏懼死亡，唯一割捨不下的就是那把小提琴，他想著白白浪費、充滿損失的一生，拉起了悲切的歌曲。亞科夫在死前將小提琴送給了他過去無緣無故怨恨的猶太人洛希爾，這個型為代表亞科夫靈魂徹底的覺悟，他終於理解過去的生活多麼愚蠢、糊塗，唯有死亡能救贖他，讓他再也不必面對生活的各種損失，而他對生活哀傷的印象就由洛希爾悲切的琴聲傳了下去。

〈主教〉展現了祛魅後異化在俄國的橫行，彼得貴為主教，信仰在生命的最後關頭卻無法撫慰他，更遑論其他尋求彼得幫助的人們了。在這樣的狀況下，人們無法找回自己的定位、生活的意義和盡享天年之感；〈洛希爾的提琴〉則說明了生活中的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深受異化困擾，亞科夫總是在意自己的損失，生活沒有一天快樂，而瑪爾法天天忍耐著亞科夫的怒氣，從未得到安寧。這些角色在生活中除了疏離、苦悶、害怕以外，毫無其他樂趣，死亡也就成了唯一的出口。

第二節 人際關係的疏離

馬克思認為生產與交換是人類社會的根本，理想的和諧社會中，每個人都將勞動視為生活的必要條件，為了使自己與他人過更好的生活而自願提供勞動，並與他人共同分享成果。這兩種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活動推著社會前進，但是隨著社會發展，私有財產和貨幣逐步取代人的地位主導交換和生產，異化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只關注自己本身和利益，人際關係日益疏離、冷漠，與理想的和諧社會理念背道而馳。¹⁴¹

馬克思將異化現象歸咎於經濟生活，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社會異化的唯一原因。由於資本主義涉及生產、交易的社會關係，發展過程中產生剝削、奴役和不公義等現象，異化了社會，隨之引發拜金風氣，人們變得貪婪、無恥，眼中只有金錢，喪失了道德倫理。韋伯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大同小異，但對韋伯而言，資本主義只是祛魅後的必然發展，是異化現象的原因之一，不是唯一。韋伯將異化現象的重點擺在官僚政治，認為祛魅後的生活，人們追求全面的理性化，社會生活變得機械性、破碎，最後人類因為過度理性化失去靈魂、僵化，¹⁴²而這樣的異化結果在契訶夫後期作品經常出現。

¹⁴¹ 郎咸平、楊瑞輝，《郎咸平帶你重讀經典資本論與國富論》，台北：高寶國際，2013，頁 96-99。

¹⁴² 洪謙德，《從韋伯看馬克思》，台北：揚智文化，1998，頁 49、50、105。

契訶夫創作的特點之一就是人們彼此疏離，他們只專注在自己的感覺、興趣、原則、生活規矩，而當他們需要別人的反應、理解時，別人也只專注在自己的身上，無暇顧及他人，¹⁴³官僚制度的壓抑、對金錢的追求、在困境中求生等都是造成人際關係疏離的原因，筆者將探討人際關係中僵化、冷漠和仇恨三種表象，分析異化在人際關係中的特徵。

壹、僵化

韋伯指出：祛魅破壞了人們原本對生活的想像，崇高的價值、理想、情感都被視為非理性的因素，被排除在外，生活被拉到只剩世俗層面，從工具理性出發的思考模式發光發熱，對生活的碎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已經碎裂的生活裡，社會規範、法律條文等明確的指令控制著人們的思考、將人類區分成各種不同的等級，而社會期待更是將所有透過工具理性得出的期望強加在人們身上，人際關係變得表面，人們被侷限在停滯不動的僵局之中動彈不得。久而久之，外在社會異化了人們心中的情感，人們無法彼此真心相待，連最簡單的往來都變得僵硬、死板。〈帶閣樓的房子〉（*Дом с мезонином: Рассказ художника*）、〈主教〉都展現了異化後的僵化的生活。

¹⁴³ Ктаев В.Б. *Сложность простоты: Рассказы и пьесы Чехова*. М.: Изд-во Московс. Ун-та, 1998, с.20.

〈帶閣樓的房子〉以畫家和當地望族沃爾恰尼諾夫（Волчанинов）一家的來往帶出當時僵化的生活。沃爾恰尼諾夫家主人過世前在莫斯科聲名顯赫，為後代累積了許多財富。沃爾恰尼諾夫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在莊園定居，從未離開村莊一步。沃爾恰尼諾夫家的大女兒莉季雅（Лидия）和畫家的一次見面就給了他深刻的印象，「她為遭受火災的鄉民募捐而來，隨身帶著認捐的單子。她眼睛沒有看著我們，嚴肅而詳盡地對我們講起西亞諾沃村燒了多少家房子，有多少男女和兒童無家可歸，以及救災委員會初步打算採取什麼步驟——她現在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她讓我們認捐簽字，收起單子後立即告辭」（T.9, C.195）。她受過教育，在地方自治局開辦的學校當教師，行事嚴謹，作風強悍，積極參與地方事務，「白天莉達總是給病人看病，分發書籍，常常不帶帽子，打著傘到村裡去，傍晚大聲談論地方自治局，談論學校」（T.9, C.178）。莉季雅對村莊農民的關心完全出自本身的貴族立場，並不理解真正殘酷的現實，這些冷硬的制式化作為看在畫家眼中只是惺惺作態，他認為莉季雅沒有醫學常識就替農民治病是欺騙，而當她手上握有許多財產時，善舉自然輕而易舉。莉季雅對畫家同樣抱持敵意，她總是冷嘲熱諷地指責畫家對現實生活冷漠，只顧埋頭於對社會毫無助益的風景畫。

兩人思想上的矛盾，最後演變成實際的言語衝突，畫家在氣憤之中指出了莉季雅的行爲根本只是助紂為虐：「照我看來，醫務所啦、學校啦、讀

書室啦、藥房啦，在現有的條件下是專為奴役服務的。人民已經被一條巨大的鎖鏈栓住，而您不是砍斷這條鎖鏈，反而添上些新的環節，這就是我的看法」(T.9, C.184)。莉季雅是貴族，從小到大沒有吃過任何苦頭，雖然懷有改善社會的夢想，但向來以貴族的身分過活，思想僵化，被侷限在自己的生活框架之中，不曾從不同的視角看待農民的苦難，當然也就從未意識到自己本身就是農民的剝削者。她身為教師，雖然總是堅持使用自己的薪水，但實際上仍是不著痕跡地奪取農民工作的成果，是農民異化生活的幫兇，畫家看準了這點大肆抨擊，評論一針見血地點出當時俄國農民的困境：

「饑餓、寒冷、牲畜般的恐懼，繁重的勞動，像雪崩那樣壓下來，把他們通往精神活動的條條道路全部堵死。而精神活動才是人和牲畜的區別所在，才是唯一使人值得生活下去的東西。您用醫院和學校去幫助他們，可是您用這些東西並沒有解除他們的桎梏，反而加深了他們的奴役狀態，因為您給他們的生活裡帶來新的迷信，給他們增添了需求項目，更不用說他們為了買斑蝥膏藥和書本就得付錢給地方自治會，因而就得更加彎著腰幹活了」。(T.9, C.184)

畫家的這番話與馬克思對異化的批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馬克思認為人置身於勞動之中，獲得相對應的成果，將自己的意識自由地反映在社會之中才是真正的生活，而這樣的勞動必須建立在有相對應資產的前提下，也就是說，當勞動者缺乏屬於自己的財產時，勞動成果只會不停地進

入他人的口袋，造成進一步的奴役和剝削。¹⁴⁴

在畫家看來，人們短視近利，幾乎將全部精力運用在滿足短暫的需要上，就連科學和藝術也都只致力於眼前的目標，社會陷入了一種盲目、功利的風潮當中，對於真理、真正的幸福的探求卻遠遠被拋諸腦後：「科學家、作家、畫家都緊張地工作，由於他們的努力，生活的舒適一天天增長，肉體方面的需求不斷增加，可是真裡卻還遠得很，人像以前一樣仍舊是最殘暴卑劣的野獸。整個局勢趨向於人類大多數在退化，永遠喪失一切生命力」。(T.9, C.186, 187) 畫家內心懷抱著崇高的理想，清楚看見社會面臨的困難，但他不願與社會同流合污，也不想屈服於殘暴卑劣的人們，只能在生活中逃避工作，消極以對，既不能脫離窘境，也無法在社會中找到真正的立足之地，這樣的形象儼然是個多餘人。

莉季雅和畫家是異化生活下兩個不同的受害典型。莉季雅受困於框架之中，被已經異化的社會權利與身份階級控制，做事考量總是從自身立場出發，缺乏對人的感情，無法與人真正的交流，雖然激進地參與社會事物，卻無法參透問題的本質，只能在現實生活中打轉，從事徒勞無功的活動。畫家則是顧影自憐的知識份子，清楚看見生活的矛盾，對未來懷抱著某種理想，在現實困境中卻無能為力，無法有所作為，只能消極地逃避工作，

¹⁴⁴ 周澤之、羅保國、劉國紅、項鏢、何靜合著，《社會歷史之謎的科學解答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講》，上海：三聯書店，2007，頁 20-22、155-156。

不與人們同流合污。兩人展現了不同的樣貌，卻同樣在異化的生活中感到力不從心。

僵化的階級限制了社會的發展，固有的制度也阻礙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分化成高低有別，甚至對立的群體，連親人間的感情都可能因此出現距離，無法親近，〈主教〉就是個例子。

彼得主教和媽媽的情感是〈主教〉的主要情節之一，彼得主教知道多年不見的母親來訪時感到愉悅，他利用睡前祈禱的時間回憶過去的生活，想到母親深刻的愛：「他在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身體不好的時候，他的母親總是那麼溫柔，那麼體貼啊！此刻，他的禱告同他的回憶混在一起了，他的回憶像火焰似的越燒越旺，而他的禱告並不妨礙他想到他的母親」(T.10, C.188)。對母親的回憶激起了彼得主教對過去的懷念，鄰村的宗教活動，歡樂的氣氛，和當時單純的快樂，「他（那時候，他叫帕夫魯沙）不戴帽子，光著腳，跟著聖像走來走去，懷著純樸的信仰，現出純樸的笑容，無限幸福」(T.10, C.189)。從人們稱呼彼得主教為帕夫魯沙就能推斷當時彼得主教與人們的往來毫無隔閡，能夠輕鬆自在地一起參與宗教活動，從中得到安心的力量。彼得主教現在雖然貴為主教，卻找不回當時的愉悅心情，和母親的相處彷彿也在他成為主教後變調。

彼得主教和媽媽久別重逢，母子情深一如過往，但兩人當中卻因為身

分出現了某種難以言喻的阻隔，在宗教中的階級成爲兩人間真心相待的阻礙，誠摯的親情被禮制遮掩，「她感到拘束，仿佛不知道該稱呼他「你」還是「您」，該不該笑，仿佛感覺到自己與其說是他的母親，不如說是一個助祭的妻子」(T.10, C.190)。母親以下對上的禮節和彼得主教談話，這讓他滿腔熱情突然熄了火，母親那樣恭敬、膽怯的態度讓他感到愁苦，只能從她細碎的行爲當中判斷出她和彼得主教的關係：「只有憑她那對異常善良的眼睛、她走出房間的時候匆匆看他一眼的那種膽怯而憂慮的目光，才能猜出來她是他的母親」(T.10, C.198)。想到這樣不正常的母子關係，彼得主教頓時感覺人生無味，病痛加劇。彼得主教和媽媽重逢後感受不到真情，只看見自己與母親的連結淡去，彷彿他和這個世界即將失去所有連繫一般更顯憔悴，「由於流血，主教不出一個鐘頭就變得很瘦，很蒼白，很憔悴了，他臉上起了皺紋，眼睛大了，仿佛他蒼老了，身材矮小了，他自己也覺得他比所有的人還瘦、弱，也更無足輕重，認為以往發生過的事都退到很遠很遠的一個地方去，再也不會重現，再也不會延續下去了」(T.10, C.200)。母親誠摯的情感在彼得主教臨終前才突破他們的階級差異，此時母親已不再只是以助教的姿態面對彼得主教，而是以媽媽的身分，表達對彼得主教的關愛，「她一看見他長了皺紋的臉、那雙大眼睛，就大吃一驚，在他的床前跪下來，開始吻他的臉、肩膀和雙手。不知什麼緣故，她也覺得他比所有的人還瘦弱，還更無足輕重。她已經不記得他是個主教，卻像吻一個十分貼心、親密的孩子那樣親他了」(T.10, C.200)。彼得主教在臨終前才感受到母親真正的情感，滿心喜樂地離開人世。

〈主教〉和〈帶閣樓的房子〉展現了不同的階級異化，前者描繪了宗教中的階級差異對人際關係的影響，而後者展現了地主和農民兩個階級的矛盾。在〈主教〉中，人的身分階級框架超出應有範圍，影響彼得主教和母親的正常生活，母子感情不敵制式的階級，人際關係變成死板的交際，是階級異化後情感僵化的後果；而〈帶閣樓的房子〉寫作時代雖然距離解放農奴已超過三十年，但種種的跡象都顯示出農奴制的遺毒仍緊緊纏繞著俄國的農民階級，莊園的地主們以上對下的態度對待農民，想要改善農民的生活卻受限於死板、僵硬的思考，讓農民的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貳、 冷漠

異化現象在契訶夫作品中角色身上的呈現就是種種冷漠的行爲，卡塔耶夫指出：「契訶夫作品中的人們熱衷於自己的問題、道理或錯誤的認知，導致人們沒有能力，也不可能理解他人」（Катаев, 2004: 283）。¹⁴⁵這樣自私的心態讓人們已經不能從單純的角度面對其他人，各種惡毒的行爲也就由此而生，〈脖子上的安娜〉、〈農民〉（*Мужики*, 1897）都展現了人際關係的冷漠，夫妻之間情份淡薄，骨肉親情也不值一提，更遑論惻隱之心了。

¹⁴⁵ Катаев В.Б. *Чехов плюс: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преемники*. М.: Языки культуры, 2004, с.283.

〈脖子上的安娜〉故事始於安娜與莫杰斯特·阿列克謝伊奇（Модест Алексеевич）的婚禮，婚禮儀式與活動展現了莫杰斯特沉悶守舊的個性，他們兩個沒有舞會、晚宴，也沒有音樂、舞蹈，風塵僕僕地到了兩百俄哩外的聖地參拜，據人們所說，莫杰斯特希望這場聖地旅行能讓年輕的安娜理解就連在婚姻中，他的首位也是宗教和道德。安娜爲了解決家中經濟困境，嫁給中年官吏莫杰斯特已經是萬不得已，加上不愉快的婚禮，安娜只是悶悶不樂地擔心著貧窮的家人，「今天她父親和弟弟來給他送行，她從他們的臉容看得出來，他們身邊一個小錢都沒有。今天他們有晚飯吃嗎？明天呢？不知什麼緣故，她覺著眼下她不在家，父親和那兩個男孩坐在家裡正在挨餓，就跟母親下葬後第一天傍晚那樣感到淒涼」（T.9, C.162, 163）。安娜心裡掛念著死去的母親、酗酒的父親、困頓的家、可憐的兩個弟弟，想到現實生活帶給她太多的煩惱，逼得她不得不嫁給莫杰斯特，只感受到痛苦和憂鬱。

安娜婚後的生活確實充滿苦悶，她對莫杰斯特莫名的恐懼讓她常常連飯都吃不下，丈夫給了安娜極大的精神壓力，「她怕丈夫，見著他就戰戰兢兢。她覺得她的靈魂裡彷彿早就存在對這個人的畏懼似的。以前她小時候總是覺得中學校長是頂威嚴可怕的一種力量，好比烏雲似的壓下來，或者像火車頭似的開過來，要把她壓死似的。……最後來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謝伊奇這個循規蹈矩的人，他連相貌也長得像校長。在阿尼雅的想像中，所有這些力量合成一股力量，如同一隻可怕的大白熊，威逼著她父親那樣的

弱者和罪人」(T.9, C.166)。丈夫雖然財產豐厚，但一毛不拔，出於恐懼，安娜始終不敢開口要錢，手頭反而比婚前更緊，她暗自怨恨丈夫，覺得自己被他的家財萬貫騙進了這場婚姻。婚後安娜和親人間也出現隔閡，過去的親密被尷尬取代，即使父親和弟弟多麼愛她，卻和過去再不同了，「她父親和弟弟帶著一種特別的神情瞧她，彷彿剛才她進門以前，她們正在指謫她不該為錢嫁給一個她並不愛的枯燥無味的男子似的。她窸窣作響的衣服、她的鐲子、她周身上下那種太太氣派，使他們覺得拘束，侮辱了他們。他們在她面前有點窘，不知道該跟她談什麼才好，不過他們還是像從前那樣愛她，吃飯的時候她不在，還會覺得不習慣」(T.9, C.165)。這樣的互動是日後親情冷卻的開端，安娜成為文官的妻子後身分和過去大不相同了，即使她關懷父親和弟弟的心一點不變，父親和弟弟卻有所顧忌，親人間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相依為命了。

莫杰斯特對妻子冷漠，對岳父一家的困境也視若無睹，他寧願將錢花在安娜的飾品，也不願意對岳父一家伸出援手，面對金錢的熱切和對待岳父的冷漠相對照，更顯得異化現象的恐怖。一回，岳父為了還債壯起膽子，向莫杰斯特借錢，反而被他臉色不善地羞辱了一頓，面對安娜的弟弟他也總是不假辭色，「男孩們總是穿著破靴子和破褲子來看望阿尼雅，他們也得聽取他的教訓。他不給他們錢。可是，他給阿尼雅買戒指、鐲子、胸針，說是這些東西到了急難的日子自有用處。他常常打開她鎖著的五屜櫃，查看一下那些東西還在不在」(T.9, C.167)。莫杰斯特的種種行為都顯示出他

對身邊的人，包含妻子、岳父和兩個小舅子的冷漠無情，

兩人地位的高低在一場舞會後起了變化，莫杰斯特察覺到妻子的美貌可以替他在職場鋪路，而安娜也發現自己在社交圈的魅力。關係變化的過程中，莫杰斯特對安娜高高在上的姿態消失，面對上級虛偽、庸俗的嘴臉展現在安娜面前，「現在他站在她面前，也現出巴結的、諂笑的、奴才般的低聲下氣神情了，這樣的神情在他遇見權貴和名人時她常在他臉上看到」（T.9, C.172）。而安娜的大放異彩為自己打了一記強心針，生活的恐懼再也不困擾她，而過去隱藏在膽怯、懦弱背後愛慕虛榮的個性也逐步浮出，安娜脫胎換骨般變成了一個膚淺、驕傲、苛薄的女人，「她這才明白，她生下來是專為過這種熱鬧、燦爛、有音樂和舞蹈、獲得許多崇拜者的歡笑生活的。她許久以來對於那種威逼著她、彷彿要把她活活壓死的力量的恐懼，此刻在她看來顯得可笑了，現在她誰也不怕，只是惋惜母親已經去世，要是母親如今在場，一定會為她的成功跟她一塊兒高興的」（T.9, C.171）。

接下來的日子，安娜和莫杰斯特的地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她再也不尊敬丈夫，態度輕蔑、言語刻薄地稱他為蠢貨。安娜沉浸在忙碌的生活，每天總有交際應酬，而到了要用錢的時候，她什麼也不表示，只是差人送帳單去給丈夫。莫杰斯特不以變樣的婚姻關係為恥，因為妻子的交際讓他得到二等安娜勳章。安娜的生活自在，每天顧著出遊享樂，從前日日被她掛在心上的父親與弟弟也早就不在她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她越來越少

去找家裡的人，現在他們吃飯沒有她來作伴了。父親酒癮比以前更大，錢卻沒有，小風琴早已賣掉抵了債。現在男孩們不放他一個人上街去，總是跟著他，怕他跌倒」(T.9, C.173)。家裡每況愈下，而安娜卻不放在心上，對他們不聞不問，父親在街上看見安娜駕著豪華馬車出遊時，總是想打招呼，卻總是被兒子勸阻了。安娜從一開始被壓迫的可憐角色，最後成為無情無義的冷酷之人，異化的腳步有跡可循。

安娜的婚姻、生活都讓她覺得恐懼，害怕自己總有一天會被現實壓死，發現自己的魅力之後，彷彿抓到了救命的浮木，態度驟然改變。上流社會的種種歡樂與享受，讓她體驗到前所未有的美好，忘記了自己還有父親和弟弟在生活的邊緣苦苦掙扎。安娜從剛出嫁時心心念念家中老小的善良女子，被異化後變成沉溺於上流社會、忘卻家人的交際花，態度轉變劇烈，丈夫莫杰斯特是幫兇之一。莫杰斯特視財如命、一毛不拔，對身邊的人冷漠相待，在婚姻中從未注意過安娜的情感或實質的需求，年長安娜好幾十歲卻從未教導安娜正確的道德觀念，為了高升甚至可以出賣老婆，婚姻、親情在金錢和名聲之前脆弱的不堪一擊。

通過〈脖子上的安娜〉，可以看見一個正常、善良的女人被異化成冷漠的怪物的過程，莫杰斯特與安娜的婚姻開始於安娜的經濟需求，終結在莫杰斯特的升遷希望，兩人的婚姻中充斥著彼此利用的成份，夫妻間毫無情感可言，而安娜對於親人的情感也在異化的生活中淡去，眼中只有自己，

再也看不見親人的痛苦。〈農民〉則進一步展現了生活如何吞噬人心，通篇具有濃厚的異化色彩，社會權利的異化讓地主、官員這些少數人奴役了大部分的農民，他們剝削、搶奪農民的工作成果，卻又蔑視農民，毫不尊重，這樣冷酷的態度壓迫了在農村生活的人們，迫使他們只能在邊緣處掙扎求生。

〈農民〉故事場景茹科沃村（Жуково）的自然風景極佳，去過的人都會被迷住，但村子本身落後、殘破不堪，到處都嗅得到貧窮、苦悶與不幸，「若是沒有貧窮，沒有可怕的、無盡頭的、哪兒也躲不掉的貧窮，大概這世間的生活也會像這早晨一樣美麗吧！可是只消回頭看一眼村子，就會清晰地記起昨天發生的一切，於是由周圍的景色喚起的那份讓人陶醉的幸福感，立即便消失了」（T.9, C.287）。村民貧窮、粗野、目不識丁，總嚷著缺錢，一有錢卻馬上到小酒館喝個爛醉，沒錢時也會把衣服鞋子拿去換酒，整個村子散發著墮落的氣息，還欠了地方自治局一大筆稅款沒還。整體而言，村子充斥著破敗、貧窮、酗酒、疾病等等不幸的景象。不知道故鄉狀況的尼古拉·奇基利傑耶夫（Николай Чикильдеев）在莫斯科受傷，爲了節省開銷，他決定帶著妻子奧爾迦（Ольга）和女兒薩夏（Саша）回老家養病，但環境的破敗超乎他們的想像：「爐子大得幾乎占去半間屋，讓煤煙和蒼蠅弄得黑糊糊的。有多少蒼蠅啊！爐子歪了，四壁的原木傾斜了，看上去小木屋隨時都會塌下來。在前面牆角放聖像的地方，旁邊貼滿了瓶子上的商標和剪下來的報紙——這些權當畫片。窮啊，窮啊」（T.9, C.281）！

在這樣的房屋內生活可想而知，尼古拉在鄉下的一家人口眾多，父母、兄弟基里亞克（Кирияка）和傑尼斯（Денис）、他們的妻子分別是瑪麗亞（Марья）和菲奧克拉（Фекла），基里亞克有六個孩子，傑尼斯有兩個，一家共十四口就擠在小小的房子中，「尼古拉走進木房，看到一大家子的人，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身子在高架床上、在搖籃裡、在所有的屋角果蠕動，看到老人和女人們怎樣把黑麵包泡在水裡，狼吞虎嚥地吃下去，這當兒他想到，他，一個有病的人，沒有錢，還拖著一家人，回到老家來是錯了，錯了」（T.9, C.284）！茶水裡有魚腥味、糖被咬了一口、蟑螂四處流竄，席間話題也脫離不了病痛、貧困等讓人煩惱的問題，生活帶給這個家庭的彷彿只有無盡的折磨。而當中最不幸的地方則是親人間彼此怨懟的情況，這個家庭彷彿地獄一般，沒有人從中得到任何快樂過，尼古拉的父母總是成天吵架，母親抱怨父親，「她從早到晚生氣，嘮叨，動不動就提著嗓門叫罵，弄得街上的行人不由自主地停下來。她對她的老頭子很不和善，不是叫他懶骨頭，就是叫他討厭鬼」（T.9, C.289, 290）。父親生性疏懶，「是個不太正經的、靠不住的莊稼人，若不是她經常催促著他，恐怕他真的什麼事都不做，整天坐在爐臺上說閒話了」（T.9, C.290），對生活有著無盡的埋怨，「他沒完沒了地對兒子講起他的某些仇人，抱怨他每天都受鄰居的欺負」（T.9, C.290）。而基里亞克喝醉酒後總是要找瑪麗亞的麻煩，發洩心中的怨氣；傑尼斯在外當兵不住家裡，但妻子菲奧克拉也對他十分不滿，瑪麗亞和菲奧克拉都厭惡自己的丈夫，「瑪麗亞怕基里亞克，每當他留下來，跟她在一起的時候，她就嚇得渾身發抖。只要她一靠近他，他身上的那股

濃重的酒氣和煙味總薰得她頭痛。菲奧克拉呢，每當有人問她，丈夫不在會不會煩悶，她總是氣惱地回答：『去他的』」（T.9, C.286）！

尼古拉一家三口回到老家，帶給這個家庭帶來很大的負擔，長年沒有見面，一回來就在家裡吃閒飯，這個努力在夾縫中努力求生存的家庭沒有餘力再容納他，「當一個家庭裡有人久病不愈，失去生還的希望，常常會出現極其沉重的時刻，這時他身邊的所有親人會膽怯地、暗暗地、在內心深處希望他死去」（T.9, C.293）。當人們必須面對生存與否的困境時，所有情感都是奢求，窮途潦倒的農民爲了生存，已經變成野獸，盈繞在他們腦海裡的只是最原始的生存的欲望，在這種殘酷的生活沒有人在乎親情、愛心或是願意對尼古拉付出任何的憐憫，連一向疼惜尼古拉的老奶奶也毫不在乎尼古拉的死活。但農民並非出生就如同野獸般只關注自己的存亡，尚未體驗到生活苦難的孩子們散發著人性的光輝，「只有孩子們害怕親人的死亡，一想到這個就會膽戰心驚。此刻，小女孩們都屏住呼吸，臉上一副悲哀的表情，望著尼古拉，想到他很快就要死掉，她們不由得想哭，想對他說幾句親切、同情的話」（T.9, C.293）。處在生活絕境中，生存的欲望遠遠大過任何感情，受到生活異化的農民變得粗野、殘暴，生存欲望直接又殘酷地斬斷了人們之間的感情連結，人跟人之間原本最單純的親情早就在潦倒的現實生活中異化，親人之間非但不親近，還斤斤計較，感情被利益糾葛取而代之，人們早已麻木，冷漠無所遁形。

尼古拉一家的故事展現農村生活最醜惡的一面，農民粗魯、骯髒、酗酒、總是互相爭執與算計，一點都不和睦，他們處在鄉村社會的底層，飽受異化的困擾，在生活當中只感受到來自各方的壓迫，官員、地主、管家這些有錢有勢的人完全不尊重農民，不但不會幫助他們，甚至還掠奪他們工作的成果，是造成異化現象更加嚴重的幫兇：

「確實，同他們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可是他們畢竟是人，他們跟常人一樣也會痛苦、哭泣，而且在他們的生活裡沒有哪件事是不能找到使人諒解的緣由的。沉重的勞動使他們到了夜裡就渾身酸痛，嚴寒的冬天，糧食歉收，住房擁擠，可是沒有人幫助他們，哪兒也等不到幫助。那些有錢有勢的人是不可能幫助他們的，因為他們自己就粗魯，不誠實，酗酒，罵起人來照樣難聽得很。那些小官和地主管家對待農民如同對待流浪漢一樣，他們甚至對村長和教堂主持都用「你」相稱，自以為有權這樣做。至於那些貪財的、吝嗇的、放蕩的、懶惰的人，他們到農村裡來只是為了欺壓、掠奪、嚇唬農民，哪裡還談得上幫助農民或者樹立良好的榜樣呢」？（T.9, C.311, 312）

隨著資本主義發展，俄國農村也不可避免地走上資本化一途，〈農民〉甫完成時，即引起諸多爭議，許多人批評契訶夫醜化農民形象、詆毀農村生活，殊不知正是契訶夫這些近乎殘酷的描寫，才真正揭發了俄國農村面臨的問題。¹⁴⁶俄國農村城市化的過程中，異化已然入侵，地主累積資本，官員掌控權利，農民成爲這些人們的奴隸，只要停止勞動，就失去了存在

¹⁴⁶ Жить по правде (по повести А. Чехова «Мужики»). (<http://goo.gl/0w77Jn>)

的價值，使農民費盡體力的工作成爲他人的收穫，在這些勞動中農民無法體會生活的快樂，也無法感受到身爲人的價值，¹⁴⁷依舊在社會底層無法翻身，農村生活正在改變，但自由與正義卻更加遙遠。

綜合以上兩篇小說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們在異化中生活，時時感到壓抑、不快，總是只專注於自己在意的東西，對他人的痛苦視若無睹，自然也無法對他們付出關愛，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無情莫此爲甚。〈脖子上的安娜〉的女主角安娜在世俗生活中迷失，只關心自己一朝一夕的享樂，忘了父親和弟弟還在家裡挨餓受苦；安娜道貌岸然的丈夫莫杰斯特同樣受到世俗異化，他人格低落，眼中所見只是金錢、名聲和職位。在〈農民〉中，丈夫對妻子拳打腳踢、長輩對晚輩頤指氣使，互動缺乏關愛彼此之心，甚至看見親人的病痛毫無感情，暗自希望他快點死去，貧困的生活抹滅了他們的人性，人生當中只剩下存活這項最原始的欲望。

參、憎恨

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疏離的主因就是：「人際關係退化成金錢得失的計較，人們也被切割成互相爭鬥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郎咸平、楊瑞輝著，2013：74)。¹⁴⁸在利益關係中，人們將彼此視爲競爭者，計較、

¹⁴⁷ 林進平，《馬克思的「正義」解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9，頁106-109。

¹⁴⁸ 同註177，頁74。

輕蔑等行爲不勝枚舉，良善的情感減少，仇恨取而代之。人們在下意識中將他人視爲自己生命、財產、工作的掠奪者，總有提防之心，加上專注於自己的生活，不願意理解他人，莫名的敵視層出不窮。〈洛希爾的提琴〉中的亞科夫死前頓悟：

「為什麼人們總是妨礙彼此的生活呢？要知道，這造成多大的損失！多麼可怕的損失呀！要是沒有憎恨和惡意，人們彼此之間就會得到很大的好處了」。(T.8, C.304)

明白指出了當時人們相處的困境：彼此莫名的仇恨，〈新別墅〉(*Новая Дача*, 1899)、〈在峽谷〉兩篇都展現了人際關係中憎恨的特徵，前者著重階級異化，農民在與知識份子毫無衝突的情況下，莫名地憎恨他們，使得工程師一家不得不離開；後者強調金錢異化，二媳婦阿克西尼亞爲了爭奪家產，心生怨恨，最後燙死姪兒，驅逐嫂子、公公，造成慘劇。

〈新別墅〉的故事背景在鄉村，工程師庫切羅夫(*Кучеров*) 在距離村莊三俄哩處興建一座大橋，妻子伊蓮娜·伊凡諾夫娜(*Елена Ивановна*) 受到鄉村美景的吸引，說服庫切羅夫買下土地、興建莊園。工程師家道殷實，房子精緻漂亮，自然地吸引了眾人目光。除了華麗的新別墅之外，庫切羅夫一家還養了兩匹雪白的駿馬，車夫帶著馬去鐵匠家換馬蹄鐵時，透露出莊園主人的富裕，而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卻激起當地農民的情緒，有的艷羨、有的嫉妒。農民柯佐夫(*Козов*) 是當中最不滿的農民，但與其說是他對工程師一家不滿，不如說是他將對生活的種種怨恨轉嫁到工程師一

家，新別墅、駿馬、車伕樣樣都惹他討厭。柯佐夫靠著兒子奉養，生活苦悶無趣，成天遊手好閒，面對他人時總是不懷好意，「他一天到晚總是在河岸上或者村子裡閒散地溜達，如果，比方說，看見農民運木頭或者釣魚，他就說：『這是枯樹上的木頭，朽了』，或者說：『在這種天氣，魚是不會上鉤的』。遇上天旱，他就說：『不到嚴寒，不會下雨』，等到天下雨了，他又說：『現在莊稼都要在地裡爛掉，全完了』。他一邊說，一邊老是眨眼，仿佛知道什麼天機似的」(T.10, C.116, 117)。主導柯佐夫的行爲就是異化後的社會關係，人和人的相處成爲物和物的利益糾葛，有人得利就暗示著別人的好處被剝奪，因此他對每個人的所作所爲總是冷眼旁觀，期待著他人蒙受損失。

庫切羅夫對當地農民生活的貧困一無所知，自然也就不明白自己的舉動已經讓觸犯了農民，工程師的財富與他們苦難的生活相對照之下，更顯得刺眼，在不知不覺中農民們內心對工程師一家的羨慕之情都被莫名的仇視取代，以柯佐夫爲首的農民們逮到機會就要找庫切羅夫一家的麻煩。庫切羅夫忍受著農民粗魯的行爲，卻沒有得到同等的回應，因此他找上了農民：「難道正派人該這樣辦事嗎？一個星期以前你們有人砍掉我樹林裡的兩棵小橡樹。你們把通到葉烈斯涅沃村去的道路掘壞了，現在我只好繞三俄哩的彎路。你們為什麼處處跟我作對呢？看在上帝面上，你們說說看，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你們的事呢」(T.10, C.119)？庫切羅夫面對農民的怨懟，處處退讓，農民卻得寸進尺，讓他忍無可忍只好找上農民，但這番談話到

了農民心裡卻又變成地主藉機壓榨，要求他們賠償。異化過後的社會關係讓農民只擔心自己利益被剝奪，而沒有注意到他們的憎恨其實毫無理由。伊蓮娜擺低姿態與他們對話，說明自己的處境，農民看似理解，實際上仍把他們當成外來的侵略者，充滿疑慮。

農民的牲口踏壞庫切羅夫的菜園、他們拆毀庫竊羅夫養蜂場的籬笆、放任自己的老婆孩子一早就闖入庫切羅夫的莊園把菇類採得乾乾淨淨、庫切羅夫的新車輪被換成舊的、榔頭和鉗子被取走亂丟，種種仇視的行爲讓庫切羅夫也失去耐心，對待村民的態度也改變，「工程師顯然變得愛生氣，小題大作，把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都看成盜竊或者侵佔行爲。他的大門甚至白天也上鎖，夜裡有兩個看守在花園裡巡行，敲著鐵板，他再也不雇用奧勃魯恰諾沃村的人做短工了」(T.10, C.125)。庫切羅夫和妻子原本對農村生活充滿希望，他們喜歡農村、河岸和綠地美景，期待和農民一起發展新的生活，致力於造橋、鋪路等農村發展，他們的努力卻在農民莫名的仇恨中化爲烏有。農民仇視他們，處處找碴，使得庫切羅夫的態度也受到了影響，原本良善的兩方就在莫名的隔閡中產生仇恨，「村子裡的人都善良，安分，通情達理，敬畏上帝，伊蓮娜·伊凡諾夫娜也安分、溫和、善良，誰看見她都會覺得惹人憐愛，然而為什麼他們處不來，分手的時候像仇人似的？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霧遮住了他們的眼睛，使他們看不見最重要的事情，而只看見踏壞的草地、榔頭、鉗子以及現在回想起來顯得那麼微不足道的種種小事」(T.10, C.127)？農民認爲工程師一家是花言巧語的騙子、

入侵者，而工程師一家則被農民的粗魯、惡毒給逼退。在農村中，利益關係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過人與人的情感交流，無論工程師和妻子對農民釋放出多少善意，在農民眼中也都只是偽善的謊言，出發點都是為了剝削他們，獲得更多利益，這樣無法可解的隔閡最終逼退了工程師一家。接手新別墅的是一個架子極高的低級文官，他面對農民時總是高高在上、理都不理，農民對與人為善的工程師夫妻惡言相向，卻偏偏與輕蔑他們的小文官相處融洽，極為諷刺。

契訶夫曾深入農村協助發展，在處境艱難的農村中他看見的是農民天性的良善，也在與友人的書信中展現對農民的好感：「在這裡的人民多麼好啊！這些農民，是核心、是根本，是好人中的好人，此外，他們還很聰明」。¹⁴⁹然而，被異化的生活成爲迷霧遮掩了農民的天性，他們總是開始害怕他人奪取自己的所有，卻同時無視自己對他人的侵犯，以求更多的利益。人的地位越來越渺小，而當人們總是從物與物的出發點考量時，人際關係就只能不斷地惡性循環，到了最後只剩下怨懟和仇視，〈在峽谷〉中阿克西尼雅所展現的憎恨也是由此而來。

阿克西尼雅從幫助家族事業開始就展現了她的精明能幹，而這也是她得到公公崔布金賞識的主因，不論是商店或是農務，她都很有一套，「對誰

¹⁴⁹ Чехов А. П. Письмо Суворину А. С.

(<http://chehov.niv.ru/chehov/letters/1890-1892/letter-1091.htm>) (2014.01.13)

可以賒帳，對誰不可以賒帳，她心裡清清楚楚。她保管鑰匙，甚至信不過她的丈夫。她拿過算盤來，打出一片劈啪聲。她像農民那樣檢查馬的牙齒，她老是發笑或者喊叫」(T.10, C.145)。除了崔布金一家，村裡人人都知道阿克西尼雅的美貌與幹練，就算邊和客戶爭論，該做的事情也不會漏掉，「阿克西尼雅在店裡做買賣，這時候院子裡就可以聽到酒瓶和錢幣的叮噹聲和男性的喊叫聲，被她得罪的顧客氣憤的說話聲；同時還可以看得出，白酒已經在那邊，在店裡偷偷地出售了」(T.10, C.147)。阿克西尼雅總是勤勞地做事，連在休息時間也同樣毫不鬆懈，擔心著農民要占崔布金家便宜，對他們充滿疑慮，「她剛睡半個鐘頭，就跳起來，這兒走走，那兒走走，看農民們放火燒了東西，或是有沒有偷東西」(T.10, C.161)。除了家庭本身的事業之外，阿克西尼雅也善用自己的美貌與其他村民結交，在他們的幫助之下，造磚廠已然成型，逐步成為阿克西尼雅的重心之一，「阿克西尼雅差不多天天坐著馬車上那兒去。她親自趕車，每次遇見熟人，總是伸出脖子去，活像嫩黑麥中間的一條蛇，天真而謎樣地笑著」(T.10, C.166, 167)。

阿克西尼雅嫁進崔布金家以來，除了和某些男性過從甚密之外，一直為家庭事業盡心盡力，然而這些都只是阿克西尼雅完美的偽裝，而首先識破這點的是才剛嫁到崔布金家庭沒多久的麗帕，她直覺地對阿克西尼雅感到害怕：「我怕阿克西尼雅，伊里亞·瑪卡雷奇。她也沒做什麼，總是笑嘻嘻的，不過有時候她瞧一眼窗外，眼神卻那麼凶，射出綠光，就跟關在畜欄裡的羊眼睛一樣」(T.10, C.160)。藏在的假面具後的獸性在崔布金將她

一手打造的磚廠登記在孫子尼基弗爾名下後爆發，她先是毫不掩飾地對長輩們發洩不滿，「她就關上鋪子的正門和後門，把她所有的鑰匙收在一起，使勁往老頭子的腳邊一扔。『我再也不幫你們做事了！』她大聲嚷嚷，忽然放聲痛哭。『看來，我不是你們的兒媳婦，而是傭人！大家都笑我說：瞧，崔布金家找了個多好的女傭！我可不是你們雇用的！我既不是乞丐，也不是什麼下流貨，我有爹有娘』」(T.10, C.170)。阿克西尼雅認為自己這麼多的付出完全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充滿了怨氣：「你們既然把布喬基諾給了苦役犯的老婆，那現在乾脆把全部都給她，你們的東西我一樣也不要！去你們的！你們這兒的人是一幫土匪！我看多了，也看夠了！你們搶劫來來往往的行人，不論老少，你們一律搶劫，這群土匪！是誰沒有領執照就賣酒？還有假錢呢？你們的箱子裡裝滿了假錢，所以現在再也用不著我了！……我要讓你們丟盡臉！我要叫你們讓羞恥活活燒死！我要叫你們趴在我腳跟前求饒」(T.10, C.171)！崔布金的家庭事業、那間磚廠都是阿克西尼雅的努力勞動的成果，而從她身上剝奪掉這些成果對她來說是絕對不可忍受的。

阿克西尼雅情緒上的崩潰看起來似乎是反異化的行爲，但實際上這樣的反應卻恰好證實了異化後生活人役於物的現象。馬克思認為，真正的勞動是人們自覺的勞動，在那樣的勞動當中人們可以感受到快樂，但異化後，人們的勞動變成一種追逐利益的行爲，如果最後沒有取得一定的世俗成果，勞動過程就成了毫無意義的行動，¹⁵⁰阿克西尼雅在勞動過程中感覺壓

¹⁵⁰ 孫伯鏘、張一兵著，《走進馬克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頁 129-131。

抑、不自由，而磚廠在後來又被崔布金登記在孫子名下，辛勞卻又得不到成果最後逼得阿克西尼雅內心怨恨爆發，將仇恨對準了毫無還手之力的嬰兒尼基弗爾，這樣的仇恨讓阿克西尼雅完全失去了理智，活活燙死了尼基弗爾，接著將毫無抵抗之力的麗帕逐出家門，家中大權旁落在阿克西尼雅身上後，老人崔布金也被趕了出去。阿克西尼雅取得家產後，她又恢復成原本那個和善、笑容滿面的漂亮少婦，努力經營著事業，「每天早晨她都坐著馬車到自己的磚廠去，臉上掛著天真的笑容，漂亮又幸福。後來到了磚廠，在那兒發命令，人們都會感覺到她很有勢力。家裡也好，村裡也好，磚廠裡也好，人人都怕她」(T.10, C.178)。〈在峽谷〉展現了俄國農村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的改變，金錢取代道德統治了人類的靈魂，造成社會關係的異化，人與人的交流變成物與物的交易。人們在追求利益時苦心孤詣、面對利益衝突時充滿怨恨、對待家產的競爭者時手段兇殘，在這樣絕望的環境下，人們道德墮落，掠奪本質凌駕於所有美德，¹⁵¹都是被生活異化的表現。

〈新別墅〉和〈在峽谷〉兩篇作品背景都在深受異化困擾的鄉村，前者展現抽象的仇恨，農民與地主對彼此的成見與刻板印象，讓他們隔閡甚深，無法好好相處；後者則說明金錢物欲影響人心至深，物質利益、勞動成果的剝奪導致了人們間的仇恨。綜觀兩篇作品中展現的仇恨，起因都在於異化後的生活。資本主義發展以來異化的生活讓人們無法維持單純的人

¹⁵¹ Повесть А.Чехова «В овраге» – трагизм живых символов. (<http://goo.gl/qX7j7X>)

際關係，觸目所及都是利益的剝削、搶奪、佔有等金錢得失的計較，在異化的社會關係中，仇恨比其他情感來得強烈，成爲異化生活的象徵之一。



結論

十九世紀初，西方工業革命的影響傳至俄國，工、商業開始發展，始於經濟政策的妥協，政府承認市民、商人們擁有房產的私有權，並賦予他們在農村購地的權利，私人財產進一步受到國家保障，資本主義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發酵。商業發展促成了城市發展，也間接帶動農村轉型，而握有雄厚經濟實力的市民逐漸成為政府不可忽視的階級，使得政府不得不呼應其要求，放鬆各種形式的控制與奴役，¹⁵²市民階級的崛起間接催生了1861年的農奴解放。農奴制廢除後，俄國開始掙脫農奴制的束縛，正式踏入資本主義，與此同時，工商業對俄國社會的影響與日俱增。在俄國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異化現象的出現正好呼應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他指出：私有財產制的出現、資本主義的發展，兩者聯合造成異化的出現，金錢地位超越交易媒介，成為世俗成就的象徵，而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人們自然而然將財富放置於特殊的地位，並將財富視為人生的目標，行為思考逐漸被金錢控制，異化也就因此產生。在此時的異化現象中，最明顯的就是人們習慣將來往對象視為財富或商品的擁有者來看待，人和人之間的來往不再只是單純的交際，¹⁵³相互剝奪利益的可能性引起彼此的猜忌，疏離、冷漠，各式弊病隨著資本主義發展一同入侵俄國社會。

¹⁵² 米羅諾夫，同註 35，頁 402-404。

¹⁵³ Ken Morrison，同註 14，頁 119-121。

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發展，除了引起金錢異化的資本主義之外，其他擾亂和諧生活的因素也一一浮上檯面。宗教改革、啓蒙運動，以及工業革命將歐洲的「祛魅」活動推向高潮，理性化活動取代宗教過往的地位，成爲人們理解、認識世界的主要工具，只要人們有心，就能藉由科學、計算來掌握萬物的法則。然而，正是在這個理性崛起的時代，人類開始審慎評估一切得失、要求利益的最大化，逼得人類最細微、美好的價值不得不退出了社會生活，精神上的軟弱，讓世界顯得更加險惡而難以生存。¹⁵⁴「祛魅」活動進入俄國的時間點較西歐慢了五十年，但有了在西歐的發展經驗，一進入俄國便迅速蔓延，大大衝擊了向來由東正教義掌控的俄國生活。西歐思想傳入，加上農奴解放，人民意識到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可以隨心所欲地行動，他們緩慢但堅定地拋棄過去「錢並不是資本」這樣的傳統觀念，開始大膽追求個人利益，自私自利、錙銖必較的行爲增加，¹⁵⁵歷史學家、社會觀察家卡韋林（К. Д. Кавелин，1818-1885）就曾指出：「傳統世界觀的影響在減弱，我們到處都可以感受到一種新的、承認個人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世界觀的影響在增強」（卡韋林，1898：54），¹⁵⁶可以看出歷史的洪流撼動了過往純樸的俄國。

韋伯認爲：改變人類思考方式的「祛魅」活動是首部曲，爲異化拉開

¹⁵⁴ 馬克斯·韋伯著，王容芬譯，〈以學術爲業〉，《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演講 倫理之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頁 11、20-22、26、27。

¹⁵⁵ 米羅諾夫，同註 35，頁 340-345。

¹⁵⁶ Кавелин К. Д.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1898, с.169.

序幕，而其催生的官僚制度則是異化的元兇，這樣的論點可以從俄國社會的發展過程獲得證實，「祛魅」前，宗教與官僚制度一同統治著俄國，當底層人民被腐敗的官僚統治壓得喘不過氣時，東正教撫慰人心，它提倡的傳統價值，諸如：知足常樂、關懷友愛等信念替人們在不安、痛苦、困惑中尋得安身立命的一片淨土。「祛魅」過後，科學取代神祕的宗教力量，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新依據，同時卻也排擠了過去安定人心的因素，在充滿壓迫、威嚇的世界中，個人地位益發低落，官僚制度則日益壯大，最後成為腐蝕俄國社會的巨大毒瘤。韋伯認為：只要參與政治，就算身居微職，也有影響、支配眾人的力量，因此從事政治者除了必要的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以外，還需要有對抗虛榮心、權利欲的能力，唯有綜合以上素質，堅定自身信念，才有在制度中真正發揮的空間，也才能為社會做出具體的貢獻。¹⁵⁷但綜觀俄國官僚制度，無一不背離韋伯的信念，上層長官權力過度擴張，底層官員淪為工具，做決定時很難排除自上而下的壓力，個人想法在官僚制度的箝制之下逐漸窒息。

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面臨來自多方的危機，資本主義的壯大，使得奴役與剝削更為盛行；官僚制脫離理性統治的常軌，淪為上位者嚴密控制社會的工具，此時不僅是俄國社會轉型時期，更是各種價值觀相互衝擊的時刻。契訶夫的創作便在這個俄國社會百家爭鳴的時刻拉開序幕，他清楚

¹⁵⁷ 馬克斯·韋伯著，王容芬譯，〈以政治為業〉，《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演講 倫理之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頁 61-63。

地觀察到官職、金錢、權力等外在事物對人心的影響，造成人類被奴役，稱得上是最先察覺異化現象的作者之一。¹⁵⁸起初契訶夫使用各式筆名創作，當中最著名的就是「契洪特」(Чехонте)。契洪特取材於日常生活中隨時可能發生的特異的小插曲，描繪官員、農民、律師、學生、太太等一般百姓在日常生活的框架下發生的脫序行爲，此時作家尙未意識到寫作的責任，也未細想這些事件的起因，單純運用寫作天份，配合詼諧的筆法誠實描繪生活狀況。¹⁵⁹

契訶夫創作前期的作品展現了促使人心異化的「社會之惡」：經濟、身份和權力。處於經濟弱勢的人們，礙於生存不得不對金錢趨之若鶩，有的擁戴著「金錢至上」的理念，有的總是在金錢和尊嚴間拉鋸，不論其面對金錢的態度爲何，金錢都成爲一種高於人類，甚至能夠掌控人類的強大力量。農民、奴僕、平民知識份子和其他工匠等身分地位不受重視的人們，通常僅僅被視爲用來增加財富的工具，存在的價值取決於勞動產量，身份成爲枷鎖，緊緊捆綁著他們的靈魂，讓他們成爲被社會疏離的一群，在生活中感到無助、驚慌。在官僚系統底層的官員們，飽嚙權力弱勢的艱辛，身爲文官，卻在體制的壓迫下必須拋棄個人思想，甚至要拋下尊嚴才有升官的可能，官員成爲系統中僵化的螺絲，毫無靈魂地生活著。由於經濟、

¹⁵⁸ Тема страха и её раскрытие у Чехова, <http://chechov2006.narod.ru/Chechov12.html> (2013.12.23)

¹⁵⁹ Сухих И.Н.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Чехова*. СПб: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ПбГУ, 2007, с.92-94.

身份和權力三者中，任一方面的弱勢都會使得異化的影響更加鮮明，因此契訶夫創作前期將炮火對準「社會之惡」，指責社會逼得人們不得不卑躬屈膝，臣服於異化腳下。然而隨著對生活更仔細的觀察，契訶夫的眼光日益銳利，他發現「社會之惡」是異化現象的表面，而真正的異化其實早已深入人類靈魂，造成「人心異變」，而這才是當代俄國社會所面臨的最核心的問題。

1887年，是契訶夫大量寫作的最後一年，改變主因是契訶夫逐漸意識到身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此後作家開始使用本名「契訶夫」，進行一系列的深度創作，在創作後期，契訶夫關注的重點從生活中的荒謬笑料變為生活中的瑣事，創作主題更貼近生活，也更加平凡，¹⁶⁰但當中揭露的生活醜態卻益發鮮明。在致友人基謝列娃（Киселева）的書信中，契訶夫表達了自己的創作理念：「文學作品之所以叫作文學，就是因為它描繪了生活真正的狀況，它的任務就是展現最純粹的事實。……作家不是糕點師、美容師，也不是開心果，他是背負義務和良心、任重道遠的人，他必須對抗自己的潔癖，任由生活的髒污遮掩自己的想像力」（契訶夫，1887），¹⁶¹而作家本人終其一生都信守這樣的理念，總是忠於生活原樣，冷靜到近乎殘酷地描繪一般人民的生活困境，作品中可以看見俄國人民在異化影響下最真實的

¹⁶⁰ Сухих И.Н.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Чехова*. СПб: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ПбГУ, 2007, с.97-99.

¹⁶¹ 契訶夫書信，<http://chegov.niv.ru/chegov/letters/1887-1888/letter-218.htm>
(2014.04.24)

樣貌。契訶夫善於從現實生活去蕪存菁，總是能從細微的蛛絲馬跡中覓得人心異化的證據，藉由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生活揭露無所不在的「異化」現象。

契訶夫先透過內在反映點出異化現象對個人意識的影響——價值觀的扭曲與自我的喪失；再藉由外在表現映證異化現象對社交生活的衝擊——個人行為的異常和人際關係的疏離，內在反映與外在表現相輔相成，架構出了飽受異化困擾的當代俄國人民，也使得異化現象無所遁形。價值觀的扭曲表現在人民重視的事物的轉變，過去安定社會的傳統價值與美德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消失，在強勢的資本面前，人們不得不低頭，這導致了個人利益取向行為的崛起，而自私自利的心態表現於外在行為時，就是對他人的冷漠與憎惡。

異化的另一種內在反映——人類自我的喪失，則是源自於吞噬人心的官僚體系。盧卡奇認為：國家行政的官僚化就是已經是初步的異化，隨著官僚系統的發展，制度的力量異化到超越人們自身的意識，不論是身處制度中的官僚或是受到制度統治的人民，都無法對抗這種異化，因為官僚制度早就使得他們的思想僵化、情感破碎，唯一能對抗異化的自我意識也早被消弭於生活中，¹⁶²對韋伯來說，官僚制不僅是異化的起源，更是異化的主因，因為它壓抑自由思考的權力，將人民侷限在狹隘的框架之中，這種由

¹⁶² 謝勝義，同註 138，頁 130-132。

內而外的影響使得人類逐漸變得僵化、庸俗。在各式各樣的陰影之下，人類再也無法從生活找到平靜，面對生活的殘酷，恐懼成爲最主要的情緒，死亡也成爲唯一出口，源自於異化的壓力，大大影響人類的外在行爲，也使得俄國社會停滯不前。

在當代俄國社會專制、壓抑、苦悶的氛圍中，契訶夫穿透了人類的種種粗鄙、庸俗、迷失，看見了幕後掌控人類生活的神秘力量：

他覺得，仿佛魔鬼正在用一雙紅眼睛瞧著他似的，那魔鬼就是建立強者和弱者之間相互關係的未知力量，造成了這個現在無法糾正的大錯。強者一定要阻礙弱者生活，這是大自然的法則，可是這種話只有在報紙文章裡或者課本上才容易使人瞭解、被人接受；而在紛擾混亂的日常生活裡，在編織著人類關係的種種錯綜複雜的瑣事細節中，那條法則卻稱不上是法則，甚至成了邏輯上的荒謬，因為強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樣為了他們的相互關係而受苦，雙方都不由自主地臣服於某種來歷不明、位於生活之外、人類所不理解的支配力量。（〈出診記事〉，T.10, C.81, 82）

不論紅眼的魔鬼或未知的力量，都無疑地就是馬克思和韋伯論述中的異化現象，資本主義掌握著大量金錢，從中下階級開始，襲捲整個俄國社會，徹底改變人民的價值觀，而官僚制度居高臨下地統治著人們，由上而下的僵化人民思想，使得人民只能如同機械般過活。

契訶夫的作品不僅誠實的反映了社會現實，也明確的指出俄國面臨的困境，在資本主義和官僚制度兩方異化的箝制之下，生活成爲無意義的存在，沒有任何人能夠倖免於難，而生活的意義到底在何處呢？其實契訶夫本人已經透過作品〈醋栗〉表達立場：

幸福是沒有的，也不應當有。如果生活有意義和目標，那麼，這個意義和目標就斷然不是我們的幸福，而是比這更合理、更偉大的東西。
做好事吧！（T.10, C.64）

偉大的作品之所以能成爲經典，重點就在於著眼點的跨時代性，契訶夫過世後的這一個多世紀以來，不論科技、醫療、天文、地理等各類知識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出現了更多不同的聲音在世界上眾聲喧嘩。然而隨著時代演變，生活卻益發脫序，困境也變得更加無解，人們內心的驚慌、徬徨其實與契訶夫筆下的人物殊無二致，藉由梳理異化主題，筆者彷彿透過作家之眼重新認識世界，看見了過去視而不見的諸多盲點，契訶夫抨擊的社會亂象，可以作爲現代生活的借鏡，而契訶夫宣揚的人性之美或許也是當今世代最需要的一帖良藥。

參考書目

壹、契訶夫著作

契訶夫著，汝龍譯。《契訶夫小說全集》 第一卷~ 第十卷。上海：上海譯文，2008。

契訶夫著，汝龍譯。《契訶夫論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契訶夫著，刁紹華、姜長斌譯。《薩哈林旅行記》。哈爾濱：黑龍江出版社，1980。

Чехов, А. П. *А. П. Чех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Том I~XII*. М.: Наука, 1974.

Чехов, А. П..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Т. 3*. М.: Наука, 1976.

Чехов, А.П..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П.Чехова*. М.: Наследие, 2000.

Chekhov, A. P.. *The Personal Papers of Anton Chekhov: His Notebook Diary and Letters on Writing*. USA: Lightning Source Inc, 2002.

Chekhov, A. P.. *Letters of Anton Chekhov*. USA: Textstream, 2010.

Chekhov, A. P.. *Note-book of Anton Chekhov*. USA: Textstream, 2010.

Chekhov, A. P./ Brunello, Piero (EDT)/ Lencék, Lena (EDT). *How to Write Like Chekhov: Advice and Inspiration, Straight from His Own Letters and Work*. USA: Pub Group West, 2008.

貳、中文書籍

一、專書

- Fritz Ringer 著，馬樂樂譯。《韋伯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Ken Morrison 著，王佩妏、李旭騏、吳佳綺譯。《古典社會學巨擘－馬克思、涂爾幹、韋伯》。台北：韋伯文化國際，2012。
- Reinhard Bendix 著，劉北成等譯。《韋伯：思想與學說》。台北：桂冠出版社，1998。
- Rius。《馬克思》。台北：立緒文化，1996。
- 王兆徽編著。《俄國文學論集》。台北：四季出版社，1979。
- 布羅茨基主編，蔣路、孫瑋譯。《俄國文學史》(中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 白曉紅。《俄國斯拉夫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任子峰。《俄國小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 伊列里茲基著，譚善余、丁文安譯。《別林斯基的歷史觀點》。北京：三聯書店，1956。
- 朱元發。《韋伯思想概論》。台北：遠流出版社，1990。
- 米羅諾夫著，張廣翔等譯。《俄國社會史 個性、民主家庭、公民社會及法治國家的形成（帝俄時期：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山東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 別林斯基著，滿濤譯。《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上海：時代出版社，1952。
- 吳寧。《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爾哲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李明濱。《俄羅斯文化史》，台北：亞太圖書，2000。
- 李邁先。《俄國史》。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9。
- 杜勃羅留波夫著，辛未艾譯。《杜勃羅留波夫選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 汪民安編。《文化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 周澤之、羅保國、劉國紅、項鏗、何靜合著。《社會歷史之謎的科學解答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選講》。上海：三聯書店，2007。
- 林進平。《馬克思的「正義」解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9。
- 洪謙德。《從韋伯看馬克思：現代兩大思想家的對壘》。台北：揚智，1998。

- 郎咸平、楊瑞輝。《郎咸平帶你重讀經典資本論與國富論》。台北：高寶國際，2013。
- 韋伯著，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 孫中興。《馬克思[勞動異化]的異話》。台北：群學，2010。
- 孫伯鏐、張一兵。《走進馬克思》。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 孫伯鏐。《盧卡奇與馬克思》。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宮敬才。《盧卡奇的哲學思想》。臺北市：唐山，1983。
- 徐祖武主編。《契訶夫研究》。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87。
- 格奧爾吉耶娃著，焦東建、董茉莉譯。《俄羅斯文化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留里科夫著，韓凌譯。《車爾尼雪夫斯基》。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 馬克思·韋伯著，于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三聯書店，2008。
- 馬克思·韋伯著，王容芬譯。《馬克斯·韋伯的兩篇哲學演講 倫理之業》。北京：中央編譯社，2012。
- 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等譯。《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III）》。台北：遠流出版社，1996。
- 馬克思·韋伯著，黃丘隆譯。《馬克思·韋伯》。台北：結構出版群，1989。
- 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馬衛紅。《現代主義語境下的契訶夫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 曹靖華主編。《俄國文學史（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湯姆·洛克曼著，楊學功、徐素華譯。《馬克思主義之後的馬克思—卡爾·馬克思的哲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
- 童道明。《我愛這片天空 契訶夫評傳》。北京：中國文聯，2004。
- 馮景源。《馬克思異化理論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1987。
- 路雪瑩。《契訶夫與梅里霍沃莊園》。濟南市：山東友誼，2007。
- 瑪麗雅·巴甫洛芙娜·契訶娃著，史永利譯。《遙遠的過去：我的哥哥契訶夫》。中央編譯社，2011。

- 赫爾岑著，辛未艾譯。《赫爾岑論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
- 劉仲文。《盧卡奇》。台北：東大圖書，1990。
- 劉昌元。《盧卡奇及其文哲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
- 劉皇杏。《契訶夫作品的悖論詩學》。台北：冠唐國際圖書，2011。
- 歐茵西。《俄羅斯文學風貌》。台北：書林出版社，2007。
- 盧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歷史與階級意識：關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 盧卡奇著，白錫堃、張西平、李秋零等譯。《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下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 盧連章。《程顥程頤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謝勝義。《盧卡奇》。台北：東大圖書，2000。
- 韓水法。《韋伯》。台北：東大出版社，1998。
- 顧忠華。《韋伯學說當代新詮》。台北：開學文化，2013。
- 張西平。《歷史哲學的重建——盧卡奇與當代西方社會思潮》。北京：三聯書店，1997。

二、 期刊論文

- 支丹。〈淺析契訶夫小說中的人物媚俗心理〉。《學理論》。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2012，第29期，頁196-197。
- 王澤應。〈祛魅的意義與危機〉。《湖南社會科學》。2009，第4期，頁1-8。
- 安春華。〈從〈套中人〉看契訶夫的創作意識〉。《中州大學學報》。第26卷第三期，2009，頁62-65。
- 吳曉雷。〈柔弱的靈魂——對契訶夫短篇小說〈窩囊〉的會話與功能分析〉。《文教資料》。2011，第16期，頁20-22。
- 肖娜。〈契訶夫小說不同時期的幽默與諷刺藝術〉。《肇慶學院學報》。2009，第30卷第3期，頁34-37。
- 胡月霞。〈從卡謬的薛西弗斯神話——看現代人的幸福與荒謬〉。《通俗

- 文學與雅正文學第七屆論文集》。2008，頁 2-5。
- 胡世君。〈身分政治〉。《文化研究@嶺南》。2009，第 12 期，頁 1-4。
- 孫兆恒。〈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與環境〉，《雁北師範學院學報》。2006 年，第 22 卷第 1 期，頁 72-74。
- 徐孟宜。〈契訶夫作品中的治療者形象〉。《俄語學報》。第 18 期，2011，頁 55-74。
- 郭新峰。〈論托爾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惡」思想〉。《柳州師專學報》。2010，第 25 卷第 1 期，頁 79-82。
- 彭甄。〈價值缺席：“女性行動”旨向的設定——契訶夫短篇小說《跳來跳去的女人主題分析》〉。《俄羅斯文藝》。2010 年，第 1 期，頁 28-32。
- 賀來。〈哲學如何回應「祛魅」的世界——理解當代哲學的重要視角〉。《天津社會科學學報》。2012，第 5 期，頁 89。
- 鄒定嘉。〈契訶夫「聖誕節慶故事」的諧擬手法分析〉。《俄語學報》。第 17 期，2010，頁 149-172。
- 劉心華。〈從契訶夫筆下的空間探討 19 世紀末的俄國女性議題〉。《俄語學報》。第 17 期，2010，頁 129-148。
- 劉文飛。〈別林斯基與果戈里的書信論戰〉。《外國文學評論》。2006，第一期，頁 14-16。
- 劉皇杏。〈契訶夫短篇小說中作者觀點之表現模式〉。《俄語學報》。第 8 期，2004，頁 35-38。

三、學位論文

- 張緒真。〈論契訶夫在社會、心理、精神層面下的瘋狂主題〉。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 黃怡瑛。〈論契訶夫與布寧作品中的莊園形象〉。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 李卓璋。〈「接受美學」觀照下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以《罪與罰》與《卡拉瑪佐夫兄弟》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參、 英文書籍

- Gorky M., Kuprin A.I., Bunin, I. A., Koteliansky S. S. (tr.), Woolf L. (tr.).
Reminiscences of Anton Chekhov. New York: B. W. Huebsch, 1921.
- Heady, 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 Dekker, 1991.
- Loehlin, James 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Chekho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2010.
- Malcolm, Janet. *Reading Chekhov: A Critical Journey*. USA: Random House Inc, 2002.
- Nobokov, V. *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1.
- Roland, L. Johnson. *Anton Chekhov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s*.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Canada, 1993.
- Sekirin, Peter (EDT)/ Twigg, Alan (FRW). *Memories of Chekhov: Accounts of the Writer from His Family, Friends and Contemporaries*. USA: McFarland & Co Inc Pub, 2011.
- Speirs, Logan. *Tolstoy and Chekho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Tabachnikova, Olga (EDT)/ Ure, Adam (TRN). *Anton Chekhov Through the Eyes of Russian Thinkers: Vasilii Rozanov, Dmitrii Merezhkovskii and Lev Shestov*. USA: Anthem Pr, 2010.

肆、 俄文書籍

Paul, Debreczeny. *Палата № 6-причта или патологическое*

-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Munchen: Verlag Otto Sagner, 1997.
- Авдеев, Ю. *В Чеховском Мелихове.* М.: Мелихово, 2004.
- Аношкина, В. Н. Громова Л. Д., Катаев В. Б.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70-90е годы.* М.: МГУ, 2001.
-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омах Т.12.*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26.
- Белинский, В.Г.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Т.3.*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8.
- Гречнев, В. *О прозе XIX-XX вв.: Л.Толстой, А.Чехов, И.Бунин, Л.Андреев, М.Горький, Ф.Тючев, Г.Иванов, А.Твардовский.* СПб: Соларт, 2009. (縮排不正確)
- Громов М.П. *Чехов.* М.: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93.
- Евсеев, Д. М. *Чеховская Москва.* М.: Гелиос АРВ, 2009.
- Кавелин, К. Д.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1898.
- Катаев, В. Б.(Ред. Кол.). *Чех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 М.: Макс Пресс, 2006.
- Катаев, В.Б.(ред.) *Чехов и Германия.* М.: МГУ, 1996.
- Катаев, В.Б. *Чехов плюс: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преемники.* М.: Языки культуры, 2004. (縮排不正確)
- Катаев, В.Б. *Сложность простоты Рассказы и пьесы Чехова.* М.: Изд-во Московск. Ун-та, 1998.
- Лотман, Ю.М. *Беседы о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 СПб, 1994.
- Муратова, К. Д.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нца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83.
- Соколов, А.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М.: МГУ, 1960. СПбГУ, 2007.
- Сухих, И.Н. *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Чехова.* СПб: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СПбГУ, 2007.
- Флеровский, Н. *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России.* М., 1938.

伍、 網路資料

金濤。〈契訶夫筆下的庫頁島〉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1/11/251519.shtml>)

(2013.06.02) 。

姜曉潔。〈論契訶夫小說的荒誕性〉, (<http://goo.gl/AH8vf>) (2013.07.28) 。

孫兆恆。〈契訶夫筆下的“套中人”與環境〉, (<http://goo.gl/k0pW2>)

(2013.10.23) 。

張大春。〈關於一點點的契訶夫〉, (<http://goo.gl/iFQro>) (2013.10.04) 。

張保明。〈契訶夫《苦惱》以小見大的構思特點〉, (<http://goo.gl/03Ivb>)

(2013.10.09) 。

梁長應、祝紅波。〈契訶夫文學書簡中的小說創作理論述評〉,

(<http://goo.gl/qt6CW>) (2013.06.16) 。

Christian Schwaabe。〈馬克思·韋伯——現代世界的祛魅〉,

(<http://www.goethe.de/ins/cn/lp/kul/mag/que/zh8250983.htm>)

(2013.11.04) 。

Апрышко П. П.. *Белинский*. (<http://goo.gl/tGcHNd>) (2013.09.22) 。

Батюшков Ф.Д..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http://www.my-chekhov.ru/articles/old1.shtml>) (2013.07.13) 。

Петрова Т.Г.. *А.П. Чехов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е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http://kostromka.ru/revyakin/literature/421.php>) (2014.01.13) 。

Чехов А. П.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П. Чехова*.

(<http://chehov.niv.ru/chehov/bio/letopis/letopis-1886-2.htm>)

(2014.01.19) 。

Чехов А. П. *Письмо Киселевой*.

(<http://chehov.niv.ru/chehov/letters/1887-1888/letter-218.htm>)

(2013.11.23) 。

Чехов А. П. *Письмо Суворину А. С.*

(<http://chehov.niv.ru/chehov/letters/1890-1892/letter-1091.htm>)

(2014.01.13) .

Жить по правде (по повести А. Чехова «Мужики») . (<http://goo.gl/0w77Jn>)


(2014.02.16)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ЧЖЭНЧЖИ
ФАКУЛЬТЕТ СЛАВИСТИКИ

Лю Инг-си

Тема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рассказах А. Чехова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магистр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Научны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

Кандидат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Лю Син-хуа

Тайбэй, Тайвань, 2014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ая работа посвящен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темы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рассказах А. Чехова 1880-х—1900-х годов.

В 1861 году после отмены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Росс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 вступила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эпоху. Однако проведенная земе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имела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оловинчатый характер, поэтому 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 не исчезло бесследно: вплоть до 1906 года, несмотря на юридическую отмену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сохранялся фактический запрет на уход крестьян со своего участка земли, что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сохранение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далеко не все крестьяне приобрели свободу,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должала испытывать мучения и страдания. Хотя в ходе Великих реформ осуществились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реформа, финансовая реформа, зем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и ряд других реформ, правлен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II и Александра III был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жестким, поэтому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волнения не утихали и,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вылились в революцию 1905 года.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капитализм утвердился в стране повсеместно и начал менять жизнь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т и укрепление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ивели к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новой для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отчуждения. Эту всеобщую, мировую проблему отметил Карл Маркс в начале создания своей самой известной теори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Ранняя его работа *«Эконом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привлекла внимание к теме отчуждения и вызвала ученые споры в разных круга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отчуждение возникло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ходе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отчужд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символом того, что над человеком доминирует иная, чужая сила, подавляющая его собстве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Подобная ситуация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А.Чехова.

А.Чехова жил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когда многим русским людям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испытывать нужду и бедствия. В это время появились писатели-реалисты, анализирующи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Тургенев, Л.Толстой, Ф.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другие. Чехов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из них краткостью,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ю и легкостью восприятия. Исследуя социальны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описывая различные события в обычной жизни, писатель стремился изменить взгляды читателей на мир.

Жестоко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режима, развити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остаточное влияние крепостничества и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азенщина привели к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ю и сомнениям, которые стали общим настроением поколения А.Чехова. Отмечая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отчужд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вызвало в обществе за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и непонимание, писатель утверждает свою позицию единения с народом и веру в лучшее будущее. В сво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писатель показывает реальные жизн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тремясь разбудить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данной темы обусловлена следующими аспектами:

1. злободневностью феномена отчуждения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2.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й изученностью творчества А.Чехова на Тайване;
3.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 феномена отчуждения героя в рассказах писателя.

Научная новизна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классик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А. Чехова исследую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ом аспекте, но и в аспекте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более ясно понять идеи писателя и те задачи, которые он перед собой ставил.

Предме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отношения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жизни рус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и их отражение в рассказах А.Чехова.

Материалом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служили рассказы А.Чехова *〈 Ярмарка 〉*, *〈 Кухарка женится 〉*, *〈 В циркульне 〉*, *〈 Не в духе 〉*, *〈 Кошмар 〉*, *〈 Устрицы 〉*, *〈 Барыня 〉*, *〈 Княгиня 〉*, *〈 Ванька 〉*, *〈 Спать хочется 〉*, *〈 Стена 〉*, *〈 Скорая помощь 〉*, *〈 Тоска 〉*, *〈 Репетитор 〉*, *〈 Размазня 〉*, *〈 Новогодние великомученики 〉*, *〈 Сущая правда 〉*, *〈 Двое в одном 〉*, *〈 Дамы 〉*, *〈 На гвозде 〉*, *〈 Толстый и тонкий 〉*, *〈 Унтер Пришибеев 〉*, *〈 Смерть чиновника 〉*, *〈 В усадьбе 〉*, *〈 Крыжовник 〉*, *〈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торговог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 〉*, *〈 Ариадна 〉*, *〈 Попрыгунья 〉*, *〈 Супруга 〉*, *〈 В овраге 〉*, *〈 Соседи 〉*, *〈 О любви 〉*, *〈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 〉*, *〈 Ионыч 〉*, *〈 Случай из практики 〉*, *〈 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 〉*, *〈 Страх (Рассказ моего приятеля) 〉*, *〈 Учитель словесности 〉*, *〈 Архиерей 〉*, *〈 Скрипка Ротшильда 〉*, *〈 Дом с мезонином: Рассказ художника 〉*, *〈 Анна на шее 〉*, *〈 Мужики 〉*, *〈 Новая Дача 〉* в издании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А.П.Чехова Том I~ XII »* .

Целью данн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является выявлен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и объяснение феномена отчуждения, характерного дл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А.Чехова.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в диссертации реша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дачи**:

1. дать анализ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с позици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теории отчуждения;
2.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рассказы А.Чехова с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3.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рассказы А.Чехов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теории отчуждения;
4. раскрыть явление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ассказов А.Чехова;

Подх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тчуждение было очень популярной темой в запа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понятиях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отчуждение обозначает ситуацию отдал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от Бога. В те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отчуждение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процесс отдал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от общества, в котором он живёт. По наблюдениям социологов, отчужд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внодушия к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 и характеру каждого отдель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В работе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два взгляда на проблему отчуждения: теория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и теория Макса Вебера.

1. Теория отчуждения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учная мысль при анализе проблемы отчуждения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теорию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и теорию Дьёрдя Лукача, на которого

К.Маркс оказал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суждениях этих ученых, мы постараемся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реальную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России во времена Чехова.

Согласно теории К.Маркса, в ход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ервобыт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ежду его членам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возникает система товарного обмена. Это начал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оторое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материаль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сообщества. С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и стоимость товара приобрела мис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и силу, которая овладела людьми, это сила изменил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равы.

К.Маркс ввел в научный оборот такое философско-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онятие, как «овеществление», обозначающе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еходящую форму соци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и которой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принимают видимость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вещами. Овеществление порождает обезлич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Маркс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оценивал овеществление в материальн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считая его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он критикует отчужд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потерю человеком власти над самим собой в процессе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Маркс подчеркивал, что отчуждение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связи между товаром и человеком 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 его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ое явление, неизбежное в антагонистическ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формациях, вытекающее из специфики разделения труда в классовом обществе, которое особенно ярк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при капитализме. Д.Лукач был согласен с его мнением, что отчуждение проявилось при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арл Маркс протестовал против закабаления и угнет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в реальной жизни, а Дьёрдь Лукач, занимавшийся проблемой кризис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и поисками

путей его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ыступал против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подавления души личности.

Автор диссертации строит свой анализ рассказов А.Чехова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взглядами К.Маркса и Д.Лукача, опираясь на теории этих великих ученых.

2. Теория отчуждения Макса Вебера

Макс Вебер считается известным философом, политологом и социологом, созданная им теория позволяет понять причину появления отчуждения. Автор данн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принимает теорию отчуждения М.Вебера и вслед за ним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как одну из причин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процесса отчуж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от общества.

Подобно К.Марксу, М.Вебер понимал, что отчуждение, особенно ярко проявившееся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оказало вред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человека. Более того, он заметил, что отчужд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только частью проблемы общества.

В-первых, М.Вебер определил, что источником отчужд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есть процесс развития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Вебер выделяет три ее стороны: религию, политику и общ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религи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отказ от веры в неведомую силу и от мистического церемониала, люди начинают верить в то, что, только опираясь на земны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они могут убеждаться в благосклонности и само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Бога. В политике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выраж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люди начинают верить не харизматическому лидеру, а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которое строится на основе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В обществе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то, что человек стал хозяином, который имеет полное право объяснять и оценивать мир, в котором живет.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всего сказанного, появилос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что люди могут понимать мир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за счет р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елигия уже утрачивает свою прежнюю функцию – объяснять человеку цель 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 жизни.

Во-вторых, М.Вебер определяет бюрократию как главную причину отчуждения, возникающую на основе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Бюрократия -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имеющее иерархическ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в которой обязанности у чиновников уменьшаются сверху донизу. Чиновники нижнего уровня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новятся апатичными, а затем постепенно отчуждается от общества, так как он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име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ырази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и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дчиняться начальнику и всем его приказам. В та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знач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уменьшается, и,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он утрачивает св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ценность личности. Исходя из теории отчуждения М.Вебера,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открывает прелюдию отчуждения, с развитием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м бюрократии отчуждение укрепляется.

Отчужд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подходо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с помощью теории М.Вебера можно взглянуть на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А.Чехова под новым углом зрения.

Метод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следующие **методы**:

1.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метод: автор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анализирует документы XIX века и биографию А.Чехова, с помощью которых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общи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в то время;

2. метод анализ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текста: этот метод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о внимательном прочтении сборника рассказов А.Чехова и тщательном анализе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3.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через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теори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Дьёрдя Лукача и Макса Вебера автор диссертаци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тексты А.Чехова с разны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что помогает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рассказы А.Чехова более объективно и глубоко.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значимость материал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агистрантами при подготовке докладов и сообщений.

Положения, выносимые на защиту:

1. Тема отчуждения прослеживается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А.Чехова, поэтому требует особ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не только с позици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о 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2. В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феодальный строй сменился н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изменению ценностных ориентиров 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новых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проблем. Чехов был одним из тех писателей, в чьем творчестве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отразились очень ярко.

3. Возникшее в рус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отчуждение воспринималось Чеховым как одиночество, отсутствие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потеря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Я».
4.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теории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рассказах Чехова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ь персонажей в логику «механис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и утрату власти над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и.
5. Чехов не стремился дать ответы читающей публике, он считал, что роль писател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бы задавать вопросы, а не отвечать на них.

Основ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работы

Диссертация состоит из введения, четырех основных глав (1-я глава «Общее изложение отчуждения», 2-я глава «Связь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жизни Чехова и в его рассказах раннего периода», 3-я глава «Внутреннее отражен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тчуждения», 4-я глава «Внешние проявления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тчуждения»), заключения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насчитывающей 207 единиц наименовани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15 единиц.

Во введении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ы мотивация, задачи и цели данной работы, изложены методы и подходы 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обозначены рамки и границ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 также изложены структура и кратк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В первой главе «Общее изложение отчужден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теории отчуждения,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образ мысле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о времена Чехова. Эти факторы являются условием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того, как возникло отчуждение, какое влияние оно оказало на 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и как русск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ты к нему относились.

В первом параграфе излагаются главные теории отчуждения, параграф при этом делится на две части.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посвящена теори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об отчуждении, он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идейные истоки, причину, процесс и последствие. Кроме теори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в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пишется о развитии понятие философом Дьёрдя Лукачем, на которого иде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повлияли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о. Вторая часть объясняет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тчуждения Макса Вебера и дае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том, каким было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е к отчуждению.

Во втором параграфе дается краткий обзор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при Александре II, Александре III и Николае II, под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которых страна развивалась интенсивно, но бессистемно. Кроме деспотического правления,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угнетала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усилившаяся бюрократия, которая тож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объектом настоящего диссертацио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третьем параграфе конкретизируются данные первого и второго параграфов: теории отчуждения проецируются на социальны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во времена Чехова. Через конкретизацию этих данных можно оценить происходившие в стране события и понять, как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Чехова воспринимали отчужд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они переживали.

Во второй главе «Связь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жизни Чехова и в его рассказах раннего периода» излагаются общие сведения о жизни Чехова и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тексты его ранних рассказов, чтобы найти причину того,

почему в рус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возникает отчуждение.

В первом параграфе прослеживаются главные события, которые оказали огром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Чехова и на его творчество: детство в Таганроге, учёба на медицинском факультете в Москв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Сахалин,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деревне и отдых в курортных районах. Творческий стиль Чехова со временем меняется, так как он отметил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жизни.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писатель решил бороться своим творчеством с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ю общества.

Второй параграф посвящен рассмотрению рассказов раннего периода творчества Чехова. Рассказы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чтобы понять, как появилось отчуждение. Причин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отчуждения несколько, мы выделяем три главных, по нашему мнению: бедность, униженное лич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всевластие бюрократизма. При анализе каждой из названных причин в работе прослеживаются параллели между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м и социальным положением героев, которые переживают состояние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третьем параграфе подводится итог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связей между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м и условиям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отчуждения. Чехов считал, что литератор должен работать как простой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который только излагает факты,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ся ему заслуживающими серьезн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Отчуждение всегда описывается Чеховым в традициях реализма.

В третьей и четвертой главах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анализ темы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позднего периода творчества Чехова. В третьей главе «Внутреннее отражен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отчуждения»

прослеживаются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отчуждения на уровне самооценки персонажей.

В поздний период писатель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ется на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отчужд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в его рассказах принимают форму морального па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Первый параграф третьей главы «Изменение взглядов на жизнь и ее ценност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новую для рус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енденцию -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обогащению - и делится на две части: «Увлечение деньгами и положением» и «Снижение морали». В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на пример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Чехова показывается, что люди начинают думать только о деньгах и положении в обществе. Во второй части говорится о том, что самым важным для людей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ыгода, герои Чехова не гнушаются ника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чтобы ее получить.

Во втором параграфе «Смерть душевного стремления» исследуются сложны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е жизненные ситуации, отразившиеся в рассказах Чехова. Параграф состоит из двух частей: «Утрата смысла жизни» и «Потеря лич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и чувства».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посвящена анализу такого феномена как «жизнь без смысла». Во второй части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условия,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одят к исчезновению лич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Четвертая глава «Внешние проявления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тчужден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тчуждения при изображении внешне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Первый параграф четвертой главы «Странности личн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фокусирует внимание на необычных реакциях личности, параграф состоит из трех частей: «Страх», «Пошлость» и «Увлечение смертью». Страх является настроением личности, живущей в непонятном мире, который формирует в человеке только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б окружающе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шлость, проявляющаяся в мелких и низм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ах,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отсутствие в обществе глубоких идей. Смерть есть разреше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жизни, котора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человеку печальной и безнадёжной. Указанные три фактора существуют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независимо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и приобретают об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при изображении отчуждения в рассказах А.Чехова.

Во втором параграфе «Ослабление связей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отчуждения. Этот параграф состоит из трех частей: «Закостенелость», «Равнодушие» и «Ненависть». В мире отчуждения люди обращают внимание только на свои лич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поэтому они не могут с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чужому горю, не понимают и даже совсем не слуша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Закостенелость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застой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общества, при котором активная прежд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юдей почти замирает. Равнодушие отражает утрату интереса к окружающим людям и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ность персонажа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олько на себе самом. Ненависть раскрыв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люди без видимых причин и оснований начинают относиться друг к другу как враги. Эти три элемента объединяют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ложившиеся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отчуждения.

Во всех параграфах третьей и четвертой глав каждый элемен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отдельно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проследить их тесную связь с влиянием отчуждения на человека.

В заключении подводятся общие итоги проведе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делается вывод, что творчество А.Чехова необходим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ом, но и в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м аспекте.

Анализируя связь между реальным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ми и рассказами А.Чехова, можно лучше понять идеи писателя, проникнуть в его творческую лабораторию и увидеть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глазами Чехова.

